

特邀

- 2 誰有權過問？中國資助尼泊爾基礎設施中的性別、主體位置性與政治
／ Krittika Uniyal

香港研究走向全球國際研討會——韌性與轉化（下）

- 12 主題演講——在日本推動香港研究／倉田徹
15 新書論壇 I——文學與電影／陳睿龍
18 新書論壇 II——政治重構／羅詠濤

通訊文摘

- 23 大外宣的最嚴肅討論——統戰、灰域與中共的不對稱優勢／李厚辰

田野紀要

- 39 「紅潮」、對台網絡與 J 大學生的跨境身影／陳睿龍
44 後疫情時代下的中國社會——一個商用不動產外企實習生的觀察／榴槤小姐
52 從民間到國家——華東地區營造業實習紀要／林雨
56 昆山台商的現況與前景——一個台商企業實習生的觀察隨筆／三冬
61 鏡頭背後的非自願操演——當實習生成為「兩岸一家親」宣傳工具／芋頭

工作坊演講紀要

- 66 中國研究的困境與未來——關於專業領域與方法論的一些初步反省／吳國光
70 中國互聯網三十年／賈葭
78 「一國兩制」的終結與中國政治變遷／王耀宗
85 Youth, Democratic Culture,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 Anthony J. Spires
92 中國對東南亞社會影響研究工作坊（上）——中國因素下的東南亞外交與台
資／陳明祺、王宏仁
99 中國對東南亞社會影響研究工作坊（下）——Chinese Influences in Philippine
／ Ronald Aurelio Pernia, Jalton Garces Taguibao, Jan Robert R. Go

中心動態

- 107 日本東京大學、九州大學師生來台灣進行年度例行參訪／通訊編輯組

誰有權過問？ 中國資助尼泊爾基礎設施中的性別、 主體位置性與政治*

撰稿 | Krittika Uniyal **

波克拉國際機場（Pokhara International Airport，簡稱 PIA）於 2023 年 1 月 1 日正式啟用，然而不到兩週，便發生了雪人航空（Yeti Airlines）691 號班機的空難慘劇。班機在距離跑道 1.6 公里處墜毀，機上 72 人全數罹難。對於許多觀察家而言，這場災難立即引發了超越飛航安全本身的質疑。這場災難讓原本被呈現為國家雄心與中尼合作象徵的機場，一夕之間成為悲劇與政治審視的焦點。基礎設施研究長期以來所主張、但政治人物更傾向掩蓋的事實，此刻暴露無遺：機場絕非中立的技術表現，而是充滿權力象徵、物質投資和人類代價，與背後的政治計算交織在一起，無法分割（Larkin 2013）。對於社會科學家來說，這些是承載著意涵的關鍵基礎設施，更是國家能力、民族

自豪感和國際結盟的象徵。

本文反思了身處其中並研究這類交織的意義：身為一名棕色皮膚的印度女性，在尼泊爾研究中國資助的基礎設施，在制度性懷疑、關係義務及相互競爭的國家利益環境中，所面臨的方法論與政治挑戰。

處於兩個強大鄰國的競爭壓力中，十八世紀統一尼泊爾的國王普



波克拉國際機場位置圖。（照片來源／本文作者）

* 本文內容取自作者的博士論文 *Contested Skies: The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of Civil Aviation Infrastructure in Nepal*（University of Geneva, 2024）

** 日內瓦大學環境治理與領土發展研究所（GEDT）博士、獨立研究人員

里特維·納拉揚·沙阿（Prithvi Narayan Shah）曾將自己的國家形容為「兩塊巨石之間的番薯」（Prithvi Narayan Shah，引自 Chaturvedy and Malone, 2012）。這種定性迄今仍具現實意義。從 2006 年左右開始，中國透過青藏鐵路將觸角延伸至喜馬拉雅地區，又逢尼泊爾長達 10 年的內戰結束，君主專制隨之崩潰，為尼泊爾帶來新的外交機會。尼泊爾開始了緩慢且謹慎的「向北轉向」。與此同時，中國加強了對尼泊爾的戰略關注，認為尼泊爾具有作為中國與印度之間緩衝國的戰略價值（Paudel, 2021）。面對這些變化，尼泊爾努力維持微妙的平衡。政府透過在 2017 年正式加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並在 2022 年參與由美國主導的「千禧挑戰計畫」（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MCC），¹ 試圖透過這些重疊的合作承諾，實現依賴關係的多樣化，並妥善應對兩大鄰國的利益競爭（Roka, 2022）。

波克拉國際機場正處於這一雄心的核心，也是我 2015 至 2023 年間進行的研究中最核心的場域。這座機場被國家定位為通往北方的重要空中門戶，也是民族自豪感的象徵。對許多波克拉居民而言，是等待五十年的夢想終於成真，不必繞道加德滿都直接與國際連結。然而，記者和批評人士擔憂可能成為另一個華而不實的「白象工程」，如同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的狀況，原本雄心壯志的大型基礎建設計畫，最後陷入債務危機（Hurley, Morris and Portelance, 2018; Moramudali, 2019; Brautigam, 2020）。此外，也有人擔心尼泊爾會成為美中地緣政治角力的試驗場。這些焦慮並非憑空想像，因為尼泊爾的航空場域正處於區域競爭利益盤算的交匯點：印度擔心中國介入、美國密切關注一帶一路擴張，而中國期望尼泊爾給予政治配合。這些因素讓這裡成為最難進行田野調查的地區。人們的言談舉止總是小心翼翼，資訊也容易被隱瞞。在這種情況下，信任成為最珍貴的資源。這意味著無法僅透過官方文件或精心安排的訪談，進行遠距離研究（Kovats-Bernat, 2002; Desai and Potter, 2006）。我的研究聚焦在基礎建設、主權和地緣政治的交織，不僅探索機場在政治上的含意，還涉及研究它們需要有什麼條件，誰有資格進入、在什麼條件下進入，以及由誰來決定這些事情。這些都不是純粹方法論的問題，因為「誰有權過問」這個問題從來不是事先就能確定的。正是在這種充滿不確定性的情境中，我的身分、我被如何看待以及我被賦予了什麼角色，都不再只是方法論上的

¹ MCC 協議包含美國提供 5 億美元的資金，用於尼泊爾的公路及電力基礎建設（U.S. Embassy Kathmandu, 2025）。此舉引發了許多爭議，主要圍繞在擔心美國的地緣政治意圖，以及尼泊爾的政治穩定（Chand, 2021; Pokharel, 2024）。



波克拉國際機場，作者攝於 2023 年 6 月。

考量，而是知識被創造過程中的重要因素（Rose, 1997）。

「你為什麼還沒有結婚？」

這是在田野調查期間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從計程車司機到尼泊爾民用航空局（CAAN）的高級官員，都曾這樣問過我。在一個早婚仍是普遍社會規範的脈絡下，² 身為接近三十歲的未婚女性，我的婚姻狀況成了無法迴避的話題。這個問題超越了體制性的階級，時時刻刻提醒我：在這些場域中，人們首先是透過社會性透鏡來審視我，而不是我的專業身分（Cupples, 2002）。我是一個鄰國公民，一名帶有特定地域、宗教、種姓和階級背景的研究者，在幾乎完全由男性主導且從未考慮過女性的環境中工作。機場複合體內的建築工地和政府辦公室，沒有為女性提供任何基本的便利設施，這種「缺席」本身就是一種研究資料，揭示了這些空間是為誰建造，以及誰被認定有資格使用（Truelove and Ruszczyk, 2022）。

內部的局外人

要進入政治敏感的研究環境，僅憑學術名義是不夠的，還需要彼此的信任，而在尼泊爾及整個南亞，信任是透過人際網絡建立的，而非制度（Mullings, 1999）。為了建立這種信任，我在每個階段都對自己和研究保持公開與誠實，致力於最高標準的倫理誠信。最重要的是，我經常仰賴我的尼泊爾朋友和聯絡人作為

² 「在 20 至 24 歲的女性中，8% 的人在 15 歲之前結婚，33% 的人在 18 歲之前結婚。」這個比例在農村地區、受教育程度較低以及較貧窮的家庭中更高。此外，各地區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差異（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9, p.1）。

擔保，因為在某些場域中，我的機構背景沒有太大作用。

我被引薦的方式深刻反映出我將如何被對待。當我被介紹為「*mero JNU ko sathi*」（我在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的朋友），會被貼上「受印度教育的研究者」標籤，這個政治標籤自帶對我學術意圖與潛在偏見的預設。然而，我在昆明結識的尼泊爾朋友會介紹我是「*mero bahini*」（我的妹妹）或「*mero ko sathi*」（我的朋友），讓我從政治範疇轉移到親屬關係。這種框架不僅僅是社交禮貌，而是一種關係定位（relational positioning）（England, 1994），將我歸類為值得信賴的自己人，而不是可疑的印度女性研究者（Truelove and Ruszczyk, 2022）。

親屬關係標籤雖然打開了正式引薦無法開啟的大門，但也帶來了義務。在深具父權色彩和階級森嚴的專業文化中，年輕妹妹的角色被定義得很明確：她會受到某種保護性的溫暖對待，但很少被平等相待。當一位關鍵受訪者將我引薦給文化、觀光與民航部的一位高級官員，並說我是他妹妹時，我在開口之前就已經被定型在某個角色中了。引薦人的社會資本發揮了作用，我受到了冷淡介紹無法給予的溫暖與信任。此外，這種親屬關係框架也引來更難應對的個人層面審視。詢問變得更加熟稔、更具試探性和私密性，而年輕妹妹角色在拒絕回答這些問題時，很難不顯得無禮或不識抬舉。我獲得了「准入權」，條件是無法全然自主，而准入的代價是我未必會選擇的坦誠與開放。

並非所有的關係都能透過學術或專業網絡建立，還好受訪者經常以具個人色彩的問題來尋找我們之間共同點，比如我的年齡、家庭背景，以及是什麼吸引我來到尼泊爾。我總是如實回答，並且最喜歡最後一個問題。除了對基礎設施和地緣政治的學術興趣之外，我對尼泊爾及人民有著真摯且長期的熱愛，這源於 2017 年在加德滿都的一家國際組織工作的早期經歷。從那時候起，我就愛上了這個國家的慷慨與溫暖，這份情感從未消逝。當我分享這些時，受訪者的態度往往會明顯放鬆下來。許多人會驚呼：「啊，妳看起來就像個尼泊爾人！」而那些知道我來自德拉敦（Dehradun）的人則會補充道：「那裡曾經是尼泊爾的一部分，妳知道嗎？」³ 這些話非但沒有冒犯之意，反而展現地緣親近感，試圖把我的身分融入他們的歷史與文化脈絡中，使我成為他們的一分子，哪怕只是一小部分。

在某些正式的機構環境中，我會刻意採取「裝作不知情」的策略。我帶著多年

3 在十八世紀末，廓爾喀帝國（Gorkha Empire）吞併了德拉敦（Dehradun）以及現今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的大部分地區，直到 1814-16 年的英尼戰爭之後，該地區被割讓給英國。

的前期知識進入田野，細緻研讀尼泊爾航空政策、熟知主要的機構行動者，並且對圍繞中國資助基礎設施的地緣政治辯論有一定的理解。然而，我刻意隱瞞了這些專業知識，介紹自己只是一名學生，並穿著符合身分的衣服。我刻意穿上牛仔褲和 T-shirt，而非平時會穿的庫爾塔（kurtas，印度傳統長衫），因為在專業環境中，傳統服飾會傳遞出成熟與權威的訊號，身處敏感職位的官員會對此保持警惕。透過看起來年輕且沒那麼正式的穿著，我讓自己看起來比較沒有威脅性、不可疑且更好親近。誠如 Coffey（1999）所言，服裝不僅是一種社會展演，更是形塑田野准入與關係建立的方法學選擇。

在實踐中，這往往意味著要表現出比實際的我更缺乏知識的樣貌（Herod, 1999）。有時我會順從地接受對方的「男性說教」（mansplained），因為我意識到當官員們覺得自己是在教育一個年輕學生時，他們的解釋往往會更坦率 and 詳盡。在與某些人脈廣泛的受訪者互動時，這種緊張關係最為明顯，因為他們將自己視為知識守門人。「妳知道嗎？」或「妳見過這個人嗎？」之類的問句，與其說是想要開啟對話，不如說是一種資格測試，看我是否配得上進入他們的圈子，而且經常以「妳先去多讀一些資料再來」而打發我。我學會了平靜地接受這些輕視，明白有時候讓別人低估自己，反而能取得研究機會。

當然，並非所有的遭遇都是友善的。一位 CAAN 高級官員曾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中國的航空投資不是印度研究者該插手的事，我應該換個研究題目。他暗示一個印度人無法在不帶有國家議程的情況下客觀對待這個主題，即使我澄清作為一名研究者，我忠誠的對象是研究本身，而非任何國家利益，但他並未被說服，並且示意我離開。事後回想，這種敵意有多重層次。表面上是我的印度身分，明顯可見的標示和偏見，更深層次上，它反映出尼泊爾與中國戰略關係上所引發的制度性焦慮（Murton and Lord, 2020）。對於 CAAN 而言，航空基礎設施屬於國家主權的敏感領域；因此，任何研究中國投資的印度學者，都可能被解讀為印度試圖介入尼泊爾的戰略決策（Saklani, 2022）。那位官員不是在守住知識訊息，而是在保護制度和國家利益。這次的交會過程顯示，在訪談現場中，並不是只有研究人員需要去拿捏身分和利害得失。誰有資格提問、誰能獲得資訊，往往取決於研究資格之外的權力關係。

然而，每當有一扇門關上，就會有另一扇門打開。另一位 CAAN 官員在漫長訪談的尾聲悄悄對我說：「我像信任自己人一樣，和妳分享了我掌握的所有訊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遭遇，呈現出政治敏感研究場域的核心特質。同樣的研究，會被視為威脅還是禮物，完全取決於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人是誰。研究者的立場

定位是一把雙面刃。

我經常面臨的難題，還有分析中應該排除哪些內容。當受訪者叫我 *bahini* 或 *chori*（女兒），並在信任的保護傘下毫無防備地分享時，身為研究者的我要扛起保護的責任。在某些情況下，我採取策略性沉默（strategic silence）（Tronto, 1993），將受訪者的安全置於可能引發轟動的研究發現之上。研究者與參與者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在許多情況下，田野調查變成了友誼，而尼泊爾人民賦予我的信任，絕非我可以背叛的。

在中國主導的那一側

研究中最大的關卡，是如何接觸到在尼泊爾的中國人網絡，這些網絡在很大程度上與民族誌的田野調查相隔絕（Lee, 2017）。再加上機場建設項目的體制結構受到嚴格控管，無論是 CAAN 還是中國承包商，沒有人樂於和研究者討論相關計畫，因此很難透過正式管道接觸到 PIA 的中國員工。正式的訪談申請只會得到篩選與包裝過的官方說詞，於是我轉向關係導向的研究方法（Atkinson and Flint, 2001）。我向特里布文大學（Tribhuvan University）的學生招聘研究助理，與尼泊爾和中國籍學生建立自然的信任關係，他們最後幫我做了重要的私人引薦，使我得以進入在尼泊爾工作中國人的社交與專業圈（Fujii, 2010）。

然而，實際與我的中國受訪者見面，還是和預期的很不一樣。受訪者原本預期會見到一位白人歐洲研究者，我這個嬌小的東南亞女性，挑戰了他們的預設（Kobayashi 1994）。我過去在雲南大學所學會的蹩腳普通話，有助於我們的溝通。儘管我說得並不流利，但用他們的語言進行交流的這份努力，傳遞出正式引薦所無法達到的尊重，而那些最坦率的觀察，往往正是在這樣的交流中浮現。中國承包商在正式討論中往往言詞謹慎，但在比較私人的互動中會顯露深層的挫折感。一位已在尼泊爾工作五年的受訪者直言：

這個項目完工後，我再也不想來了。在這裡推進工作太困難了，像這樣的項目在中國兩三年就能搞定，但在尼泊爾，根本不可能按時完成進度表。政府部門的協調能力很差，而且，天吶，他們的假期怎麼那麼多！

最能代表我整個田野調查的一刻，或許是我 2022 年造訪中工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CAMC Engineering）辦公室時，當時機場仍在建設中。幾個月來，我持續透過電子郵件和滾雪球方式聯絡 CAAN 官員，但是都石沉大海。那一天，我



波克拉國際機場園區內的 CAMC 辦公室（左）與 CAAN 辦公室（右），作者攝於 2022 年 5 月。

終於成功和 CAMC 人員約好訪談，離開後發現 CAAN 的辦公室就在正對面。當時警衛剛好不在，我走了進去，敲了敲門，微笑著說明我是從對面的 CAMC 辦公室過來的。他們其實早就知道我是誰，只是此前不想回覆我的訊息。如今我站在他們面前，他們才把名字和臉孔連結起來，接著毫不猶豫地接待我。原本只是一場訪談，延伸為午餐，接著午餐又變成對整個機場設施的私人導覽，當時距離機場正式啟用還有六個月。

在民族誌田野調查中，准入權很少透過正式管道而取得，更多時候它是透過現身，還有對的時機、持之以恆，以及那些偶然的機會——比如某扇門恰好打開，而直覺帶你走了進去。棘手且不可預測，也無法事先計劃。

航廈未展現的實相

走訪這座尼泊爾新機場，我感受到建築本身何以是政策的中介（Larkin, 2013）。航廈的規模依照未來的運量而設計，遠遠超出目前的實際需求。正如一位官員所說：「我們是為未來的五十年而建，不是為了今日的旅客。」然而，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這個宏大的願景，而是隱藏其下的真實。中尼雙方官員都分別證實，機場建設所必備的基礎地質資料（包括土壤承载力評估和數十年來的氣象紀錄），在 PIA 選址時從未進行資料蒐集。這件事沒有任何人主動提及，而是在多次的訪談中緩慢地浮現，這個事實如此常態，以至於幾乎從未被重視。一個財政資源有限的國家，往往負擔不起這一類的研究，而政治時間表很少會等待科學研究完成（Flyvbjerg, Bruzelius, and Rothengatter, 2003）。PIA 的興建並非基於累積的技術知識，而是基於政治意志與借貸資本（Hurley, Morris, and Portelance, 2018）。儘管 691 號班機的空難不能歸咎於這一漏洞，但它警惕著人們：一個旗艦項目與一個真正做好準備的項目之間，兩者之間的差距，有時能夠從那些從未被蒐集過的資料中看出來。

當我將目光從官員移開，轉向那些參與建設 PIA 的日結工時，看到的是不同

的圖像。許多 CAAN 官員讚揚中國建築工人的紀律與準時，建議尼泊爾工人好好向他們學習。但是，當我與尼泊爾日結工交談時，另一個敘述浮上檯面。他們指出，中國工人有更好的裝備、更周全的防護，更好的居住環境；尼泊爾工人則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以及被無故解僱且投訴無門的恐懼中（Lee, 2017）。

這種差距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尤為明顯，當時工人們被隔離在建築工地內，工程被迫照常進行。官員們口中的效率，在勞動者的經驗中是不穩定。這不只是同一個工程項目的不同觀點，它們揭示了基礎建設發展如何根據國籍、勞動身分和權力關係來分配利益與負擔，以及研究者能夠和誰坐在一起，有誰足夠信任他而願意開口說話。

當我提問時，我是誰

最終，我不再將我的田野調查視為一種線性的事實擷取，而是一個流動且協同的生成過程（process of becoming）（Lassiter, 2005）。我在田野中的多重身分——學生、妹妹、局外人、南方鄰居——並非獲取知識的絆腳石，恰恰相反，它們是知識得以生產的條件。在尼泊爾研究受中國資助的基礎設施，就會發現地緣政治與個人層面從未真正分離：你是誰，形塑了你能知道什麼，而你能知道什麼，形塑了故事的走向。

我的博士研究表明，理解「全球中國」（Global China）必須有超越政策中心的視野。基礎建設絕非單純的技術成果，而是一個政治過程，有時更關乎深刻的人性。喜馬拉雅地區的基礎設施由多國勞工建造、競爭大國資助，由在矛盾中斡旋的官員治理。此外，也會被像我這樣的人——將自己的矛盾帶入田野——研究、理解、詮釋和書寫。或許，這並非需要克服的障礙，而是知識產出的真實面貌：在混雜與關係網絡中，在各種連結與誤解、信任與猜疑的微小瞬間逐漸累積形成，構成了在異國他鄉不斷追問解答的生命歷程。

參考書目

- Atkinson, R. and J. Flint. 2001. Accessing Hidden and Hard-to-Reach Populations: Snowball Research Strategies. *Social Research Update* 33: 1-4.
- Brautigam, D. 2020. A Critical Look at Chinese Debt-Trap Diplomacy: The Rise of a Meme.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5(1): 1-14.
-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9. *Nepal Multiple Indicator Cluster Survey 2019, Survey Findings Report*.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UNICEF Nepal. Kathmandu,

Nepal.

- Chand, H. P. 2021. Nepal's Engagement in BRI and MCC: Implications on Nepal's Geo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1): 60-77.
- Chaturvedy, R. and D. Malone. 2012. A Yam between Two Boulders: Nepal's Foreign Policy Caught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In D. Malone, C. R. Mohan and S. Raghav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87-312.
- Coffey, A. 1999. *The Ethnographic Self: Fieldwork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Sage.
- Cupples, J. 2002. The Field as a Landscape of Desire: Sex and Sexuality in Geographical Fieldwork. *Area* 34(4): 382-390.
- Desai, V. and R. Potter, eds. 2006. *Doing Development Research*. Sage.
- England, K. V. L. 1994. Getting Personal: Reflexivity, Positionality, and Feminist Research.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6(1): 80-89.
- Flyvbjerg, B., N. Bruzelius, and W. Rothengatter. 2003. *Megaprojects and Risk: An Anatomy of Amb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ujii, L. A. 2010. Shades of Truth and Lies: Interpreting Testimonies of War and Viol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7(2): 231-241.
- Herod, A. 1999. Reflections on Interviewing Foreign Elites: Praxis, Positionality, Validity, and the Cult of the Insider. *Geoforum* 30(4): 313-327.
- Hurley, J., S. Morris, and G. Portelance. 2018. 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CGD Policy Paper*, 121.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 Kobayashi, A. 1994. Coloring the Field: Gender, "Race," and the Politics of Fieldwork.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6(1): 73-80.
- Kovats-Bernat, C. J. 2002. Negotiating dangerous fields: Pragmatic strategies for fieldwork amid violence and terro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 1-15.
- Larkin, B.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327-343.
- Lassiter, L. E. 2005. *The Chicago Guide to Collaborative Ethnogra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e, C. K. 2017.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 Af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oramudali, U. 2019. The Hambantota Port Deal: Myths and Realities. *The Diplomat*, 1 January 2019.
- Mullings, B. 1999. Insider or Outsider, Both or Neither: Some Dilemmas of Interviewing in a Cross-Cultural Setting. *Geoforum* 30(4): 337-350.
- Murton, G. and A. Lord. 2020. Trans-Himalayan Power Corridors: Infrastructural Politics and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Nepal. *Political Geography* 77: 102100. <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19.102100>
- Paudel, D. 2021. Himalayan BRI: An Infrastructural Conjuncture and Shifting Development in Nepal. *Area Development and Policy*. <https://doi.org/10.1080/23792949.2021.1961592>
- Pokharel, A. P. 2024. Navigating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nd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MCC) in Nepal. *Academia Research Journal* 3(2): 24-34.
- Roka, H. 2022. Why Oppose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 in Nepal?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3(3): 401-420.
- Rose, G. 1997. Situating Knowledges: Positionality, Reflexivities and Other Tactic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1(3): 305-320.
- Saklani, U. 2022. Fieldwork, Foreignness, and Suspicion: Indian Researchers in Himalayan Contexts. *Himalay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10: 45-62.
- Tronto, J. 1993. *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 Routledge.
- Truelove, Y. and H. A. Ruszczyk. 2022. Bodies as Urban Infrastructure: Gender, Intimate Infrastructures and Slow Infrastructural Violence. *Political Geography* 92: 102492. <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21.102492>
- U.S. Embassy Kathmandu. 2025. US\$50 Million in Additional Funding Confirmed for the MCC Nepal Compact. U.S. Embassy in Nepal. 19 November 2025. <https://np.usembassy.gov/us50-million-in-additional-funding-confirmed-for-the-mcc-nepal-compact/>

主題演講 在日本推動香港研究*

主持人 | 吳介民^a

發表人 | 倉田徹^b

記錄 | 羅詠濤^c

本場次由日本學者倉田徹教授主講。倉田徹研究香港政治近三十年，近年更積極凝聚日本專業社群，促進學界對香港社會變遷的關注。本次演講分析日本香港研究的過去與現狀，並提出如何促進未來發展的思考。

「外國人」的香港研究

近年來，全球香港研究組織相繼浮現，例如 2017 年創設的香港學會（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共研香江計劃（Hong Kong Studies Initiative），以及 2020 年代成立的布里斯托大學香港史研究中心（Hong Kong History Centre）與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香港主題研究小組。儘管日本尚未出現類似機構組織，但倉田徹指出，日本實際上擁有悠久的香港研究歷史，可追溯到矢野仁一於 1939 年出版的《支那外交史とイギリス：アヘン戦争と香港》（中國外交史與英國：鴉片戰爭與香港）。在此漫長歷程下，日本主要是本國人對外國進行的異文化研究，可說是最大的「非香港人主導」的香港研究基地。與之相較，各地的研究基地普遍由香港人的移民網絡主導。

倉田徹認為，非香港人主導的研究社群具有以下特徵：首先，研究者的研究興趣是後天養成的，原因包括受文化催生的喜好、個人生命史淵源，或者重大的社會

* 演講於 2025 年 12 月 5 日，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進行

a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b 立教大學政治系教授

c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議題（戰後經濟、九七回歸、雨傘運動、反修例運動、中國崛起等）。其次，異文化研究有助於提升客觀性。局外人視角具有捕捉被本地人所輕忽現象的潛力，而研究者與香港的距離有助於降低政治價值觀的影響。再者，則是一項劣勢。由於屬於外國研究範疇，社會與學術界對香港研究的需求並不穩定，受關注與否始終取決於重要事件，或者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熱議程度。



主持人吳介民教授為演講開場。

日本香港研究的挑戰、轉折與機會

由於上述限制，日本的香港研究尚未確立穩固的學術地位，目前仍位列亞洲研究或中國研究分支，發表平台依賴一些較大區域研究的學會，也沒有日文的香港研究期刊。倉田徹指出，同儕之間共通的基礎知識薄弱，從而難以進行深入的討論；學者們雖然關注中國崛起的挑戰，但兩個社會的研究焦點終究因歷史鴻溝而存在落差。就更長期的學術史而言，日本的中國研究對於東北、華北和華東等地區已累積豐富成果，對於華南與香港的關注則很晚才興起。倉田徹認為，最重要的研究挑戰可能是香港本身的體制特殊性，使其很難在案例比較研究中處理，故削弱了被重視的機會。此外，在日本從事香港研究的學者必須依附於其他領域，現階段彼此間的聯繫甚少。為了找出相互合作的途徑，他從 2016 年起於東京固定舉辦香港史研究會，以歷史研究為起點並逐漸廣納其他學門。

研究主題與方法是日本學者的另一項課題。隨著當前中國進入新極權時代，香港政治研究也處處受限，尤其是民主化與自治等敏感議題。當香港與自由主義典範日益疏遠，新的研究主題恐怕更不易引起日本學者的興趣，部分原因即是它們形成的社會參照有限。方法上，不論田野調查或跨國比較分析的可行空間皆大幅萎縮，值得信賴的資料亦逐漸減少。儘管如此，倉田徹仍有較為樂觀的主張，例如文化、歷史和經濟方面的研究仍大有可為，至於政治學和法學領域依然存在重要課題，例如他本人對國安法制度的分析。無論如何，相對於中國，香港仍有更加開放的資訊來源。

最後，倉田徹提出研究品質和「香港已死論」的反思。他直陳研究「一方面必須避免複雜的細節失真，另一方面又得確保呈現出方便理解的論述」，這是異文化研究學者必然面對的兩難。對於「香港已死論」一說，倉田徹認為這種過度化約



倉田徹教授。

的說法只會淡化對社會轉變、人們生活狀態的具體分析，無助於了解現況。舉例來說，即使香港在後國安法時期，與 2014 至 2019 年間受到國際關注的情況有所不同，仍然留存許多值得追問的研究問題。事實上，問題本身正隨著社會變遷而轉化，「已死」論斷並不成立。

「一城兩制」下的「中國式化」

倉田徹以自己對香港政治體制的分析為例，展現日本香港研究者的問題意識與技藝。首先是謎題（puzzle）來自於難以定義的香港政治體制。在日本外務省的官方描述中，香港僅只是「特別行政區」一詞，普通民眾幾乎無法從中了解其政治制度的實際運作。倉田徹強調，從一國兩制到國安法實施的細緻轉變，正是研究者必須盡力把握的所在，進而與籠統的香港已死論斷裂。

新的國安法體制該如何定義？倉田徹認為，中國過去透過間接影響力促進香港的「中國化」，如今已經轉變成利用強制權力直接改造體制的「中國式化」。經驗上，中國已將境內的開發模式移植到香港北部都會區，作為中共政權向外輸出的實驗。此外，國安法施行前，香港採取傾向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體制，也就是過去所說的一國兩制。這種情況在國安法後的改變，倉田徹以政治和經濟的「一城兩制」來描述，即經濟方面維持國際市場標準，政治上則明顯走向「中國式化」。香港向來以市場經濟引導其投資對象和企業發展方向，如今體現在北部都會區的現況是，政治的變革牽引了經濟的轉型。香港政府近年所推動的，更像是中國內地盛行的產業計畫和招商管道，使得經濟上產生了競爭市場與政府規劃的對立張力。

演講收束在日本與世界香港研究社群的交流願景。倉田徹表示，日本學界正湧現能以多種外語發表的年輕一輩學者，加上香港出身的學者也在日本匯聚、帶來更多元的觀點，未來將共同為香港研究注入新的研究活力。

新書論壇 I 文學與電影*

主持人 | 陳筱筠^a

發表人 | 河本美紀^b、陳筱筠^a

記錄 | 陳睿龍^c

本場次聚焦於「文學與電影」，特別邀請到河本美紀講師、陳筱筠教授，分別就她們近期的出版著作，深入探討張愛玲的電影編劇生涯，以及 1980 年代香港文學刊物的跨界想像。

重構張愛玲的香港電影足跡與文學定位

論壇上半場由河本美紀開場，分享著作《張愛玲的電影史》（印刻，2025）。河本美紀的研究跳脫過往僅聚焦於張愛玲小說的框架，透過爬梳多地的報章雜誌與未曾公開的檔案，重新定位了張愛玲在華語電影史中的重要性。河本美紀指出，張愛玲的電影實踐源自其深厚的影迷經驗；她自幼便頻繁出入戲院觀賞好萊塢電影，即使因近視視力不佳也未曾削減熱情。在 1940 年代的上海，她不僅以影評人身分活躍於文壇，更主動追蹤因戰爭關係而大量放映的日本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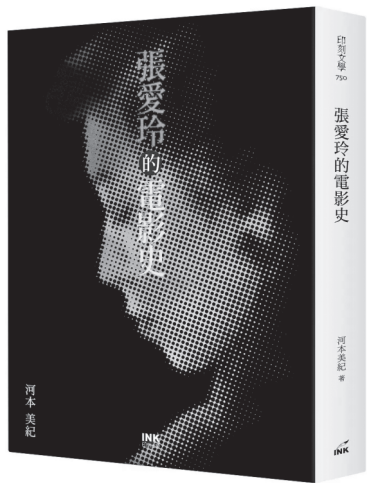


* 演講於 2025 年 12 月 4 日，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進行

^a 中興大學台文所兼任助理教授

^b 九州大學兼任講師

^c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生



195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中期，張愛玲抵達香港後迎來了編劇生涯的高峰，陸續為「電懋」公司編寫了約二十部國語電影劇本。有別於其小說的蒼涼底色，她擅長運用「拼裝」（Bricolage）手法，將歐美喜劇架構與華人的幽默睿智結合。河本美紀強調，張愛玲所創作的劇本節奏明快、笑點密集，這種「浪漫愛情喜劇」風格不僅在港台及東南亞大受歡迎，更直接啟發了 1980 年代以後港產喜劇片的流行風潮。然而，河本美紀反對將張愛玲的編劇工作視為單純的「經濟壓力下的產物」。她認為，電影劇本雖

然較通俗易懂，但在主題與內涵上與其小說互有共鳴，充分展現了張愛玲幽默且睿智的一面。基於「書寫內容與作者跟香港的關係」此一認定關鍵，河本美紀堅定主張，張愛玲專為香港電影打造的劇本，理應被納入廣義的香港文學範疇之中。

另闢蹊徑的 1980 年代香港文學跨界想像

論壇下半場，陳筱筠分享新書《跨界想像：1980 年代香港文學的建構》（聯經，2025）。陳筱筠的研究跳脫 1980 年代香港文學的「中英夾縫」與「主權回歸焦慮」主流論述，試圖尋找更廣闊的討論空間，書中透過分析五份風格迥異的文藝刊物，細緻展現了當時香港文學豐富的跨界對話與邊界擴張。例如，在具備高度學術性與橋梁作用的刊物方面，1979 年創刊的《八方》展現了強烈的國際視野，不僅引進東歐文學等理論思潮，更在學者盧瑋鑾（小思）加入後，致力於整理 1930 至 1940 年代因戰爭而送到香港的中國文人史料，深化了香港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對話。劉以鬯創辦的《香港文學》，強調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轉運功能，刊載詳盡的作者簡介與文學報導，收錄範圍廣及中、港、台與東南亞，被研究者譽為珍貴的文學資料庫。

在關注青年發聲與本土意識的刊物方面，1975 年創刊的《大拇指週報》具備極強的同人（刊物）性格，最高曾有 50 餘人參與編輯；高度重視青年聲音，透過「大拇指信箱」和徵文活動，真實反映了當時中學生的校園生活與升學煩惱。《素葉文學》除了強調本土文學培植，更極力引介世界經典；特別是 1982 年馬奎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香港作家由於相似的被殖民歷史而產生共鳴，進而大力推崇魔幻寫實風格。《博益月刊》具備電視廣播集團背景，則呈現了截然不同的城市文化

面貌，不僅兼容純文學作家與倪匡、亦舒等通俗文學作家的作品，更強調視覺文化的再現，例如刊載攝影師李家昇捕捉香港城市流動的「滑過的美學」攝影作品。

在演講後的交流環節中，與會者針對河本美紀提及的一部未拍成電影的劇本《香閨爭霸戰》提問，河本美紀補充說明該作品同樣屬於愛情喜劇的類型。此外，有與會者呼應河本美紀關於「日本現況有點像以前的香港」觀察，進一步拋出「台灣未來是否也會越來越像香港」的深刻提問。



新書論壇 II 政治重構*

主持人 | 莊瑞琳^a

發表人 | 李靜君^b、Stephan Ortmann^c、黎恩灝^d、何明修^e、梁啟智^f

記錄 | 羅詠濤^g

本場次聚焦於 2025 年出版的五本專書，作者們受到 2019 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及其後《國家安全法》帶來的社會政治劇變啟發而撰寫。這些作品分析威權擴張與法治衰退的困境，並且揭示社會抗爭的本質、多元策略以及身分認同的持續塑造。

Forever Hong Kong: A Global City's Decolonization Strugg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一書，圍繞去殖民化 (decolonization) 概念分析香港抗爭。作者李靜君 (Ching Kwan Lee) 指出，本書從普通人而非官方或菁英的視角出發，並透過更長期的去殖民化歷程來定位 2019 年的事件。有別於主流分析框架從社會運動或民主化運動理解自 1997 年以來的群眾抗爭，李靜君主張，這一系列廣泛訴求不僅牽涉治理體制或社會改革，而且更根本地觸及香港的身分認同建構。這些抗爭共同凝聚為一個社會試圖對抗和擺脫殖民權力的動態，關鍵問題在於：在什麼條件下人們從安於現狀轉變為起身行動？即使曾有少數群體抵抗英國殖民統治，仍然必須解釋 1997 年以後香港人主體性的形成，以及其如何在群眾政治中逐漸發展。

* 演講於 2025 年 12 月 5 日，在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進行

a 春山出版社總編輯

b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

c 香港都會大學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d 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律中心高級研究員

e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f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客座助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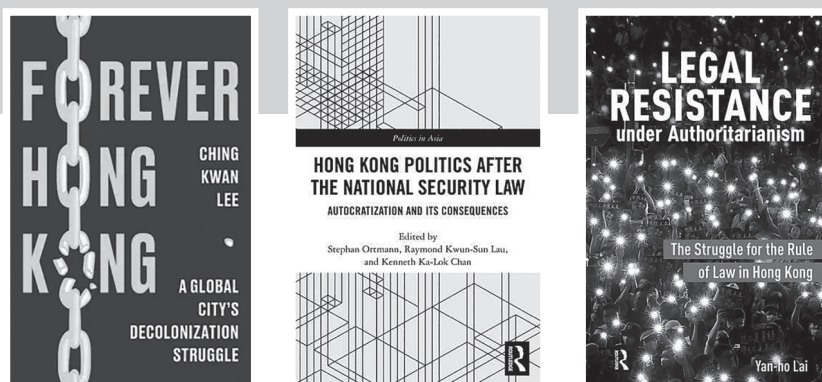
g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由左至右：莊瑞琳、何明修、Stephan Ortmann、李靜君、黎恩灝、梁啟智。

Hong Kong Politics aft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Routledge) 收錄一系列文章，探討香港自由社會的萎縮及其影響。這些跨學科、多元方法的文章分別從治理、司法、輿論、教育、認同和海外離散社群等面向切入，深入國安法帶來的轉變，並且探討人們如何看待、適應和繼續行動。國安法之後，當局陸續推動立法會與區議會的選舉改革，接著實施基本法第 23 條，進一步侵蝕既有社會與政治運作條件。本書編者之一的 Stephan Ortmann 提醒，自由主義社會與政治體制在各方面遭受的威脅，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同時發生的進程，本書所描述和分析的香港時局，必須被視為威權化 (autocratization) 前沿地帶的關鍵案例。

Legal Resistance under Authoritarianis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探討中國威權擴張下的香港法治。作者黎恩灝 (Eric Yan-Ho Lai) 指出，多數研究由上而下地關注中國如何介入當地司法運作，本書則以由下而上的視角追問其他行動者如何回應。他的訪調對象包括公民、律師、學者和前法官等，發現香港法治受損不僅是近年現象，行動者的觀點呈現出制度侵蝕遠早於國安法，甚至可以追溯到香港主權移交之前。中國巧妙地結合殖民遺產與威權手段，塑造有利統治的法律。此外，由於政權本質的差異，中國也試圖消解香港法律的意識形態與制度實踐，將之吞併到自身體系之中。中國早自 1997 年之前就廣泛運用各種滲透途徑，與體制內菁英建立聯繫，目的是重塑規範與專業文化。另一方面，自由派的律師等專業人士也展開行動，試圖抵抗香港法治的威權化。在民主的法律與制度衰退時期，這些行動維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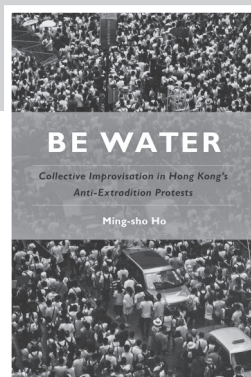
著公眾的政治能動性。

何明修的 *Be Water: Collective Improvisation in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Protests*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一書，剖析反修例運動的形成經驗在理論上的特殊性。這一案例的重要性在於，其抗爭強度極高，涉及大量人力與資源分配；然而，在缺乏明確的、有組織的領導核心的情形下，不僅成為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抗爭事件，其行動影響甚至延伸到香港之外。近年來，各種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和抗爭日益受到研究者關注。在凸顯行動者的理論取向下，何明修提出「集體隨機應變」(collective improvisation) 概念，以說明去中心化的參與機制如何可能。

《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左岸文化) 收錄十篇文章，從地緣政治經濟、公民社會、媒體、文化記憶等面向著墨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並橫跨全球、城市與社群等多個尺度。編者之一的梁啟智指出，香港的變局必須理解為中國因應全球秩序的戰略調整，以及從帝國方略、政府重組，到公民社會改造等制度轉型，固然導致壓迫，同時也凸顯出社會的韌性。在日常生活和社群活動當中，圍繞香港認同的非正式行動、媒介以及海外港人網絡，仍在延續港人的公共關懷。梁啟智強調，本書並不認同香港公民能動性「崩潰」的敘事，因為在社會歷經巨大的抗爭、壓制、流離和重構之後，香港人面對一個已然從根本轉變的政治環境，依然持續以有創意的方式回應。

綜合討論

主持人莊瑞琳首先向李靜君提問，如何理解去殖民化抗爭的核心特徵，以及2019年之後香港抗爭將何去何從。李靜君回應，未來的變化難以預測，不僅取決於社會本身的變遷，也取決於北京當局的決策，因為香港發生的一切必然與中國政治連結在一起。*Forever Hong Kong* 的重要脈絡之一，是資本主義在兩種政治經濟結構之間的斷裂，亦即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與中國的威權國家體制。當社會經歷兩種



體系下的矛盾與危機時，人們的利益、觀念和行為將隨之改變。香港既是一座資本主義下的全球化城市，又必須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統治戰略所形成的矛盾塑造新世代的行動者。他們成長於亞洲金融危機以後的反向力量，即反新自由主義運動、社會正義運動等，二十多年來持續奮鬥的「熱情少數」，逐漸推廣對政治的關心和集體行動的意識，最終影響並動員了「務實多數」。李靜君認為直到 2019 年的抗爭，整個過程都存在一股強烈的底蘊：對新自由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要求更多政治權利、反對中國政策的訴求並存。斷裂與危機迫使人們反思自己是誰、利益為何、想要怎樣的社會，最終甘冒風險去挑戰從英國到中國的殖民主義。

黎恩灝繼續討論殖民結構對香港法治歷史的影響，以及抵抗的策略，指出法律移植（legal transplantation）作為一種殖民戰術，先後貫穿由英國到中國的統治時期。例如 1960 年代香港制定的《公安條例》（*Public Order Ordinance*），源自英屬馬拉威用來鎮壓當地反殖民運動的法律，如今中國政府也以該條例逮捕與起訴示威者。另一個例子是煽動罪，它將言論與出版行為刑事化，同樣是英國時期的產物並最終被中國政府運用。黎恩灝強調，任何只聚焦在單一殖民體系、忽視法律移植過程的論述，都很可能流於偏頗。此外，對於當前法律專業人士的抵抗，他提出三種途徑。第一是普及法律知識，由一些自主串連的律師團體或協會嘗試喚醒大眾對法治的關注。第二是由於政府在審訊期間不會安排律師，導致對警方濫權的隱憂，律師們便義務性地組織起來，維護被捕者的權益。第三種抵抗方式更隱微，是選擇與受到高度政治控制的監管機構保持距離，維持「鄰近但不鑲嵌於其中」的狀態，並努力抗衡司法和學術體系中那些親政府的成員。在有限的空間裡，法律專業社群仍持續質疑香港法治中的知識壟斷、正當性與問責性。

然而，從中國政權的角度而言，壓制之後下一步的治理目標會如何實現？關於國安法的深層影響是否超越了對政治反對派的打壓，Ortmann 舉出 *Hong Kong Politics after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書中對於法律與教育兩個層面制度變遷的討

論，強調社會穩定與重塑認同是政權的治理目標。國安法主要是為了抑制任何的反抗努力，但與此同時，為了跨國投資與工商業繁榮，必須維持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活力。因此，既有司法機構並未完全被拆解。在教育方面，Ortmann 指出確實存在試圖重塑下一代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政策邏輯，例如在教科書中將香港人納入大中華體系和中國人身分，並確保一國兩制被重新定義。這些以中國為中心的元素更在公共空間中積極布局，從教育場景到公民社會，首要目標都是壓縮香港人對其政治權利和司法環境的質疑，將意見形成圈限在特定的範圍之內。

面對新的控制形式，梁啟智、何明修分別提出香港社會的韌性。梁啟智指出，當體制內的民主路徑受阻，行動者的參與會出現兩種轉向：一方走向國際戰線，另一方則深耕社區與小群體。儘管地方政治長期被北京派系支配，但 2014 年佔領運動後的各種實驗，促使人們開始以社區居民身分參與動員，進而促成區議會選舉勝利與社區報興起。其中的關鍵在於，雖然政治陣營資料顯示「民主派」的支持人數減少，但自詡為本土（local）派別的比例卻顯著增加。換言之，當局運用強制權力來追求社會穩定，同時大幅削弱體制內民主價值的運作，反而使港人在社區尺度上維繫與中國有所區別的認同。梁啟智主張，透過連結多重且看似衝突的視角，才能完整掌握當前香港社會的轉變與韌性所在。何明修則從跨國交流面向，補充了台灣和香港社會之間的連結。他回憶自馬英九時代以來，兩地的公民社會參與者嘗試建立跨境聯繫，而關於本土主義的討論基本上非常相似，然而隨著國安法的實施，這種聯繫與政治主張可能不復以往。儘管如此，從各項關切行動者的研究成果來看，何明修和梁啟智都不認為香港民主已經徹底結束。

綜合來說，本次論壇從幾個方面深化對中國威權擴張和香港社會危機的討論。講者們闡釋威權化與殖民遺緒的歷史關聯，以及後國安法時期社會政治控制的戰略邏輯與實踐。他們也從各自的角度探究香港人的主體性、抵抗和集體行動如何在動盪中激發與重塑，並且凸顯仍然是一段未竟的故事。

大外宣的最嚴肅討論 統戰、灰域與中共的不對稱優勢

撰稿 | 李厚辰*

編按：台灣由於現實處境，近年對「統戰」、「大外宣」的爭論無數，但也眾說紛紜，良莠不齊，或使「統戰」、「大外宣」愈加便於見縫插針。此篇文章直面這些議題，發表於社群專頁，行文平易，也有深刻的解析，引起不少關注。作者李厚辰為旅日中國獨立研究者，早已活躍於各重要媒體，理解、統整、表述各方觀點脈絡的能力，尤其出色，更不憚回應攻訐。本通訊取得作者同意，全文轉載，僅部分文字修改為台灣慣用詞語並增添註解，首發於台灣公共媒體場域。

關於「大外宣」的爭論，落入「是不是『抓間諜』」，「是不是意識形態黨同伐異或文革遺風」，是一件頗遺憾的事情。

「大外宣」這個詞把問題錯誤地歸入了「宣傳」。所有爭論好像都要關於「說了什麼」、「說得對不對」、「宣傳是否有害」。於是我們陷入「先證明言論錯誤，再證明大外宣」的遊戲，而對方從來不需要為任何一條胡言亂語負責，因為他隨時可以退回「我只是發表個人看法」。這場爭論打了一年多，誰也沒有贏，只是所有人都累了。

但中共自己並不是這樣歸檔的。開宗明義，討論大外宣不可能脫離「統戰」。如果認為「大外宣」是造作的假議題，其等價議題就是——統戰工作不存在。

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裡寫下那句此後八十多年被反覆引用的話：

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

* 旅日中國獨立研究者、《世界苦茶》平台創辦人

武裝鬥爭在 1949 年後已經越來越罕見，黨的建設是內部事務，唯一被完整保留、並且在今天仍在擴張的，只有統一戰線。而在更早的 1925 年，〈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¹的第一句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它是所有政治活動的第一個動作。先分類，再行動。統戰的全部技術都建立在這個動作之上：把人群劃成敵人、朋友和中間地帶，爭取中間，孤立敵人，轉化對象。這是統戰工作的全部內容，也是大外宣的全部事項——關於人。

關於大外宣的第一個問題：中共是否將海外互聯網 KOL 當作其工作的關鍵？

2015 年 5 月，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中——注意這個會議本身剛剛從「全國」級升格為「中央」級——習近平說統一戰線是「凝聚人心、彙聚力量的強大法寶」，並且明確「統戰工作是全黨的工作」。同一次講話裡他專門點了新媒體從業人員和網路「意見領袖」，說他們「能左右互聯網的議題，能量不可小覷」，要求建立經常性的聯繫渠道。

2018 年 3 月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做了一件更實的事：把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國家宗教事務局併入中央統戰部，並由統戰部統一領導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併入僑辦的官方理由寫得毫不含糊：「加強黨對海外統戰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也正是通過這次併入，中國第二大官方通訊社中國新聞社的歸屬，從僑辦轉到了中央統戰部。統戰部的職權在不斷擴大。

2020 年 12 月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裡，新增了「海外統一戰線工作和僑務工作」一章，統戰部的法定職責中寫入「統一領導海外統一戰線工作、統一管理僑務工作」，同時還有「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負責統一戰線宣傳工作」。而統戰系統自己的理論刊物把兩者的關係說得更直白：宣傳工作部門要強化大統戰意識，統戰部門也要強化大宣傳意識——大統戰、大宣傳。

這就是這場爭論裡最反常識的地方。質疑大外宣被指控「在搞陰謀論、在捕風捉影」的那個東西，是對方寫在黨內法規裡、開會見報、逐級設立領導小組，並且擁有一家通訊社的公開建制。中共幾乎從不隱藏它要幹什麼。它隱藏的，只是具體誰在幹、誰歸誰管。這種「透明的祕密」是中國人最熟悉的政治質感——文件人人可讀，事項人人知曉，運作永遠不可查。你在國內讀過無數份《意見》、《條例》、《通知》，你知道它們寫的都是真的，你也知道你永遠查不到它們在你身邊

¹ 毛澤東於 1925 年撰寫並發表於《革命》半月刊，後被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首篇。

是怎麼執行的，你甚至不知道網格員在哪裡，他知道了你的一些什麼。

而把「大外宣」放回「統戰」裡，會立刻帶來一個判斷上的轉向，我認為這是整篇文章最重要的一句話：

統戰不生產內容，它生產說話的人。

宣傳部門生產內容，那是《人民日報》和 CGTN² 的工作，掛著招牌，誰都知道看的時候要折扣。統戰部門生產的是別的東西，是一個看上去與它無關的人，用他自己的語氣，在他自己的平台上，對他自己的聽眾說話。內容只是這個人的輸出，而這個人才是產品。

所以，討論「大外宣」的正確方式，不是繼續留在很多人的語境裡，把一切當成言論和觀點的問題，而是把問題移回它本來所屬的範疇。宣傳的單位是「內容」，統戰的單位是「人和關係」。前者問「他說得對不對」，後者問「你屬於誰？這層關係是怎麼建立的？」。前一個問題永遠打不完，後一個問題如果有關鍵證據和疑點，當然就可以講。

而要看清後一個問題，最好的樣本是台灣。

台灣——一場跑完了全程的統戰外宣戰

台灣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把「統戰外宣」從「收購、置入、轉向到起訴」，完整跑了一遍並且把結果公開的地方。它是一場自然實驗：當一個社會擁有屬地管轄、母語媒體環境、可修改的法律和能定罪的法院時，反制這種輿論戰能做到什麼程度，又會在什麼地方失敗？我們今天對「大外宣」的疲憊和中共的反制手段，在台灣都發生過。

台灣現在的狀況和我們一樣，誰都知道中共有威脅，誰都知道中共在進行認知作戰，但大家知道風險存在，卻無法形成一套可信、克制、跨黨派的制度回應。對中國不信任，也不信任黨派和個人如何使用中國威脅。就像在海外，誰都不信任中共，都知道一定有海外統戰，但不信任任何人對海外統戰的懷疑和揭露。

這是中共蓄意設計的結果，我們之後會細說。

2 中國環球電視網（China Global Television Network），又稱中國國際電視台，是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所屬的一個外語電視網，受中國政府資助並受中共中央宣傳部領導。（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報告主任，我們買了中時」

台灣的紅色媒體故事，起點不是內容，是機構和人，產權。

2008 年 12 月，蔡衍明買下中時集團後，面見時任國台辦主任王毅，說明收購經過，稱收購中時是希望「借助媒體的力量，來推動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王毅當場表態，集團將來若有需要，國台辦定會全力支援。這場會晤外界本來並不知情，是旺旺集團在中國發行的內部刊物《旺旺月刊》刊出了短文和合影，被《天下雜誌》在 2009 年揭露，以〈報告主任，我們買了中時〉為題做了報導。這不是外洩，是自曝：在北京那一側的語法裡，見主任、彙報、獲得支持是一件值得留影紀念的事；在台北那一側，它是一家主流報業集團易主後的第一場彙報。

再往下兩層是買版面和買編輯台。2010 年 11 月，監察委員吳豐山調查確認中國政府以置入新聞的方式購買台灣報紙版面，點名的例子包括《聯合報》配合湖南省考察團刊出的湖南專題、《中國時報》配合陝西省官員訪台刊出的陝西專題，讀者看到的是新聞，實際發生的是採購。2015 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李嘉艾的論文³裡已有該集團受訪者描述，總編輯、總主筆、社長這個級別的人會被叫到北京參加對方主持的新聞會議；2019 年 7 月，《金融時報》的席佳琳把這件事寫成報導，⁴直指記者與編輯台直接聽命於國台辦。旺中隨即召開記者會稱此為惡意中傷的假新聞，並控告《金融時報》、翻譯引述的中央社與轉載的政治人物羅文嘉，2021 年初撤告；NCC 同時啟動行政調查，2020 年 11 月中天新聞台不予換照。

三層有一個共同點：每一層都不是關於內容，而是關於內容由誰決定。而每一層被揭露時，靠的都是產權、會晤、人事和帳目，「你無法通過駁斥一篇湖南遊記來發現它是採購的」。這也正是「外宣」與 RFA、VOA、DW⁵ 的徹底差異所在。

買一家電視台需要幾十億、需要股東會、需要主管機關核准，而且一旦被盯上，它是個固定不動的靶子。買一個人不需要，於是中共轉向人。

形態轉移最完整的案例是 2026 年 5 月的「馬德案」。橋頭地檢署偵辦網路主播林宸佑，認定他收受中方資金「來洗腦台人」，同時以虛擬貨幣行賄國軍人員取得軍事機密，依《反滲透法》等三項罪嫌起訴，求處合計十七年。這個案子把兩件

3 李嘉艾碩士論文《臺灣媒體生產政治中的中國因素與獨裁者邏輯：以 C 集團為例》。

4 “Taiwan primaries highlight fears over China’s political influence”, Financial Times, Kathrin Hille, July 17 2019.

5 即：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

通常被分開處理的事裝在同一個被告身上：對外的言論生產和對內的情報竊取。在過去的討論裡，「網紅」和「共諜」被想像成兩種物種，前者最多是立場問題，後者才是法律問題——馬德案說明，在中共的作業邏輯裡，它們只是同一個人身上的兩項任務。

而更大量的部分處在起訴門檻之下：網紅、直播主、退役軍人、地方意見領袖被組團邀請赴中參訪，接受落地招待，回來之後內容的重心和口徑發生變化——和我們在簡中創作者身上看到的變化一模一樣。就像館長赴中之後，不管是國台辦還是他本人，都一再強調是自主行動、不受任何人指派。這句聲明當然不可能是真的。

名嘴——台灣版的「你是不是大外宣」

在台灣社會真正吵了十幾年、至今沒有結論的，不是電視台的股權，是幾張具體的臉。

蔡正元、郭正亮、歷史哥、賴岳謙、謝寒冰、介文汲、栗正傑，這份名單在台灣幾乎人人能背，圍繞他們的爭論和 X 上今天的爭論一字不差：他們只是立場親中而已；他們說得對不對才重要；沒有金流指控別人被收買就是抹紅。

台灣把這件事推進到了可以拿數據說的程度。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統計 2023 年 7 至 9 月中共官媒的抖音訊道，發現被引用最多的台灣政論名嘴前十位依次是介文汲、賴岳謙、郭正亮、蔡正元、帥化民、謝寒冰、唐湘龍、趙少康、栗正傑、王鴻薇；而這前十位名嘴在中共官媒抖音上出現的影片總數，是台灣總統與總統候選人的 2.41 倍，影片時長 3.59 倍，觀看次數 6.53 倍。在中共對台的輿論產品裡，台灣名嘴的分量是台灣總統的六倍。而國台辦自己的網站還會回頭轉載台灣媒體關於「名嘴聲量排行」的報導，它在盤點自己的貨架。

但這裡才是關鍵：這些人沒有一個因此被起訴過（蔡正元是因為業務侵佔）。台灣有判決書、有反滲透法、有能把一個網路主播求刑十七年的檢察官，卻對這份名單完全無能為力。原因不複雜，他們幾乎不需要被收買。郭正亮是民進黨前立委、綠營出身，如今公開傾向和平統一；這種轉向在台灣被議論了很多年，卻從來構不成任何法律事實。他們的內容在台灣의 電視台有酬勞、在自己的頻道有流量、在對岸有搬運和放大，收益鏈條上每一環都合法，每一環都可以用「我本來就這麼想」解釋乾淨，如同大外宣一樣。

這就是「系統可證、個案可否」最完整的一次演示，也是我認為整件事裡最便宜的一種外宣形態：中共不需要徹底買下他們，只需要放大他們。內容由本地人自

費生產，對岸只負責分發。想找金流是找不到的，因為這裡根本不產生金流，也不需要有人下指令。

台灣人吵了十幾年也沒吵出結論，這不是台灣人不夠聰明。這是這個設計本來就不打算讓人吵出結論。

判決書作為證明

台灣有一樣東西是我們質疑「大外宣」時沒有的：判決。

台灣共諜案的起訴人數，2021 年 16 人，2022 年 10 人，2023 年 48 人，2024 年 64 人，2025 年前九個月又起訴 24 人。比人數更關鍵的是刑度，國安局長蔡明彥公開說過，過去共諜案審判之後平均刑期只有大約一年，而到 2025 年平均刑度已是 6 年 2 個月，近五年定罪率 85%。

「這只是一場抓特務的表演」這個說法，在沒有司法判決的地方永遠無法被推翻，因為那裡的一切都只能停留在揣測。司法系統的作用就是揭開盲盒，把揣測鎖定為事實。

而這正是我們不具備的，並且請記住上一節的那份名單：即便是台灣，這台機器也只構得著馬德，構不著郭正亮。

議題是怎麼變得令人厭惡的

然而，就在這條曲線一路走高的同時，台灣社會對這個議題的耐受度，走出了一條完全相反的曲線。

2014 年太陽花運動之後，跨黨派的對中警惕大致還是社會共識；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加上 2020 年大選，「抗中保台」達到效力峰值。但峰值本身就埋下了後來的東西，議題從一個安全判斷變成了一張選票，所有權被一個政黨實際壟斷，於是它此後的信用將和這個政黨的執政表現綁在一起浮動。

2020 年 11 月中天不予換照，無論主管機關的程序是否站得住，「政府關掉一家電視台」這個說法都讓人警覺，「綠色威權」從此有了一個可以反覆引用的具體例子。而更致命的素材來自另一邊：楊蕙如網軍案定罪，關西機場假訊息事件裡，最終被司法確認的操作者，是綠營側翼。從這一天起，「兩邊都在操弄」不再只是一種情緒，它有了判決書。中間選民在這個階段學到的教訓是：轉發任何一方的輿論戰指控，都可能在三個月後被打臉。

2022 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把地方選舉打成抗中公投，慘敗；2025 年大罷免以「抗中保台」為主框架，31 席加 7 席全數失敗。到 2026 年，情況是這樣的：

起訴數、定罪率、刑度全部創下歷史新高，而這個議題在選舉裡已經完全不能用了。

兩條曲線的背離，就是議題「毒化」成功的定義。它證明了一件事，議題的真實性和議題的可用性，是兩個完全獨立的變數。毒化一個議題，從來不需要證明它是假的。讓他無法被討論就可以了。

三個詞

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次針對紅色媒體的揭露和執法，都被三個詞翻譯：綠色恐怖、麥卡錫主義、政治辦案。

這三個詞不是台灣本地發明的。回到 2019 年《金融時報》那篇報導見報的當晚，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的回應是這樣的：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為了撈取選舉私利……不遺餘力地打擊持不同立場的台灣媒體，企圖箝制島內批評言論，製造『綠色恐怖』與寒蟬效應」，而通過外國媒體炮製謠言，是他們「又一拙劣的政治和選舉伎倆」。

請注意這段話完成的三個標識，它們在同一天、同一份新聞稿裡全部到位：把編輯台受指令的指控轉譯為「打擊持不同立場的媒體」；把反制轉譯為「箝制批評言論」；把揭露者轉譯為「炮製謠言」。這套說法在指控發生的當晚就已經備好，隨時可以調用。在 X 上反制「大外宣」的說法，也就是這三個。

必須誠實的另一半

誠實地說，「大外宣」標籤通膨是內生的。把「抗中保台」延伸到萊豬、藻礁這些內政議題，把不同意見者一律側翼化圍剿，是把安全議題的信用預支給政策動員。中間選民的厭惡，首先是對這個預支的厭惡，中共只是放大器。

網軍也不是單邊的。楊蕙如案是綠營的，而且是定讞的。一個誠實的論證必須先承認這一點，然後才有資格說下一句：一方的網軍是選舉操作，另一方的網軍後面站著一個部級機關和一部條例，這兩件事在規模、目的和可持續性上都不是同一個量級，但它們確實都是操作，而且都傷害了這個社會的資訊環境。這是 whataboutism 操作的事實基礎。

司法也確實會打空。2024 年涉案的馬治薇，一審在《個資法》部分判刑 8 個月，而《國安法》與《反滲透法》部分因檢方證據不足無罪。在被毒化的話語場裡，這個結果被讀成「看，根本沒事」。它實際上展示的是另一回事：刑事證據標準和統戰外宣手法的設計之間，存在一道結構性的落差。這一點我們下一節會詳細

講。

這些必須先說，因為它們是真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汙名操作的結構裡，防守方自己不說，對方就會替你說，並且是以「揭露」的姿態說。

灰域——被設計出來的，不是被迫的

現在回到那道結構性落差，也是很多人不願意面對的：大外宣必然是灰色問題。

統戰外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混合結構：方針完全公開，執行完全可否認。《統一戰線工作條例》全文可查，中央統戰工作會議見報，中新社的歸屬白紙黑字，系統層面高度透明。我想對中共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共一定在海外買通 KOL，所以當徐某人的錄音出來時，⁶ 其實很少有人表示驚訝。但每一個具體節點——哪個平台、哪個頻道、哪個協會、哪個人——的歸屬關係，被刻意做成不可證明。

公開的方針解決內部動員和合規問題，讓整個系統知道該往哪走；可否認的執行解決外部歸因問題，讓對手永遠證明不了眼前這個具體的人屬於這個系統。兩件事合起來，才是這套安排真正的效力所在。

由此產生了整件事的樞紐，我把它叫做「系統可證、個案可否」落差：你可以用文件鏈證明系統存在，但你幾乎不可能證明任何一個給定的個案屬於系統。而公共討論恰恰是以個案為單位展開的，於是防守方永遠在打自己最弱的那一仗。

必須強調，中共外宣的灰色是設計出來的，不是能力不足的結果。這一點在中共自己的文件裡就寫得很清楚。

中共在國統區隱蔽戰線的方針是十六個字：「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配套的工作要求是「三勤三化」：勤學、勤業、勤交友，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請注意這個要求的性質：它命令潛伏者成為模範公民。工作認真、待人熱情、社會關係良好、法律上無懈可擊。

把這條八十年前的紀律翻譯成社交媒體時代的版本，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東西：一個受雇的言說者，最有價值的狀態不是喊口號，而是看上去比誰都獨立。他要有自己的風格、自己的私生活、自己偶爾的抱怨、甚至自己對中共某些方面的批評。這些批評是這套設計要付的成本，用來換取可信度。理解了這一點，「他也罵

⁶ 海外中國軍事網紅「說真話的徐某人」去年底在 X 平台公布一段錄音檔，招募他為中共做外宣。〈海外中國網紅公布錄音 指共軍中間人開月薪 148 萬 欲收買批評台灣〉，中央社，2025 年 12 月 20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512200196.aspx>

過中共，所以他不可能是」這個推理就失效了，因為它恰恰是這套設計要生產的推理。

同樣地，這條紀律有一個必然的副產品：當一個人平常的表現就是比周圍人更獨立、更有個人風格、更無可指摘，那麼任何基於觀察的合理懷疑，看上去都是在攻擊一個真誠的人（雖然現在大外宣們普遍做不到）。潛伏紀律和汙名話語因此互為條件，前者保證多數具體指控查無實據，後者把這些落空的指控加工成體制性迫害的證據。

對台工作的口號是同一套東西的延伸：「以商圍政、以民逼官」、「入島入戶入心」。這些口號寫的是操作面該埋在哪裡：埋進商業、民間和家戶，而不是政治組織。

這個選擇的政治後果是精確計算過的，當外宣的落點從官媒轉移到民間言說者，反制就必然表現為對個人言論的追究。關掉一家電視台，畫面是政府關掉一家電視台；起訴一個網紅，畫面是政府起訴一個網紅。防守方每反制一次，就替對方的「獨裁」說辭免費宣傳一次。在 X 上則體現為「你看他們又在抓特務」。

更需要講清楚的是下面這一層：統戰外宣的成熟操作不雇用說謊者。

它篩選並放大那些動機真實的在地言說者。做兩岸生意的人真心希望局勢緩和，做內容的人真心需要大陸的流量和市場，討厭本國執政黨的人真心討厭他們，覺得戰爭恐懼被誇大的人真心這麼覺得。這些人能通過任何測謊，因為他們沒有說謊。於是「你收了錢」這個指控在他們身上必然失敗，而失敗會被立刻回收為「看，假議題」。

所以準確的說法不是「誰被收買了」，而是「誰的激勵被接上了」。這兩句話的證據結構完全不同，前者需要金流，後者只需要觀察行為隨利益結構的變化。而我們絕大多數人的直覺停在前一句上，一定要找金流——這正是這個設計要的效果。

把反外宣變成罪名——一套用了一百年的劇本

台灣和我們應對「大外宣」有同樣的命運。相似的原因不在我們這一側，在統戰那一側，統戰系統對此有同樣的劇本應對。

中共對「揭露外宣」的汙名化，從建黨初期就開始運行，並且反覆使用。它的核心結構一百年沒變：

把對手的反滲透努力，重新解釋為對該社會最高正當性價值的背叛。

變的只是那個價值叫什麼名字。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那個名字叫「革命」。黨內合作的結構本身，把懷疑變成了派系罪名，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於是「清查滲透」在組織上就等於「清洗同志」。1924年張繼、謝持等人提出的彈劾共產黨案被孫中山壓下，提案者被歸入「老右派」；西山會議派1925年要求分共，1926年國民黨二大直接給予處分。「提出滲透問題等於反革命」，在黨紀層面被制度化了。與此同時，陳獨秀多次公開聲明中共無意包辦國民黨，而聯共（布）⁷與共產國際的檔案顯示，同期存在系統性的黨團建設與部門滲透指令。

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那個名字叫「抗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這組口號，把《限制異黨活動辦法》一類的措施重新編碼為「製造摩擦」，進而編碼為「客觀上助日」。反共等於分裂，分裂等於投降，這條語義鏈條完成之後，任何反滲透舉措都自動帶上了「通敵」嫌疑。皖南事變是這套操作的教科書案例：軍事前史被寫成敘事，「千古奇冤」經由《新華日報》、重慶外交圈和同情的外籍記者放大——請注意這裡的手法，它本身就是一次極其成功的外宣，把國民黨後續任何鎮壓的國內外政治成本抬到不可承受。

而這裡有一個必須點破的機制。此後軍統、中統的真實濫權——這一點必須承認，那是真的——被普遍化為「特務統治」，與此同時，中共社會部系統在公共記憶中保持完全不可見。一方的反滲透機關成為一個時代的道德符號，另一方的滲透機關根本不進入畫面（如果沒有《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整套操作能成立，就是靠這種「一邊看得見、一邊看不見」的落差。

到了當代台灣，那個名字叫「民主」，具體的詞就是馬曉光在2019年那份新聞稿裡用的「綠色恐怖」與「寒蟬效應」。⁸

而在簡體中文的互聯網上，這套劇碼最新、也最狠的一個變體是：「你們又在搞文革，又在抓特務。」這一句的效力來源和前面所有變體都不同。它劫持的不是宿主社會的抽象價值，而是簡中受眾自己最真實的歷史創傷。經歷過、或者聽父輩講過互相檢舉、劃清界限、人人自危的中國人，對「抓特務」這三個字有生理性的抗拒，這種抗拒是完全正當的，也是這套記憶留給我們最寶貴的東西之一。

而這份正當的創傷，現在被用來為一套現役的、正在運行的輿論戰系統提供掩

7 「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簡稱。

8 <國台辦：民進黨當局製造「綠色恐怖」和「寒蟬效應」>，央視新聞，2019年9月11日，
<https://item.btime.com/f30u0qukk1s8f4rc7r7l4ah0ssi>

護。它讓逃離過政治鬥爭的人，反過來為鬥爭機器站崗。當然還有「反華」這個詞，最近很多人開始操起這個話語，批評中共不能「反華」。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對這句話必須寸步不讓。文革的核心特徵是國家權力對私人進行無程序的定罪與人身消滅；而在 X 上說一句「我懷疑你是大外宣」，是零權力的公民對疑似受雇者的言論監督，它不帶來任何懲罰，甚至不帶來任何後果，被質疑者隨時可以反駁、可以拉黑、可以繼續經營他的帳號，並且通常還能因此漲粉。把這兩件事放在同一個詞底下，不是記憶，是對記憶的盜用。

海外中國人與海外互聯網——真正的深水區

台灣至少有判決書。海外沒有，而海外恰恰是這場爭論真正發生的地方。

一條可以逐年查證的方針

2015 年「大統戰工作格局」提出，2018 年僑辦與宗教局併入統戰部、中新社隨之轉歸統戰部，2020 年《條例》新增海外統戰專章，2022 年中央統戰工作會議要求「進一步完善大統戰工作格局」。這條鏈上還有專門針對互聯網的關鍵一環：

2019 年 11 月 28 日，中央統戰部與中央網信辦聯合召開網絡人士統戰工作會議，尤權講話，網信辦主任莊榮文作報告，要求加強網絡代表人士隊伍建設、支持其在輿論引導中發揮作用。這是統戰與網信兩大系統首次以聯席形式為「網絡統戰」定調。此後各地普遍建立起領導幹部列名聯繫網絡代表人士的制度、聯席會議機制和「網絡人士智庫」。

請把這個會議的名稱再讀一遍：網絡人士統戰工作會議。不是網絡內容會議，不是網絡宣傳會議，是人士。這份公開文件自己說明了產品是什麼。

所以海外互聯網輿論在這個體系中的位置是清楚的：統戰系統抓人，宣傳系統抓內容，網信系統抓平台與輿情，三個系統在這裡交匯。

沒有金流，因為它有時根本不用金流

現在可以回答那個最常見的質問了：沒有證據、沒有金流，指責別人是大外宣不就是獵巫嗎？

海外統戰的主要貨幣不是錢，是可撤銷的准入權。

回國的簽注、老家父母的平安、大陸市場與流量變現、社群裡的地位、生意上



廈金大橋廈門端（芋頭攝）。

的機會、活動上的座次、下一次參訪團的名單。這些都不留轉帳紀錄，卻比現金更硬——因為現金是一次性的，而准入權是可以每天重新評估、隨時收回的。一個人只要有一次回國探親的需求，他就已經站在一個可以被開價的位置上，而這個過程不需要任何人開口。

所以「沒有现金流就是獵巫」這個論證，是拿刑事偵查的證據模型，去套一個刻意設計成不產生现金流的系統。它看起來嚴謹，其實是打在了空處。

對中國讀者來說，這一條應該最容易理解，因為你有切身經驗：真正讓一個人配合的，從來不是發錢，是「能不能辦事」「會不會有麻煩」。

海外比台灣少了三樣東西

台灣能做到的那些，海外做不到，原因可以精確到三件事。

第一，沒有一台能生產司法事實的機器。這是最關鍵的一件。司法程序有強制取證權，又有正當程序賦予的正當性，因此能把懷疑轉換成任何陣營都必須繞開的公共事實。台灣能起訴一個主播並求刑十七年，靠的就是這台機器。而海外的歸因由公民社會承擔，它們沒有搜索票、沒有傳喚權、沒有交叉詰問，產出的是主張而不是事實認定。

第二，沒有平台管轄。台灣的執法可以觸及 LINE 和 Facebook，各國監管機構可以傳喚平台。而 X 上的黃推，甚至都有人以「低成本」主張不是中共做的。

第三，沒有政治共同體。海外華人離散社群不是一個「我們」——沒有立法權，沒有集體決策機制。台灣可以選擇修《反滲透法》、可以在立法院吵三年然後表決；海外華人沒有任何機制可以去「選擇」一項防禦政策。防禦只能搭便車於居住國的優先順序，而居住國的對華政策由貿易和安全等更大的變數主導，海外華人非常被動。

最後是雙重懷疑的效果。北京的監控，加上居住國社會的忠誠懷疑，使海外華人個體最理性的策略是「乾脆什麼都不說」。在台灣，毒化還需要靠惡鬥來抬高參與成本；在海外，身分結構本身就已經把中間派清空了，話語場無成本地讓渡給高動機的少數人。

這就是「別再吵大外宣了」能夠在 X 上一路暢通的結構原因。沒有判決書墊底，沒有平台管轄劃界，也沒有一個「我們」可以決定要不要防守。

一場不對稱的輿論戰

把上面這些放在一起，這場戰爭的形狀就出來了。它的不對稱至少有五個維度，而且每一個都在自我強化，有利於中共的統戰。

信息的不對稱。大外宣的真實數量（分母）永遠不可觀測，公眾只能看到被質疑的個案（分子），於是防守方陷入一個統計陷阱：揭露少被解讀「威脅是假的」，揭露多被解讀「獵巫擴大化」，分子的任何取值都可以被敵意詮釋，因為分母缺席。台灣就是現成的示範：它辦得了馬德，辦不了那份名嘴名單，於是「共諜案只是表演」這個說法在台灣始終有人信。而對方還可以要求刑事犯罪級的證據標準，這樣必然出現指控落空，馬治薇一案裡《國安法》與《反滲透法》部分的無罪，第二天就變成了「看，根本沒事」。你的標準越嚴謹，落空的次數越多，「抓特務遊戲」說法的彈藥越足。

制度的不對稱。言論自由保護言說者，新聞自由保護媒體，結社自由保護協會，通商自由保護商會。那 26 個由統戰部持股公司註冊的微信公眾號，在美國、加拿大、澳洲同樣受這幾條自由的保護；反制其中任何一條，都必須先在自己最珍視的價值上開一個口子。而反向卻不存在，民主社會無法在中國境內經營一個受眾千萬的言說者網絡，那裡沒有可收編的獨立媒體，沒有可滲透的自治社團，沒有受法律保護的外國資助管道。《境外 NGO 管理法》和不斷擴張的《反間諜法》，把那一側完全封死了。這是一場只有一個方向能穿透的遊戲。

組織的不對稱。2018 年一次機構改革，就把僑辦、宗教局併進統戰部，沒有聽證，沒有預算辯論，沒有反對票；統戰、宣傳、網信、國安、軍隊政治工作在黨

委統一領導下合流，在國內如何壓迫、國外如何跨境鎮壓，外界完全不可知。防守方在台灣被政黨輪替、部門本位、預算週期和議會監督切碎，政策記憶以四年為單位清零，上一屆政府建立的反制機制，常被下一屆當作前朝弊政清算——2025年3月一紙行政令砍掉自由亞洲電台九成人力，要等到2026年2月國會重新撥款才慢慢復播，就是現成的例子。對於海外中國人，組織更是零散，完全是游擊戰。

話語的不對稱。交流即和平，質疑大外宣即箝制言論，質疑中國人即反華。而防守這一側有一個繞不開的麻煩：要讓公眾聽懂，就得把話說簡單；話一簡單，就一定會有說過頭的地方；然後那句說過頭的話被單獨拎出來，用來證明整件事都是假的。進攻方不需要贏得任何一場論證，只需要等著這種錯誤出現，再把它放大。

成本的不對稱。徐某人拿出的數字是4萬歐元一個人，我不是說這個多，而是很少。台灣辦一個馬德案，從偵查、監聽、跨境金流追查到出庭，花掉的是幾年時間和數以百萬計的公帑，而且只辦得動一個人。而最根本的一層是勝利條件的不對稱：防守方必須一路走完，把事情查出來、把證據擺出來、讓人看懂、讓制度接手、讓社會不厭倦，五件事斷一件就輸；進攻方只需要一個條件，議題失能。不需要任何人愛北京，只需要「談大外宣」成為一件社交上的負資產，「毒化」即勝利。

這五個維度之上，還有四種會自己滾大的迴圈。

一是揭露越嚴謹、落空越多。用刑事標準去要求言論監督，指控必然經常落空，落空餵養「假議題」的聲量，聲量壓低參與意願，願意花時間查證的人越來越少，下一次指控的品質更低，於是落空得更頻繁。

二是每一次揭露都生成一份迫害敘事。迫害敘事趕走中間派，話語場被兩端極端者佔據，防守方話語因此更極端，摩擦更大，下一份迫害敘事更好寫。

三是對內把一切安全化——《反間諜法》擴張、全民國安教育、「境外勢力」——同時對外要求對手放鬆，「都是個人想法」、「不要抓間諜」。棘輪只朝一個方向轉。

四是每一次被揭露的手法都會催生反覆運算，買電視台變成買帳號，直接投放變成參訪團，現金變成流量分成和虛擬貨幣。防守方的透明義務，成了進攻方的免費情報。

上面這些不對稱，有一部分是文本可證的蓄意：統戰落點的選擇、十六字方針、法律戰條例、網絡人士統戰工作會議，這些有文件；另一部分是結構性的湧現：平台演算法獎勵衝突、犬儒主義、離散社群的雙重懷疑，這些不是誰設計的，是列寧主義組織撞上開放社會時白撿的便宜。不都是中共精心設計的結果。

我們該以什麼態度對待「大外宣」

最後回到態度。我希望「大外宣」是一個嚴肅的議題，它存在，它不應該被「毒化」。

當然，質疑必須可證偽，說得出如果什麼成立你就收回；質疑必須依據「行為證據」而不是「立場證據」——轉向的時點、刪帖的紀錄、協同轉發的模式、與已知節點的往來、參訪行程與內容變化的時間關係，這些是可觀察的行為，而「他說了我不愛聽的話」不是；質疑不得外溢到族裔、親屬和無關的私人生活，因為那正是反華敘事最需要的素材；以及，被證偽之後必須公開收回。

守住這四條，「大外宣」這個質疑就仍然是一種健康的輿論監督；守不住，它就會變成對方最需要的那個東西：一個可以拿來展示「看，他們真的在搞文革」的樣本。

其次，我非常理解很多人的主張，「我放棄質疑大外宣，我只看內容不看人，不猜忌立場」。但我想說，這不應該被看作一種「高尚」。在統戰和大外宣必然存在的情況下，選擇不應對灰域，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個人選擇，但這確實是對複雜問題的逃避。大家有資格逃避，但切莫將此當作更客觀、更中立、更高尚的印象，因為這恰恰是大外宣反制審查時使用的話語。別讓你的懶惰成為大外宣的養料。

我可以理解有潔癖的人選擇不關注大外宣話題，我卻不能理解有正常人會主張大外宣是假議題，如上面所講——方針公開，執行否認。對中國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知道，大外宣絕對存在。如果有人堅持認為「大外宣」不存在，徐某人的錄音是「智商篩選器」，炒作大外宣是「假議題」。這本身就成為了值得懷疑的信號。

最後，我希望這篇文章能讓讀到它的中國人帶走一些關於這個黨的東西，而不只是關於 X 上的爭吵。

它的第一個政治動作永遠是敵友分類，統戰對象是「非中共黨員的所有人」，包括還在國內的人。統戰就是對敵人的一種操作，他分而治之，各個擊破，所以你今天是統戰對象，明天就是專政對象，歷史上多少協助中共統戰的人，最後鮮有好下場。

它公開方針、隱蔽執行，文件人人可讀，運作永遠不可查。它不收買人，它接續人的激勵——真正讓人配合的從來不只是發錢，是能不能辦事。它對內把一切安全化，對外要求對手保持開放，同一套話語在國內叫「境外勢力」，在國外叫「麥卡錫主義」。而它在輿論上的核心技術，不是寫出更好的宣傳，是讓宣傳由看起來不是它的人說出口。

而最後一條，是我認為最深、也最難被察覺的一條：它不相信存在非政治的言



廈門社區宮廟（芋頭攝）。

論，因為在它自己的世界裡，確實不存在。

在中共的體制經驗中，沒有哪家媒體是不受指使的，也沒有哪個 NGO 是不屬於某個國家、某個部門的。所以它真誠地相信，RFA 必然是美國的新聞社；某個批評中共的學者，必然是某國的代理人。這不完全是宣傳技巧，更是它認知結構的向外投射。

而這個投射之所以在簡體中文的輿論場裡屢試不爽，是因為我們中的很多人也是在同一個體制裡長大的，共用著同一套「凡事必有背景」的世界模型。所以破解「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最深一層，不是去比較雙方誰更髒，而是意識到：你覺得天下烏鴉一般黑的那個直覺，本身就是被這個體制訓練出來的。它至今仍然能夠遙控我們。

所以，關於那種普遍的厭倦——「別吵了」、「這個話題沒意義」、「做好自己的事就行」——我想說的是：這種厭倦不是你自己長出來的結論，它是一件產品。讓參與的代價高到中間的人主動退場，讓高動機的少數人接管議題的定義權，這就是這場爭論要達到的目的。

我完全理解這種厭倦，我自己也常常有。但我們說服自己它不存在，它不會因此消失。它只會在我們退場之後，安靜地、不受阻礙地，把一個又一個人和組織，接進它自己的網絡裡。

「紅潮」、對台網絡與 J 大學生的跨境身影*

田野地 | 廣州市

撰稿 | 陳睿龍**

在我輾轉抵達廣州市南沙區、向實習單位報到的那一天，恰逢週一店休，因此並未正式進入工作，只有聽取簡單的工作內容介紹與環境認識。也正是在這樣空檔般的開端裡，我開始拼湊這家名為「紅潮」¹ 的機構，以及背後那一層不太顯眼、卻處處可感的政治經濟脈絡。

紅潮的老闆出身地方房地產家族，NN 地鐵站旁那座大型商場便是其家族產業。老闆在澳洲留學後返國繼承家業，由於沒有資金壓力，遂另起爐灶，開辦了紅潮這個新創項目，並且經營書店與咖啡廳。據店裡的員工透露，老闆的父親早年曾參與 NN 大道的修路工程，並分得道路兩側的土地，NN 商場即坐落其中。為什麼一個地方房地產家族會參與這次的對台實習呢？員工之間流傳著老闆娘是台灣人的說法，仍有待確認；我個人則是推測，參與這次的實習活動計畫，或許有助於和上層培養關係，以求政治合規的考量。這些當然都只是茶餘飯後的傳聞，但傳聞本身或許正是田野裡最值得留心的東西。

層層交疊的對台工作網絡

真正讓我意識到這場實習並不單純的，是負責對接實習業務的那位台籍負責人。他私下透露，與他合作的老闆其實是「民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員。據他所述，這位老闆原本是正當生意人，為了「洗」得政府的好感，才掛名開設了這家公司，進而與他合作，以合夥人形式，由他專責對台的工作與業務。更值得記下的一筆是：這個實習項目最上層的指導單位，並非一般想像中的台商協會，

* 田野日期 2025 年 7 月到 8 月

** 碩士生

1 本人中提到的企業、學校、人名都是去識別化的匿名。

而是廣東省台辦。換句話說，我所置身的這場「實習」，從一開始就被編織進一張對台工作的網絡裡。

南沙作為這張網的所在地，本身也承載了一套宏大的區域想像。台籍負責人在閒談中提到，中國對南沙的投資願景，是打造出類似舊金山灣區或東京灣區那樣的經濟開發區。據說這個計畫至今已投入約十年，遲至 2018、2019 年才開始逐漸有起色，未來的目標則是發展為自由免稅貿易區。地方政府的雄心、家族資本的積累、對台統戰的細密安排，就這樣在一間咖啡廳兼書店的日常裡，層層交疊。

這層交疊，在實習開幕式上看得更清楚。我到現場後發現，與會成員裡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已經在中國大學就讀的台灣學生。同住的室友（他本身是台青基地的小幫手²）點破了其中的門道：這類活動的消息，通常是在中國就讀的台生最先得知、最先報名，雖然主辦方傾向優先錄取台灣本地大學的在校生，但剩下的名額會分配給他們。有「台生³」說，自己是從 LINE 的交流群組裡得知這次活動的。我也聽聞，到中國實習的學生回到台灣後，可能面臨實習時數不被學校承認的制度風險。此外，在實習過程中，他們往往被主辦方工具化為統戰樣板，被迫配合短影音的擺拍與製作，甚至在假日被臨時動員參與各類政治性活動。這種跨境實習的代價，不僅是學分認證的損失，更是學生主體性被政治工具化、日常休息權利被剝奪的情感與身心勞動。而這些代價往往隱藏在兩岸交流這個宏大敘事背後的「看不見縫隙」裡——亦即官方宣傳的「青年融合美談」，與學生微觀日常中「身心俱疲」之間的巨大斷裂。

縫隙中悄然長出的批判主體性

這種體制與日常的縫隙，首先體現在資訊的傳播與接收上。我在和實習業務的台籍負責人聊天中得知，主辦方雖然花費極大心力在傳統的中國交流 LINE 群組與 Facebook 社團發送消息，但大部分的「台生」卻是在官方掌控之外、不經意發散的 Threads 平台上，透過演算法的微觀縫隙才得知活動消息並成功報名。這種非正式的資訊管道，本身就構成了結構外的灰色地帶。

更重要的，這種「縫隙」進一步深化為學生主體意識與政治修辭之間的內在張

2 室友所屬的實習單位，就是掛在台籍負責人的公司名下。

3 為了清楚區分，本文所謂的「台生」，是指到中國實習的台灣學生；至於在中國就讀的台籍學生，則稱為「在陸台生」。

力，促使我們重新詮釋這類統戰活動的「成功」與「失敗」。許多台灣實習生在私下的交流中坦言，實際進入實習後，他們反而更無法接受中國的勞動條件與工作方式。這呈現了一種矛盾的動態：在結構層面上，台生一經參與，形式上便已成為統戰流水線上的合作樣板，看似是主辦方的「成功」；然而，在個體認知層面上，這種親身體驗卻成為雙向的窗口，讓學生得以更立體地理解中國的「好與壞」。個體在親身實踐中因現實落差而催生出的反思與排斥，正是在統戰機器的宏大縫隙中，悄然長出的批判主體性。

開幕式上代表致詞的，是一名台灣某大學的金融系大三學生，曾到北京大學與復旦大學當交換生。我猜想，他或許正是憑藉這段交換經歷而獲選致詞的。現場還有一位籌辦復旦交流團的女士，向台生們抱怨這次招募情況不佳，只來了十多人，自嘲「有點慘」。這些片段湊在一起，讓我不免反思：自 COVID-19 疫情結束以來，不少台灣大學生很早就投入中國的各類交流活動，他們的組織網絡或許比想像中更深、更密，甚至已經形成一群熟人彼此相約、輪流參加、進而占據資源的現象。所謂「跨境」，在這裡未必是陌生的冒險，反倒更像一個逐漸成形、彼此心照不宣的小圈子。

若說開幕式呈現的是網絡的「結構」，那麼一頓晚餐則讓我貼近了在陸台生的「處境」。某天晚上，我與台青基地的大哥，以及幾位 J 大學的實習生一同用餐。席間聊到台灣教育部的一紙公告，內容是未來將不承認 2025 年以後入學 J 大學的學歷。實習生們普遍覺得，這是台灣政府在針對前來 J 大讀書的台灣人，此舉將大幅降低他們畢業後返台的意願。即便當前在校生的入學年限尚未受到波及，他們仍擔心日後在台灣求職時遭到污名化，落入就業劣勢。那種焦慮並不抽象，而是縈繞在每一次「畢業之後該去哪裡」的盤算裡。

是棋子、逐利者，還是務實選擇

這幾位實習生的來時路各不相同，卻又彼此映照；為保護當事人，以下僅以概要勾勒，不涉及可辨識的身分。

席間資歷最深的，是一名剛結束碩一的在陸台生。他在台灣成長、念完高中，大學才赴中國就讀，如今是 J 大學媒體傳播科系的研究生。這已是他第三度參加廣東的實習活動，目前擔任台籍負責人的小幫手，實習單位也就掛靠在台青基地之下，他既是我的受訪者，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這套網絡的在地引路人。

另一位是剛升大四的男學生。他在中國讀小學，國高中才回到台灣升學，因為兩岸生活習慣的差異，回台後一度適應不良。高中升大學時成績不甚理想，只能錄



實習田野合影。

取台灣某私立大學金融系；權衡之下，他看中J大學金融系的QS世界大學排名遠優於台灣私立大學，又認定中國市場大、機會多、更具發展性，於是選擇到中國就讀。儘管他坦言中國的環境非常「卷」、讀得辛苦，卻仍堅持把書念完。我特別記下：「他之所以選擇這條路，並不是因為不喜歡台灣，也不是為了謀取什麼福利，而是源於國高中時期的適應困難、童年在中國讀書的經驗，以及家族在中國就業發展的背景。」把一個人的選擇，輕易歸因於「認同」或「利益」，往往是最省事、卻也最失真的讀法。

與他同科系、同年級的第三位學生，則是自小在中國成長的台灣人。他選讀J大學的主因相當務實：由於將來要出國留學，因此選擇在中國就讀大學，當作未來的跳板。

第四位是一名女學生，就讀於南京師範大學。她之所以來廣東實習，是因為家人定居在廣東佛山，家裡是台商背景，實習地點離家較近。從她的口音與談話的種種細節推斷，她應該也是自幼便在中國讀書的學生。

紅潮的家族資本，廣東省台辦的指導，開幕式上若隱若現的台生網絡，以及這幾名學生各自的來時路與返鄉焦慮，把這幾條線索並置，其實都指向同一個問題：在兩岸關係的夾縫裡，一場掛著「實習」之名的活動，如何同時是地方政治經濟的

一環，是對台工作的載體，也是一群年輕人安頓自身未來的現實選擇。他們未必是棋子，也未必是逐利者；更多時候，他們只是在結構給定的條件下，盡力為自己找一條走得通的路。

我的實習田野，刻意避開了宏大的地緣政治與統戰敘事，而是將身體沉浸於咖啡廳的日常勞動中，⁴ 去細細體會並記錄身邊人的呼吸、互動與生活質地。這篇實習紀要，承載著我最樸素的願望，也就是讓更多人看見這群在陸台生的掙扎與無奈。實習尾聲，台籍負責人因為我的學術背景而向我邀稿，期望能有一篇融合兩岸關係的實習總結。儘管無法預知文章的最終去向，但我在文中如實描繪了所見所聞，並對廣東的勞動體制留下了反思與批判。

這些微觀的日常觀察，最終導向了實習後更為複雜的結構性提問：面對這群在夾縫中擺盪、甚至渴望歸鄉的留學生，台灣社會在政策與情感上該如何「接住」他們，又該如何在制度層面理性地面對潛在的統戰風險？夾雜在「防範」與「接納」的張力之間，我們又該如何協助他們看清並破除那套高度刻意且不自然的「兩岸一家親」政治修辭？

4 我的實習場域是咖啡廳，實習機構的人資說這種服務業被歸類為勞工階級，跟白領那種坐辦公室的工作不一樣，所以一週要上 6 天的班、上滿 8 小時。

後疫情時代下的中國社會 一個商用不動產外企實習生的觀察*

田野地 | 上海市

撰稿 | 榴槤小姐**

2025 年暑假期間，我前往太古地產在上海的某間頂奢 T 購物商場¹擔任 Portfolio Management Intern（投資組合管理實習生）。這份紀要既是在商用不動產外企實習期間的觀察，也是對於後疫情時代下中國社會的一個橫切面紀錄。我的實習場域是一座位於浦東前灘國際商業區的精品零售及 A 級商辦綜合體，但真正構成這份田野的，並不限於我每日進出的辦公室與商場本身。T 商場本身是一組層層嵌套的觀察對象，包括：一間深耕中國一百五十年的英資企業如何在中外合資的框架下運作，一座被國企與外資（含港資）巨頭共同形塑的頂奢消費地景，一群在「海歸／不海歸」之間反覆權衡的年輕勞動者，以及那些每天載我穿過黃浦江兩岸，卻與商場裡那些「不用管預算的提案」並置於另一個平行上海的網約車（計程車）師傅（司機）。

我試圖把這些切面相互交疊、凝塑成一幅後疫情時代中國社會的側寫。不同於宏觀的、數據式的中國，我透過一個台灣實習生所處的特定視角，描繪看見——或者說被容許看見——的中國。以下依序從實習單位、企業與國家的關係、合資結構、日常工作內容、人與勞工的流動，以及我在計程車後座聽見的，那些關於這個時代最直白的理解。

方圓一公里內的高端生活圈

T 商場具備超過十二萬平方公尺的零售空間，可容納約兩百五十間店面與餐

* 田野日期 2025 年 7 月到 8 月

** 碩士生

¹ 台灣常稱之為百貨、百貨公司或購物中心。

廳，並與一座高二百八十公尺的 A 級商業大樓相連，在閘口刷識別證後踏入沒有任何按鈕的電梯，無法人為控制的金屬盒子會在 30 秒後將我送抵明亮的辦公座位。真正讓我意識到自己身處何種場域的，是這座商辦綜合體所嵌入的開發計畫。這是一整片被設計出來的高端生活圈：五星級酒店、服務外籍人士的新加坡外資醫院、從幼稚園到高中的雙語與國際學校，以及單戶售價兩千五百萬人民幣以上的大坪數住宅。一個居住於此的家庭，可以在方圓一公里內享有就醫、就學、購物、居住與工作等生活機能。這種一站式頂級生活圈的空間配置，本身就是後疫情時代中國高端消費的具體化：在國內富人「潤」了、² 外資與外籍人士逐漸撤出的現下，仍試圖在浦東新區打造一個使高端消費人口不必離開的結界。

太古集團與當代中國

要理解 T 商場的政商關係與地位，必須先梳理太古集團與中國之間那段長達一個半世紀、且幾度斷裂又重續的關係。太古是一家擁有兩百年歷史的英國企業，在中國深耕超過一百五十年。早在一八六〇年代，集團就已在上海設立辦事處，並在香港建立大型糖廠，將精煉糖銷往中國各地。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因中國市場環境的劇變，外企經營極度困難，集團被迫逐步撤出中國內地市場。直到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之後，太古才重新踏入中國，並就此迎來爆炸性的增長。二〇一二年，太古地產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今天的太古集團版圖遠不止地產，營運觸角涉及可口可樂、醫療保健、汽車，也是國泰航空的主要控股股東。

由於中國的土地為國有制，民眾與企業透過購買取得的僅是土地使用權，因此 T 商場的股權結構是典型的中外合資，由太古地產與上海市浦東新區國資委直屬的大型國有企業陸家嘴集團，各持股百分之五十。中國頂級商場的開發者分成兩大陣營，一是「外資（含港資）開發商」，通常泛指以香港為主，兼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等地，在中國投資商業地產的企業；在零售業做得較成功的，包括香港的太古、新鴻基、恆隆，馬來西亞的嘉里建設，以及新加坡的凱德等。二是「內地開發商」，即中國本土企業，如銀泰、華潤等。而上海最頂級的商場，幾乎清一色由外資打造，主打「頂奢品牌」與「高坪效」，例如上海國金中心 IFC 由新鴻基開發，是浦東最強的頂奢地標；恆隆廣場由恆隆開發，被視為中國奢侈品的風向標；環貿 iapm 商場（iAPM Mall）同樣出自新鴻基，主打深夜營業與年輕潮流。

2 潤的發音近似英文 run，網友引申為移民、離開、出國發展。

除了商業定位、外資和內地開發商風格的差異，真正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隱藏在合資結構背後的政治肌理。我參與的實習計畫是由上海海外聯誼會³辦理，T商場與其有深厚往來，除了提供數個實習機會給港、澳、台生，總經理亦多次出席相關活動。T商場在計畫區域所掌握的開發主導權，顯露出一個頂級商業地產項目的落成，在中國的政經環境中不只是資本與設計的產物，同時也是一套政商協作關係的成果。合資的五五分，分的既是股權，也是與地方政府共生的結構，我將在下一節敘明。

那些不用管預算的提案

不同於過往在台灣商用不動產業進行的案例研究，總是必須提出嚴謹的財務分析，實習期間接觸到的專案，讓我看見中國頂級商業地產運作中反直覺卻又符合國家宏大敘事的一面：有些提案，是「不用管預算」的。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來自位於靜安區興業太古匯的 Louis Vuitton 巨型郵輪裝置「路易號」。主管某日告訴我，由於T商場所在地區的居委會看見路易號引入的人流、「美名」與地區治理績效象徵，因此要求T商場也為其提出類似的大型奢侈品裝置和活動。交派給我的工作是負責調研 LVMH 集團下的某奢侈品品牌，規劃融入T商場所在地區的提案，太古地產會居中將地方政府的期望與品牌方行銷對接起來。由於該項目有當地居委會鼎力支持，因此「不用管預算，盡情做就對了」。

這讓我重新理解了外資地產商在中國的真實功能：協調者與轉譯，T商場將地方政府的城市治理意圖，如活化街區、發展夜經濟、吸引年輕人潮，轉譯成奢侈品品牌可以執行且符合商業邏輯的具體專案。其他專案的內容也印證了這一點，如江邊體育公園與破舊碼頭的再生、夜經濟街區的軟硬體建設、面向Z世代⁴的大型短日期狂歡活動等，幾乎都是城市再生與消費刺激的結合。「不用管預算」這句話，表面上是奢侈的象徵，但背後其實隱含了一個更嚴肅的訊號：在經濟下行的壓力下，地方政府與頂級品牌都亟需以高強度的行銷事件來形塑氣氛、刺激消費信心。當基本面疲弱時，場面就必須做得更大。這種環境愈艱難、場面卻益發盛大的反差，正是我對後疫情時代中國消費地景最深刻的體會之一。

3 上海海外聯誼會創立於1985年，是中國第一個省級海外聯誼組織，首任名譽會長由時任上海市長江澤民擔任，以促進上海與港澳台及海外交流合作為宗旨。

4 泛指1990年代中後期至2010年代初期出生的群體，約1997至2012年間出生的新生代。

儂是鄉毋寧——實習生與同事的組成

田野的另一條線索，藏在人的組成裡。作為台灣實習生，我的實習路徑本身就帶著鮮明的政治色彩：由上海統戰部與數個台灣單位接洽（例如台灣某青年國際機會媒合平台的執行長即被列為「傑出青年」），並為實習生安排了一連串參訪，如無人機大賽、筆墨工坊、抗戰勝地、四行倉庫、上海城市規劃館、黃浦江夜遊，以及 1931 年由中華民國上海特別市政府設立的首座公立圖書館，即上海市立圖書館。我們也去了由荷蘭 MVRDV 團隊將工業遺址改造成商業地標的西岸夢中心，以及號稱「國家人工智能戰略新興產業集聚區」，但實際上進駐率極低、蕭條得令人意外的園區。這份參訪行程混雜著愛國教育、城市治理展演與招商引資的意圖，而其中若干名不副實的場景，本身就揭示了敘事與現實之間的落差。



回到 T 商場內部，實習生的來源同樣值得玩味，除了透過各地統戰單位（如滬港青年會、上海海外聯誼會的港澳台僑青年學生實習計畫）進來的，也有走「社招」路線，履歷是中國人民大學生加上耶魯碩士這種等級的申請者。至於正職同事的組成，除了建築與機電工程背景者多來自上海本地大學，其餘以香港人、在香港上學的中國人及海歸為主。因此，我在辦公室裡學到的粵語，竟然比上海話還多。本幫菜、「儂是鄉毋寧」（「你是鄉下人」的上海話），這些在地元素反而成了點綴，乃至香港與海外的語言、履歷、身分，才是這個頂級外企日常的主旋律。這個小小的觀察切面，也埋藏了另一個更大的主題：一群在中國與世界之間反覆流動的年輕人，透過勞動市場的參與，如何反映當前的全球政經關係。

奢侈品及選擇性消費

我實習的核心場域是頂奢零售，因此對後疫情時代中國社會的第一手觀察，首先落在高端消費市場的收縮上。早在 2024 年 12 月，就有台灣的部落格版主到上海後寫下「經濟狀況不好，加上商業過度開發，導致上海有些商場死氣沉沉」的語句，而數據也印證了這種體感。根據中國華麗智庫的華麗志奢侈品品牌年度報告，⁵ 2024 年受房市低迷與經濟壓力影響，中國境內的個人奢侈品市場銷量重挫約 18%-20%；到 2025 年，跌幅雖收斂至 3%-5%，但下行趨勢並未逆轉。面對這

⁵ 華麗志的「訂閱用戶專供」報告，取自公司內部流通的檔案。

樣的困境，綜合華麗智庫的建議與 T 商場的品牌營運策略，大致可歸納出四種應對方式，包含：在更多城市開設品牌首店（first store），升級既有門市，持續發展並擴張 VIC（Very Important Client）的貴賓空間與服務，以及增加品牌活動與展覽，透過藝術表達與顧客形成更深層的情感共鳴。前一節提到的路易號和 T 商場提案中的大型裝置，即為第四種策略的極致展現。

新展店的地理分布也值得關注，2024 年奢侈品牌在中國開設最多新店的前五大城市是南京、武漢、上海、北京、深圳等傳統發展重鎮；但若從新開「首店」來看，最多的前五城是上海、福州、南昌、寧波、蘇州，明顯往沿海地區與二線城市擴展。這個對比透露出一個訊號：當一線城市的頂奢市場趨於飽和、成長趨緩，品牌開始以「首店」為餌，向更多具消費潛力的城市擴張，尋找新的增長點。

要理解奢侈品市場的疲軟，就不能不談中國家庭的財富結構。長期以來，中國的消費者信心與房地產市場密不可分，因為房地產一直占中國家庭財富的絕大部分。根據高盛 6 月的報告，截至 2026 年第一季度，房地產在家庭資產中所占的比例將從 2021 年年中的 67% 下降到 52%，而同期現金和銀行存款的比例將從 16% 上升到 25%。高盛分析師在報告中表示：中國家庭資產配置正處於結構性轉變的早期階段，隨著房地產在財富積累中的作用減弱，存款利率保持低位，儲蓄可能會逐漸轉向更廣泛的金融資產。⁶ 上海承周投資管理公司的投資總監付智峰對該現象的解讀很直接：奢侈品及選擇性消費，與富裕家庭的收入預期息息相關。⁷ 這些宏觀分析，在商用不動產的辦公室裡被翻譯成極其樸素的日常語言。實習期間我在例行的經營狀況週會結束後，曾詢問主管商場的銷售額是不是不太好看，得到的回覆是：「已經不太好很久了，你不覺得都挺慘澹的嗎？高端消費人口疫情時都潤了，現在國內高奢、大平層住宅都賣不動。」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即便在這樣下行的市場裡，某些商業邏輯依然如常運轉。例如某次拜訪客戶後，我問主管該品牌預計下半年在上海四、五家商場展店，速度會不會太快了？主管的回覆點破該客戶逆勢擴張的算計：「如果他趁市場還沒有復甦就先搶進，可以拿到比較好的商場位置。」市場的低谷，對握有資本的一方

6 “Chinese families turn to cash and cautious stock bets as real estate avenues narrow,”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 Aug 2026, <https://www.scmp.com/business/banking-finance/article/3362203/chinese-families-turn-cash-and-cautious-stock-bets-real-estate-avenues-narrow>

7 〈中國消費者不省了！股市大漲帶動奢侈品買氣回升〉，鉅亨網，2026 年 6 月 1 日，<https://news.cnyes.com/news/id/6478321>

反而是搶占黃金地段的機會。與此同時，商場裡仍不斷推出一片一百多元人民幣的千層蛋糕，VIP Lounge（貴賓室）也是所謂「一定要有」的標配。這種在整體疲軟中對極致奢華的持續投入，構成了後疫情時代消費市場的一種風景。

出走又回來的勞力市場

如果說消費端呈現的是收縮，那麼人才端呈現的則是奇特的「回流」。我在辦公室裡近距離觀察到的第一批人，是所謂的「海歸」，他們的學歷幾乎可以拼成一張全球化的地圖：國內本科加香港碩士、國內九八五／二一一大學⁸加英國碩士、國內大學加美國碩士、美國大學、英國大學加英國碩士、國際高中加香港本科、香港中學（中國移民背景）加國內大學等，「海歸不海歸」成了一個真實的身分分類。統計數據亦顯示這股回流正在加速，例如，中國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指出，2025 年出國留學人數超過 57 萬，留學回國人數達 53.56 萬，回國率首次逼近 94%。另根據中國求職平台智聯招聘發布的《2025 中國海歸就業調查報告》，2025 年回中國求職的留學生人數較前一年增長 5%，其中應屆生人數增長 12%，兩項數據皆創下近八年新高。從求職類別來看，教培、諮詢顧問、網路等產業是留學生回國就業的主要方向；而專用設備製造、醫藥製造、新材料、光電子、機器人等新興領域，對海歸人才的需求量則有顯著增長。

這組數據與我身邊同事的樣貌高度吻合。這些人曾經出走，如今又回來。他們的回流，一方面反映了海外就業環境的收緊，以及中國新興產業的磁吸，另一方面也構成了頂級外企人才庫的主要群體。我也必須誠實地說，這群能夠自由地在中國與世界之間流動、進退有據的年輕人，只是中國勞動市場的其中一面，並且是極其幸運的一面。田野真正震撼我的，是另一群「出不去」的人。

被結構困住的人

這一部分的觀察，來自我下班後、搭乘網約車時與司機的對話，這些對話讓我看見了一個與 T 商場裡的光鮮亮麗完全平行、卻同時存在的中國。以下僅以其中

8 211 工程始於 1995 年 11 月，名稱源自「面向 21 世紀，重點建設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985 工程（因 1998 年 5 月提出而得名）是在 211 工程基礎上精選出的頂尖精英大學計畫，中國共計 39 所高校入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兩項工程已於 2016 年正式經官方宣佈失效，由統籌推進的「雙一流」（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所取代。雖然政策名義上已廢止，但在中國民間社會與就業市場中，985 和 211 依然是衡量大學水準與社會認可度的重要指標。

一例作為說明。一名大約三十歲、江西農村出身的網約車師傅，年輕時本來要去讀中專學電腦，資料與報名費都繳了，只差還沒到現場報到，卻因身邊有人說「進廠賺錢更快，還能學技術活」而聽信改道。他說：「也不是說家裡不管，但我們農村不像城市，小孩的未來不會思考得那麼長遠，資訊流通也不足，所以他們就讓我去了。」他語帶悔意：「要是當時有去上中專、學電腦，現在的生活就不一樣了。」他觀察到這幾年做網約車的人爆增，原因很簡單，「因為別的地方找不到工作崗位」。而最讓我揪心的一句是：「生了病也不敢去看醫生，太貴了，我們這種沒有醫保的看不起。」就在這場對話的前一週，我的室友因急性腸胃炎去同濟大學的醫院看診，花了一千塊人民幣。

師傅 2024 年才到上海跑網約車，此前在浙江的工廠上班。網約車雖然收入比其他行業好（月入約一萬至一萬三千元人民幣），但代價是一天工作十二小時、沒有五險一金（社會保險與住房公積金）。他困惑地問我：「為什麼我看其他坐辦公室的，一個月可能才掙七千人民幣，卻看起來生活得比較舒服？」我心裡其實有答案：能坐辦公室的人，大多來自出身較好的家庭，有家底可以依靠。這一點我在 T 商場同事的身上也得到印證，儘管許多同齡的新進同事已在這麼好的公司工作，他們仍得靠家裡的接濟與補貼。原生家庭的資本，才是真正決定生活從容與否的隱形變數。那一段車程的對話，把勞動力市場這個抽象詞彙，還原成了一個具體的、被結構困住的人。他（們）不是不努力，而是資訊、戶籍、醫保、家底等這些他們無從選擇的條件，早在起跑線前就劃定了他們能跑多遠。

田野最深的一層，出現在這位三十多歲師傅的獨白裡。他把宏觀的政治經濟講成最貼身的生存哲學。他先是描述了普遍的疲憊：「中國人不管有文化、沒文化的都很苦，沒有生活，只能不停地工作、想著下一頓飯在哪裡。」他甚至有一句近乎宿命的話：「肯吃苦的話，就會有吃不完的苦。」

一開始，他的困惑是樸素的比較：「為什麼美國人一直打仗，美元還是那麼值錢；中國越來越好，但人民幣還是那麼不值錢？」「我看在美國開滴滴的，一天可以掙四五百美金啊……國內做什麼工作能掙這麼多呢？」但聊著聊著，他的語氣轉為一種好似見過世面後的釋然：「我沒有出過國，但疫情後估計每個國家的生活都不太好吧？」接著，話題滑向了政策與制度。「習近平上台之後經濟變得不好 [這是第二個對我這麼說的計程車司機了]，各行各業都是這樣。不知道是疫情的原因，還是政策管理的問題。」他更進一步質疑國家的資源分配：「我們國內過得這麼差，為什麼還一直拿國內的錢去做和外國的關係，例如一帶一路呢？」他懷念父母那一輩：「我爸爸媽媽那一輩，努力工作還有生活品質，那時候吃大鍋飯，人人

都有飯吃。現在卻是賺越多錢，就讓國家拿走越多。」

最令我震動的，是他對制度本身的直接批評：「習近平修了憲法，讓他自己能夠做到死。這和以前的皇帝制有什麼不同？不是都說核心價值是公平、公正、公開嗎？結果選領導人的過程不公平、不公正也不公開。」然而，在如此清醒而沉重的判斷之後，他竟給了自己一個近乎溫柔的出口：「沒關係，反正習近平七十幾歲了，我才三十幾歲，他會比我早死。我還有機會看到下一個階段的中國，只要活著就有看到改變的可能。」下車時，我想了一下，跟他說了句「祝你健康」。在這裡，連維持基本的健康都需要錢，否則就只能跟命運對賭，我只能默默希望好運能眷顧他。

兩個平行的上海

整段實習下來，我最深的體會是同時生活在兩個平行的上海裡。一個上海，是T商場及其開發計畫所代表的兩千五百萬的大平層、不用在乎預算的品牌裝置、逆勢搶占優質點位的資本算計、一百多元人民幣一片的蛋糕，以及一群能在中國與世界之間自由流動的海歸和港人同事。另一個上海，是我在網約車後座聽見一天工作十二小時、沒有五險一金的司機，看一次病要價不菲的醫療門檻，因資訊落差而錯過的人生岔路，以及對制度與分配那些清醒到令人心疼的質問。

這兩個上海共用同一條黃浦江、同一套地鐵、同一個「後疫情復甦」的官方敘事，卻幾乎不相往來。作為一個台灣來的實習生，我恰好被放在橫跨兩者的縫隙裡，上午在會議室裡討論如何為負擔得起高級消費的Z世代打造狂歡活動，下班後在車上聽一個江西農村出身的人講他為什麼「得」來到上海。

太古集團在中國一百五十年的進退史，彰顯出開放與收縮從來是循環的；而我親眼所見的，或許正是又一次退潮的前夕。頂奢市場靠著財富效應與極致小眾苦撐，海歸潮創下八年新高，而底層勞動者在戶籍與醫保的縫隙裡「肯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這三條線索交織出的，就是後疫情時代中國社會最真實的張力：一個在光鮮與艱難之間、在流動與困守之間、在盛大場面與樸素絕望之間，同時運轉的社會。我沒有能力為這樣的中國下一個結論。我能做的，只是把我在這個特定位置上所看見、所聽見的，誠實地記下來，包括師傅最後那句既是政治判斷，也是生存信仰的話：「只要活著，就有看到改變的可能。」

謹以此紀要，紀念那些載我穿過無數上海的夜晚。

從民間到國家 華東地區營造業實習紀要

田野地 | 華東地區沿海 J 省*

撰稿 | 林雨**

去年夏天，我透過機構實習的機會，前往華東地區沿海 J 省 H 市的 K 公司實習，期間曾到與 K 公司關係密切的 L 公司進行短暫的跟案。K 公司的主要業務是承接廠房改造，L 公司則是以公共建設為主。

在實際深入各個廠房改造與公共建設工地的過程中，我逐漸從單純的「業界實習」轉換為「參與式觀察」，我想這或許是扎實的社會學訓練下所磨練出來的身體記憶。在跟隨工作團隊四處跑案場的日常裡，我意外地察覺到許多工程實務背後的非正式邏輯，例如不同性質案源（民間廠企／公共建設）衍生出截然不同的勞動網絡與工班¹組成，以及基層勞動者在現場的溝通策略。因此，本次實習不僅是一次產業實務的體驗，更成為一場充滿啟發的田野觀察，讓我得以將所學視角實際印證於真實的勞動現場。

在實習時間，我主要是以「影子實習」的方式，跟隨 K 公司負責人到不同的案場，深入不同產業的廠房改造專案，觀察並記錄與業主的對接、與工班的互動、現場施工作業和危機處理的完整流程。此外，在隨行過程中，我也窺見其中的勞雇關係與互動模式，基層勞動組織架構的差異，以及專案負責人與業主、工班的溝通策略。

原先我跟隨前往的是 K 公司的案子，但 K 公司與 L 公司關係密切，所以後來也到 L 公司所承包的案場。L 公司是 H 市大型公共建設中的一個小包商，不同於

* 田野日期 2025 年 7 月到 8 月

** 碩士生

1 在工程、營建或室內裝修產業中，「工班」指的是一群由具備特定專業技術的工種人員，共同組成的施工團隊。

K 公司的案場和業務分布在 H 市各處，L 公司以承包公共建設為主，當時僅有兩個工程在進行，K 公司則有 4-5 個案子在進行中，同時也不斷接觸新客戶、洽談新的業務。

生產空間、勞動組織與運作邏輯——民營企業 vs 政府機構

我在 K 公司實習期間遊走於不同的廠房，最大的感受是，即使中國整體經濟面臨下行，廠房改造的剛性需求依然存在，而且不只是單一產業，包含多個不同類型的產業，像是受惠於政策與產業熱潮的光電廠、以網路行銷為核心的青年創業咖啡豆廠，以及傳統產業的海綿廠。

走訪 K 公司的案場時，我發現廠房不僅是生產空間，更反映了不同世代業主的產業性格。例如：光電廠的改造主要是由專業經理人對接，講求精準拉線與機具空間搭建，充滿標準化的工業氣息。另外兩個案場則呈現了強烈的對比，咖啡豆生產廠的業主是年輕人，廠房管線配置大致底定，現場氛圍較為輕鬆，與業主的閒聊大多聚焦於網路行銷等新興商業模式。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海綿廠，該廠主要是供應對街的精品沙發品牌，其辦公室是一棟自建建築，大門氣派，內部甚至有雙向的旋轉樓梯，充滿了中國傳統民企那種草莽卻雄厚的「江湖味」。這些空間布置的差異，鮮活地展現了華東地區民營經濟的多樣面貌。

K 公司的工班是基於地緣與親緣的「非正式勞動網絡」來組建。我在與工人們的閒談中得知，他們的薪資約為日薪 400 元人民幣，包吃包住。然而，這份收入背後是極度密集的勞動付出，工班每週工作 6 天，每日工時長達 12 小時（早晨 6 點到晚間 6 點），也就是 996。² 這種高工時、高強度的勞動紀律，正是基層工人拚命求生存的真實寫照。但這種高度鑲嵌於親屬網絡的團隊，在工地現場形成了一種基於「熟人社會」的互助與信任氛圍，有效緩解了高強度勞動的倦怠。在施工作業的空檔，師傅們展現了對各種資訊的好奇心，他們會問我台灣目前的薪資水準，甚至主動聊起台灣的新聞時事，例如提及台灣網紅「館長」上海之旅的趣聞，覺得館長言行十分逗趣。這些互動讓我體會到在勞動現場中，資訊的流動與次文化的碰撞是如此真實且日常。

L 公司主要承包大型公共建設與基礎設施，對接的是政府機構，運作邏輯就與

² 「996」是指「早上 9 點上班，晚上 9 點下班，每週工作 6 天」的工時制度。以總工時來看，K 公司工班的勞動時數跟 996 一樣，只是上下班時間提早到早上六點和晚上六點。



去識別化案場示意，AI 生成。

民企的廠房改造截然不同。面對國家，L 公司的勞動組織必須走向專業化、科層化，設立正規辦公室、聘用專業會計人員，並依賴長期合作的專業副手與外部僱員，而不是非正式的親屬網絡。這顯示當基層民企嵌入國家大型公建體系時，內部的團隊也必須合乎規定與契約化。

除了組織內部團隊組成的觀察之外，施工現場的「語言策略」也深具啟發性。我在案場巡視與對接過程中，觀察到專案負責人與基層工班在面對業主時，常切換為家鄉方言進行溝通。這種語言轉換除了單純的習慣，在我看來也是在業主面前建立「資訊壁壘」的策略手段。基層工班透過方言，創造出溝通時的隱密空間，得以在業主面前直接討論技術難題、成本考量或突發狀況，而業主受限於語言隔閡無法隨意干預施工細節。這種非正式的溝通機制，巧妙地讓基層勞動者在現場奪回話語權與主導權，形成了一種微觀的權力平衡。

基層社會與民營企業的生存法則

在實習期間，除了案場內的勞動觀察，案場外的「互動場域」更是展現兩種迥異商業邏輯的最佳觀察點。

K 公司的互動重心集中於「內部網絡」，例如令我印象最深的一餐，是跟隨負責人、同鄉同行及全體工班，大夥兒圍著幾盆菜吃了一頓極度

「接地氣」的工人飯。這種日常的共食文化，正是維繫非正式勞動網絡與親族信任、降低基層管理成本的重要儀式。

相對地，L 公司則展現了截然不同的運作重心。走進公共建設案場，可以明顯感受到大型公共工程高度科層化與規範化的氛圍。L 公司負責人的核心工作並非現場監工，而是專注於「外部業務對接與跨部門協調」，主要的互動對象是公部門業主、監理單位或上游總包商，現場工作則交由具備專業技術背景的副手與團隊管理。

從 K 公司用以維繫內部連帶的「工人飯」，到 L 公司頻繁的「跨單位協調對接」，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互動

模式生動地揭示了營造產業的生存法則：面對民間中小企業與國家大型基建時，企業建立社會資本的重心完全不同；前者需要將資源投資於親緣網絡以穩定基層勞動力，後者則必須將資源用於經營外部的政商網絡與跨部門關係。

總結而言，本次的機構實習，從 K 公司民間廠房改造中，我看見依賴地緣與靈活親屬網絡所展現的極大彈性；L 公司承包大型公共建設與基礎設施，勞動組織必須走向公共工程科層化的專業建制；乃至於施工現場的基層勞動者透過方言作為資訊壁壘，進行微觀的權力微調。

這次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真實的田野往往發生在無心插柳的日常互動中。本次的機構實習，無論是與工班一起吃著大盆菜的「工人飯」，或是聽師傅們閒聊兩岸時事與次文化，這些接地氣的細節，大幅深化了我對非正式網絡與國家市場互動邏輯的理解。這些觀察生動展現了中國基層社會與民營企業在面對總體環境變動時的韌性及能動性。這份寶貴的田野經驗，將成為我未來從事學術研究與田野觀察的扎實基礎，期許後續能結合更系統性的質性訪談，持續探究國家體制、市場轉型與基層勞動者之間的動態關係。



K 公司接地氣的「工人飯」。

昆山台商的現況與前景 一個台商企業實習生的觀察隨筆*

田野地 | 江蘇省昆山市

撰稿 | 三冬**

2025 年 7 月底的一個晚上，飛機抵達上海浦東機場。在夜色中，我轉乘一個多小時的大巴車在江蘇省昆山市下車，準備展開在一間台資企業為期一個月的實習。

根繫台灣——昆山媽，台商媽

今日的昆山雖然仍是代工重鎮，榮景卻已不若往日。早在 1990 年，首家台資企業在昆山落戶。受益於改革開放下上海的區位擴張與便宜的勞動力，台資企業大舉西進，昆山很快成為台商在中國的重要聚集地，連帶吸引許多日資與韓資企業跟隨台灣供應鏈入駐。巨大的投資動力帶動了地方發展，大量務工人員隨著大廠進駐來到昆山。自 2005 年起，昆山市蟬聯「中國百強縣」¹ 首位至今，即有賴於當地蓬勃的代工製造業。

2010 年代初，台商在昆山的投資達到了頂峰。鼎盛時期，昆山約有四千多間台企，總計投資約五百億美金，約十萬名台灣人落腳昆山。圍繞著台商所展開的生活圈影響了昆山當地的樣貌，無論是具有較佳醫療資源的台資醫院，或是對標台灣教育體系的台商子弟學校，都展示了台商在昆山「複製台灣」的努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 2005 年由台商發起籌資興建的慧聚寺天后宮。

2005 年昆山市政府特別批准重修昆山慧聚寺，是中國歷史上首座由台灣人捐

* 田野日期 2025 年 7 月到 8 月

** 碩士生

¹ 評選中國綜合經濟實力最強的前 100 個縣級行政區（包含縣、縣級市與旗），昆山市為江蘇省蘇州市下的縣級市。



慧聚寺天后宮中的牌匾。牌匾左方落款寫著「祖廟台灣鹿港天后宮管理委員會」。

款興建的合法廟宇。不僅廟宇的樣式參考了台灣的鹿港天后宮與台北龍山寺，慧聚寺的主神媽祖更是分靈自鹿港天后宮，可說是純正的「台灣媽」，也因此出現「祖廟」其實在台灣的可愛景象。

「昆山媽，台商媽」，慧聚寺不單是具有宗教意涵的廟宇，更是昆山台商的心靈寄託。如寺中供奉的媽祖神尊一樣，慧聚寺的存在，如同訴說著台商的「根」始終繫於台灣。

出走潮下的產業結構轉型

在時間推移下，今日的昆山不再是以台灣人、台商為主體的城市。隨著中國整體物價與人事成本的提升，昆山的區位優勢面臨挑戰，加上台灣政府積極推動南向政策，2010年代中期起開始有部分台商減少在昆山的投資。至於真正影響昆山台商的，先是2018年中美貿易戰的地緣政治風險影響，後是2022年COVID-19疫情封控後投資信心崩塌，釀成了大規模出走潮。如今在昆山的台資企業僅剩約2,500間，產業性質已不同於過去以製造業為主，大多是服務業與小規模的科創企業，人事規模也比較小，並且不再依賴台幹的經營模式。

2025年夏天的昆山，城市的氛圍似乎也映照著這樣的轉變。每日上下班的網



慧聚寺的Q版媽祖神尊。



昆山地鐵花橋站，分別是蘇州地鐵與上海地鐵的端點，是連接兩地的重要樞紐。

約車²上，司機大哥的話題總不離外企撤離、人口流失與景氣不若往日。某某台廠前兩年收了、房價這兩年又跌了幾成、進廠打工的人越來越少，幾乎是每位司機都曾談起的話題。窗外的風景也經常能見到關門的舊廠房、工業區內的招租告示，以及爛尾的商業城從眼前閃過。對不少在昆山生活的人而言，這座曾因外資製造業而崛起的城市正經歷一場巨變。

然而，若僅以「外資撤離」來概括今日昆山的變化，似乎又難以完整描述我所看到的現況。昆山之所以能成為台商重鎮，除了因為中國低廉的勞動力，還有賴於特殊的區位優勢。作為緊鄰上海的製造基地，昆山長期受益於長三角地區的人才、技術、資本與市場外溢效應，得以深度嵌入以上海為核心的產業網絡之中。即便今日部分傳統製造業面臨轉移壓力，但鄰近上海的優勢，以及成熟的供應鏈聚落，仍使昆山在高端製造與科技產業中保有一定競爭力。

因此，與其說昆山正在衰退，不如說今日的昆山正面臨產業結構轉型的過程。一方面，部分重度依賴低成本勞動力、以加工出口導向為主的傳統製造業，確實面臨挑戰；但另一方面，受益於中國官方大力推動，一些技術門檻較高且深度嵌入本地供應鏈的產業，諸如新能源車、人工智能與半導體等「高新」產業，反而在近年持續成長，成為昆山的主力產業。續留的台商也因應昆山優勢與中國政策的轉型，

2 網路預約計程車，簡稱網約車，是中國《網路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所規定的預約出租汽車服務。

發展出具適應性的經營模式。我此次實習所在的 Z 公司，便是在此背景下值得觀察的一個案例。

台商在地化——從技術落地到產業布局

Z 公司是一間位於昆山的台資被動電子元件代工廠，在 2010 年代由一群台灣科技技術人才創立，現在是產線加文職規模不超過千人的中小型製造廠。不同於 1990 到 2000 年代「台灣設計、昆山製造」的主流台廠模式，Z 公司可說是帶著資金，在當地從零開始。公司除了初創人員與營運初期的部分台灣技術人才外，包括研發、銷售、產線與絕大多數主管都是中國本地人，公司上下僅有十數名台灣人，分散於最高管理層、中階主管和一般工程師，當中除了最高管理層，多數台灣職員都是往年參與昆山台商協會舉辦的實習計畫後，選擇留下並轉為正職。整體而言，是一間雖具台資背景，實則經營策略高度在地化的企業。

不過終究是台灣人成立、仰賴台灣資本的企業，Z 公司還是享受了不少當地政府的背書與政策待遇，例如，曾經得到江蘇省政府針對台商頒發的優秀企業獎項，以及地方政府頒發的優秀台資企業獎等。除此之外，江蘇省政府也提供了政策優惠，使 Z 公司從承租現有廠房運營，到近幾年正式被市、區政府劃撥地塊，獨立建成新的企業總部園區，並且擴張原有的生產規模。

Z 公司生產的被動元件主要提供兩大供應鏈，一是提供國內新能源車電子零組件，二是供給面向國內與國際的高效能運算相關供應鏈。受惠於中國境內新能源車輛需求擴張，以及國際算力需求大幅提升，Z 公司近幾年的營收表現呈現上升趨勢，並且結合子公司供應鏈，有效擴張了生產規模與在相關領域的市占率。

然而，作為一間在中國經營的企業，地緣政治的風險對 Z 公司造成不小的隱憂。2025 年 4 月 2 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宣布將對全世界開徵「解放日關稅」。中國在此次宣布中被開徵 34% 關稅，之後又在中美報復性關稅的推升以及毒品芬太尼懲罰性關稅下，一般商品的關稅被推升至 145%。雖然中美兩國藉由談判逐步調降關稅，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仍衝擊 Z 公司的經營策略與布局。

尤其 Z 公司是具有海外客戶的在中企業，受到中美關稅戰的嚴重影響。Z 公司在川普第一任期的關稅戰時，就已開展因應策略，在墨西哥成立了聯絡處，主要是針對美國客戶的情況進行因應。在新一波的中美競合中，Z 公司則選擇將視角轉向東南亞，在東南亞某國家成立了分公司，具備小規模的生產量能，同時生產新能源車與運算元件，而不是像墨西哥那樣單純的聯絡處。這樣的營運策略看似是產線的南向外移，實際上是現階段的供應鏈風險管理與維持客戶信心的手段。

不確定性蘊生的彈性適應策略

將 Z 公司的案例放回昆山整體台商發展脈絡中觀察，能夠發現今日昆山台商所面臨的處境與過去大不相同。相較於早年依賴低廉勞動力與政策紅利的發展模式，當前仍能留在昆山，並維持競爭力的企業，往往更仰賴技術能力、供應鏈整合與高度在地化的經營策略。從管理人才的本地化、因應地緣政治風險的生產布局調整，到深度嵌入國家政策的新興產業供應鏈，台商的角色似乎從單純的外來投資者，轉變為更具適應性的區域產業參與者。

今日昆山台商真正的變化，或許已不單是「留下」或「離開」的問題，而是如何在新的政治經濟環境下，重新定義自身的定位與生存方式。至少就我此次實習的觀察看來，部分台商並未隨著過往製造業榮景的消退而退出，而是在不確定性中，逐步發展出一套更具彈性的適應策略。



位於慧聚寺旁的台胞台企一站式服務中心。

鏡頭背後的非自願操演 當實習生成為「兩岸一家親」宣傳工具*

田野地 | 福建省廈門市

撰稿 | 芋頭**

廈門是中國對台工作的最前線，其統戰策略之一是將政治任務外包給民間企業。舉例來說，廈門針對青創基地的支持力度在中國居於領先地位，本質上是透過政策獎勵與補貼，扶植具有台資背景的公司。中國招募台灣實習生的目的也相當明確，亦即利用台灣人的身分、語境與視聽習慣，去生產更具說服力的宣傳素材。在這種模式下，青創基地不僅是創業空間，更是一個身分轉化場域。入駐的台青與實習生在不知不覺中成為體系的一部分，其勞動被轉化為政治符號生產的構成要素。這種將政治任務「外包」給台資企業的作法，有效掩蓋了統戰的政治性質，使其看起來更像是一種自發的、市場導向的互動。我在近期的實地觀察中也發現，中國透過青創基地的市場化外殼，將台青和實習生工具化為敘事代理人，透過精細的劇本和展演，生產具有情感的認同假象。

如何藉由基層組織操弄統戰工作

本文基於我 2025 年 7 月在中國福建省廈門市某青創入駐企業（以下以 G 公司代稱）的參與式觀察，探討當前中國基層對台統戰工作的邏輯。G 公司是該區相當有名的研學教育公司，或許因為位處 1989 年國務院最早批准設立的國家級台商投資區，並且鄰近有廈門「文教中心」之稱的 J 區政務中心，G 公司長年承攬相關單位的組織活動。實習生的工作主要分為三大組：「活動企劃組」負責營隊活動的執行，「新媒體組」處理活動期間的影視圖像紀錄，「社區營造組」則針對台青融合社區的相關業務。我在本次實習中被分配到「新媒體組」，得以藉由這個難得的機

* 田野日期 2025 年 7 月

** 碩士生



G 公司走廊的螢幕圖。

會，在實習期間內觀察並記錄中國如何實際地操弄統戰的工作。

G 公司舉辦了諸多兩岸交流活動，並且跨足各個領域，我在實習期間參與的活動類型就涵括了「鄉村振興、運動競賽、兩岸親子營隊」等等，這類型活動背後通常有政府部門介入，卻包裝成一般民間活動。其實從活動方案中可見，官方色彩始終強烈。例如，兩岸排球友誼賽的協辦單位包括福建省台聯、廈門市兩岸交流協會及廈門市 J 區政府。中國常見的手法是將硬性的統戰任務轉化為軟性的「研學」、「文化傳承」、「交流賽事」等，並且外包給像 G 公司這樣，具備台資背景的民間企業。然後在活動的開閉幕式中，安排密集的官方領導致詞與象徵性的儀式展演，致詞內容大多圍繞著「兩岸一家親、同根同源」，以及希望台灣學員多來走走的主論述：

J 區透過以球會友，吸引了中國台灣的青少年和我們的排球好手們同場競技，結交朋友。——活動主持人

在兩岸排球友誼賽的開幕式上，主辦方即透過主持人的介紹，將台灣球隊框架在「中國台灣」的論述下，並且在介紹台灣與會人員時，必然更改單位頭銜或是在單位前面加上「中國台灣」二字。如此一來，台灣的教練、裁判及運動員不得不捨棄協會或隊伍的正式名稱——「中華民國排球協會」，退而使用「台灣排球協會」

或「中國台北排球協會」等非正式名稱。這種去主體化的過程，反映出中國如何透過儀式性的展演，積極在視覺與聽覺上執行對台政治工作。

還有一場「兩岸親子營」，由廈門市J區人民政府主辦、G公司協辦，美其名是以來自兩岸的親子家庭為對象的交流活動，透過親子參與增進彼此的理解與認同。上百位參與者，不分年幼老少，活動期間都以「兩岸一家親」為主要口號。未成年的青少年心智尚未發展成熟，甚至缺乏對兩岸政治框架的基本認知，卻被要求在攝影機前高喊特定的政治口號。幼年受眾被工具化的現象，揭示了基層統戰工作的運作邏輯：透過集體展演所形塑的身體記憶，將特定政治敘事深植於參與者的情感底層。

此外，以尋找兩岸同名村落為主題的籃球交流賽，主旨是訴說台灣人「回家尋根」的故事，描繪許久未回的家鄉，以及許久（抑或未曾）見面的老鄉，一同在村落旁邊球場來場籃球賽，試圖營造出尋根之路你我同行的畫面。由於該活動期間我已結束實習，但透過參與事前開會以及後續成果記錄影片中可以發現，在場有相關政府單位代表出席，是一場政治工作非常明顯的活動。

影像生產中的情感動員與認同框架

本次實習我被分配的組別是新媒體組，除了活動期間做紀錄之外，活動前也要負責提出拍攝腳本、分鏡以及預期剪輯效果。實習生雖然擁有拍攝內容的自主性，但在前期腳本規劃以及後期剪輯時，經常被要求要符合兩岸交流合作，引導台籍學員在受訪時陳述來中國的正面心得，或者傳達兩岸的交流可以促進融合等拍攝脈



絡。甚至擔心無法剪輯出兩岸融合的素材，還有備用的回答台詞和應對模式，例如在籃球交流賽其中一支短片腳本的問題中就明確寫著：

能和家人一起為家鄉打球，還能遇到台灣同根同源的鄉親，感覺意義非凡，是份很珍貴的家庭回憶。（按：針對中國球員）

希望孩子能記住，海峽對岸有和我們血脈相連、名字一樣的「家人」。

希望年輕人多交流，多瞭解我們共同的根在哪裡。

這種採訪模式在攝影機的環伺下進行，構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受訪者為了安全或場面和諧，往往會產生自我審查，說出符合期待的言論。這些經過加工的認同碎片，隨後再透過剪輯與拼貼，就成為所謂的「台灣民意」，掩飾了現場真實的身分掙扎。

G 公司有許多台籍員工，但幾乎都是從小就在中國就學，並且畢業於台灣官方不承認學籍的大專院校。我透過談話推論，這個群體選擇在 G 公司任職，主因可能是回台灣就業，學歷不被承認，以至於起薪會低於台灣應屆畢業生；再加上中國提供給台青的紅利比中國應屆畢業生來得優渥，對於台青而言，留「廈」發展的誘因似乎就更大。此外，G 公司招募實習生的方式是透過過往的人際網絡，尤其是參加過 G 公司主辦的交流活動的青年，藉此網絡延伸拉攏更多實習生。我認為這類型的實習生較其他管道更具特殊性，他們大多數是鄰近廈門的 Q 大學學生，有地緣環境的便利性。過往已有相關研究和報導指出，離島地區的民眾更容易成為中國眼中的統戰對象，因此我推測 Q 大學學生更容易參與這類活動，是環境和文化因素使然。另外，也有部分實習生是透過 LINE 社群的宣傳文宣招募，這類型的實習生比較會抱持前去實習與學習的心態，認為 G 公司提供合理的薪資、提供住宿，又可以趁休假去看看不同於台灣的人文風情，是個不錯的實習選擇。甚至有極少數實習生是透過家族長輩或入駐企業的親友關係而來，這種人脈網絡使得統戰活動更容易滲透進台灣的基層社會。

上述提到實習生的組成大致有三類，我認為這三群的實習動機大相逕庭，但透過人際網絡來實習的人，較其他兩類更懂得遊戲規則，實習工作中包括完成政治工作，可能早在他們的預期內，因此以下將討論的消極抵抗更偏向指另外兩類實習生。G 公司在招聘文宣上只簡單說明，「研學組」主要負責帶領兒童營隊活動，「新媒體組」負責記錄活動畫面和剪輯，而「鄉建鄉創組」則負責鄉村振興及文創 IP 製作。由於經由其他管道而來的實習生較多是大三、大四學生，面臨畢業後的

就業問題，大多數是抱持來培養技能，或是可以藉此多元發展的心態，事前普遍沒有預料到實習工作包含了大量的政治工作。

在高度壓力的環境下，實習生表現出複雜的心理機制。一方面必須完成製造認同假象的任務，另一方面則透過言詞進行消極抵抗。當同儕被迫在鏡頭前進行政治正確的表態時，實習生之間常以開玩笑的方式化解尷尬。例如私下叮嚀：「你要好好講欸！免得兩邊都得罪，還回不了台灣。」這種幽默或譏諷，實際上是實習生在面對「非自願展演」時的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反映了他們深知自己正在協助生產一場虛假的政治展演，卻在結構壓力下無力改變現狀，乃至配合演出。實習生對於政治操演的態度與反應，上班期間由於有上級主管和其他的壓力必須服從，因此在不危害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會選擇配合，卻也經常可見「消極抵抗」的行為，例如在上百人高喊口號的場合時，選擇用模糊的嘴型和發音含混過關。

製造出來的認同能否轉化為真實的歸屬感

總結這段田野實習經驗，G 公司的運作模式展示了當代統戰工作如何透過「市場化外殼」與「台青代理人」來降低政治敏感度。從公開場合矮化台灣的國格，到影片敘事強調兩岸融合的敘述，每一個環節都在刻意消弭台灣的主體性，並試圖在國際與兩岸社會中製造認同的一致性假象。然而，從實習生私底下的抵抗可以看出，這種製造出來的認同始終難以轉化為內心真實的歸屬感。這場耗資巨大的符號工程，雖然產出了精美的宣傳影片，卻也同時在參與者心中製造了更深的排斥。

實習結束回到台灣後，當滑過社群平台，螢幕上頻繁出現各類創作者以短影音採訪在陸台灣人的片段，接著看到影片下方充斥著各種贊同與附和的留言，我腦中浮現的卻是實習期間在 G 公司參與的那套「說故事」產線。這些看似隨機、真實的街頭對話，其背後的運作邏輯、引導語句，乃至於刻意呈現的情感爆點，與我在廈門所見的符號生產流程如出一轍。這不禁令人反思，當「認同」與「歸屬感」轉化為可以透過腳本預設、後製剪輯來量產的「商品」時，兩岸之間原本應有的真實對話空間，是否正逐漸被這些精心建構的情感敘事所輾壓？

中國研究的困境與未來 關於專業領域與方法論的一些初步反省

講者 | 吳國光*

記錄 | 紀曉勵**

在台灣的中国研究迫切需要一個知識體系，吳國光老師在演講¹一開始提出三個問題讓大家思考：一、為什麼要研究中國社會政治問題？二、研究中國問題的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難是什麼？三、如何克服挑戰？這三個問題對應到中國研究面臨的三大挑戰，亦即難以接近研究對象、假訊息（disinformation）與社會科學理論層面的挑戰。

難以接近研究對象與獲知真相

首先是田野調查的挑戰，中國研究學者面臨的危險與日俱增。據統計，日本近年間有二十多位學者在中國境內被拘捕，到中國做田野調查難以展開，導致日本學生更不願意做中國相關的議題。加上政治監控緊縮，即使接觸到訪談對象，受訪者也可能有各種顧忌和自我審查，使其很難講出實情。另外，兩岸一般性的學術交流也逐漸大幅減少，讓研究者更難接近中國。

研究者即便能夠接近研究對象，能夠多大程度地獲知真相？這對中國研究者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即使真的到了中國境內，也可能看不到真相，因為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也不見得了解自己所身處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對於社會學家而言，接近研究對象照理來說可以更接近真相，然而中國有特殊難點——在中國現行體制、訊息與傳播機制下，有很嚴重的假訊息。中國的論述會被政治意識形態所左右，在單一訊息主導的情況下，假訊息特別嚴重。

* 美國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中心高級研究員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¹ 演講於 2025 年 12 月 18 日進行。



演講會場一隅。

中國政權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透過「論說」來塑造權力合法性，比如中國對兩岸關係有自己一整套的論述，且不斷地在加強與宣傳。中國民眾也受此論說方式影響，在鏡頭前後的表達方式不同，面對鏡頭像似官員在說話，跟私下的樣貌大不相同；而在台灣比較不會有這種現象，人們說話的方式不會因為有鏡頭而改變。

有些人會以《人民日報》中的論述為例，自以為了解中國，然而《人民日報》是討論對象而非討論工具。吳國光從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後曾擔任《人民日報》評論員，負責撰寫社論，十分了解《人民日報》的本質。吳國光回憶當時的中國人民每週六下午都要做政治學習，閱讀《人民日報》社論，《人民日報》是中國共產黨面向大眾的資訊傳播媒介。人們在面對假訊息時，最重要的是要有思考能力，尤其是批判性思維，因為若是帶著審視觀點去看《人民日報》，會發現內容言之無物。此外，在中國與高層交談不見得可以得到真實資訊，民眾又很容易被主流輿論所引導，不一定能講出真話，因此更增加了解中國現實的困難。

吳國光分享自己在中國的親身經歷，從教育、報紙和文件上看到的，都和現實有很大的不同。例如，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官方說林彪叛逃到蘇聯，在此之前吳國光曾聽到林彪出事的消息，但報紙上仍有林彪的報導，因此認為那只不過是謠言，然而幾天之後就看到相關消息刊登出來。媒體報導與現實不同是很荒謬的，卻是真實發生的狀況。吳國光上大學時加入人民公社，了解到中國的統計數字缺乏真實性與準確性，舉例來說，農民不知道要申報多少肥料，而記錄的人也不了解，於是隨意申報一個數字，甚至直接由記錄的人決定，當時中共政權的邏輯就是這樣。中國19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普遍有一套應付上級、應付外來人的方法，這種機制在中國一直存在，不過即使身在其中可能也不了解。



吳國光教授與通訊主編陶逸駿。

中國研究的理論困境

西方體系裡中國研究的理論非常落後，吳國光認為理論的斷層約是十五到二十年之間，也就是已經問世的理論，中國研究要等到十五到二十年後才有人運用，這是時間上的落後。更大的落後是，中國研究沒有對其他領域貢獻理論成果。反之，民主政體的歷史很短，僅幾百年，然而對民主政體的研究遠遠多於非民主政體，這是因為民主政體更為開放，研究成果能夠用於治理。民主體制中人民是權力來源，那麼，非民主政體的權力來源是什麼？習近平的權力來源又是什麼？使用韋伯（Marx Weber）的傳統、卡里斯瑪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來解釋好像合理，不過吳國光認為此種理念型的分析有所缺陷，因為有領袖魅力且合法鞏固政權才屬於卡里斯瑪，習近平具有領袖魅力嗎？好像也不是這麼回事，至於以傳統型權威或法理型權威來解釋，分析上也不準確。此外，中國研究很大的問題是面臨非民主政體與社會，社會學就是要學習理論方法，理論不足、知識積累不足，巨大的大樹上做小的工作容易，而沒有前人深厚的奠基將使研究者面臨巨大的困惑，吳國光認為這是做中國研究最大的困難。

中國研究在社會科學理論層面的困境主要有三：首先，民主政體研究學者會有道德的優越感，然而這對於研究並無助益，認為民主政體和非民主政體不能做比較或者將限制中國研究是不對的，像是中國共產黨也在乎民意，只是方式不同，將民主政體和非民主政體做比較與分析會是一個突破。其次，是對西方主流社會科學理論的挑戰，後冷戰時代以來社會科學理論慣用線性思維，而這不能解釋 1990 年以來中國的發展。最後，若是認為東亞文明傳統與歐美文明不同、深層文化邏輯不同，將會落入中國特殊論，若被這個迷惑，將無法突破中國研究的困境。

在比較框架下理解中國的特殊性

中國研究宏觀框架仍未建立出來，在量化方面，數字資料本身有問題，很多數

字也找不到，加上上述提到的種種困境，導致研究者只能有什麼材料就做什麼研究。那麼，未來我們該如何克服量化方法的弊端？吳國光認為，台灣在中國研究方面知識密度高，應對這些挑戰有特定的優勢，而歷史研究是很好的調查方向。若能系統性地整理台灣過去的匪情研究，回過頭看當時哪些判斷是正確的，以及為什麼正確，可能可以彌補資料取得艱難的困境。

問題意識是做研究的第一位，人的生命有限，學術研究適合我們想問題，想清楚哪個問題應該探索，才去做研究，而現在中國研究的困境是故事很有趣，但沒有理論。解決方法有三：第一，確立問題意識；第二，做歷史研究；第三，運用比較方法，不要陷入中國特殊論，而是要放在一般的框架下去理解中國，在此前提下看到不同的點才有特殊性，民主政體和非民主政體可以做比較，不會像拿蘋果和梨子做比較。研究者應該多讀書，多涉略理論，如果只讀一家理論，將難以跳脫該學派；眼光放高一點，做的研究也會更好。吳國光最後提醒，華人應該自己來做中國研究，在沒有語言隔閡之下，將能更深入研究中國，形成一個以華裔學者為主的學術社群。



與會者合影。

中國互聯網三十年

講者 | 賈葭*

主持人 | 陶逸駿**

記錄 | 鄒凱業***

本次中國研究工作坊邀請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賈葭主講。¹ 賈葭實務經驗豐富，曾任新華社《瞭望東方週刊》編輯、香港《鳳凰週刊》資深編輯、騰訊《大家》主編等職，目前旅居日本，與人權律師伍雷、公共知識分子李厚辰共同主持 YouTube 頻道《三個水槍手》，以幽默詼諧的日常對談方式，討論中國體制、社會現象與歷史反思等議題。

2014 年，清華社會所乙組中國研究學程前往北京進行田野期間，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張健老師引介下，曾經與賈葭進行座談。² COVID-19 疫情期間，賈葭離開中國，移居東京，經阿古智子老師推薦，出任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本次演講可說是賈葭在十年後回顧、更新相關資訊，系統梳理中國互聯網³ 三十年來的改變與生態演進。

中國互聯網演變史——從 BBS、博客到微博

賈葭首先說明中國互聯網近三十年來的歷史演變。經歷了幾個不同時代，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自由度與主要的傳播媒介。

* 東京大學客座研究員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當代中國研究通訊》主編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1 演講於 2025 年 10 月 28 日進行。

2 可參閱〈維穩 3.0——互聯網時代下的新媒體崛起與審查〉，《當代中國研究通訊》，2015，23：24-27。

3 台灣用語為「網路」，但為了還原語境，本文沿用講者所使用的「互聯網」。

第一個時期是 BBS Blog 時代。此時期中國互聯網尚在萌芽階段，也就是所謂的 Web 1.0 時期，特色是用戶扮演「讀者」角色，只能被動瀏覽入口網站提供的資訊，互動性有限。賈葭指出，1998 年前後，互聯網內容極度匱乏，一般民眾仍依賴《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官方媒體獲取資訊。與此同時，各大學的 BBS 平台迅速崛起，成為網民討論時事、文化與哲學的開放空間，孕育出豐富的網路次文化。代表性平台包括：北京清華大學的「水木清華」（1995 年創立）、上海交通大學的「飲水思源」（1996 年創立）、武漢大學的「白雲黃鶴」（1996 年創立）、南京大學的「小百合」（1997 年創立）等。賈葭特別提及 1999 年創立的「天涯論壇」催生了所謂的「明粉」。大約在 2005 年前後，網路作者「當年明月」（本名石悅）在天涯社區的「煮酒論史」連載「明朝那些事兒」，點擊量高居中國網站前列，最終結集出版七冊，發行數百萬冊，並催生出一批將明朝視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王朝」的忠實讀者群。⁴在此時期，官方的手開始伸進互聯網，2003 年頒布了《互聯網資訊管理辦法》，北京市通信管理局於 2006 年首次封禁由中國社科院幾位教授所創辦的「世紀中國」網站。

第二個時期是博客時代。此時期由 Web 1.0 轉向 Web2.0，特色是雙向互動，用戶成為內容的創作者（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大約從 2005 年開始，博客網站大量興起。賈葭提到比較有名的「博客中國」，其創辦人王俊秀首次將 blog 翻譯為「博客」，以及至今仍存在的「新浪博客」、「騰訊博客」等等。

賈葭介紹了「老羅語錄」主人公羅永浩在 2006 年創辦的「牛博網」。牛博網匯聚了許多專欄作家、學者和媒體人，很快成為中國公共事務討論的重要陣地，吸引了如韓寒、梁文道、柴靜、連岳、方舟子及化名「醉鋼琴」的清華大學教授劉瑜等人，形成一個聲勢龐大的泛自由派話語圈。在當時相對寬鬆卻已暗藏紅線的環境下，牛博網的創作群展現出驚人的膽識，甚至曾經開設「北京奧運，我不支持」的子網站，雖然僅營運十天就被迫關閉，但也成為當時的奇蹟。隨著影響力擴大，牛博網的日訪問量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前就已突破百萬，汶川地震發生後，牛博網在短短幾天內為災區籌得百萬人民幣的賑災基金，羅永浩甚至親自帶隊前往第一線賑災，將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論影響力轉化為實質的社會行動。然而，這個啟蒙無數讀者的網站壽命卻極其短暫。2009 年 1 月，官方強制關閉牛博網，實際營運時間不到一年半。

4 編者注：這是當前「皇漢」潮流的其中一個重要淵源。

在牛博網遭禁前後，中國知識分子嘗試透過「網刊」延續公共討論，例如分析國際外交的《縱橫週刊》及《獨立閱讀》。這些獨立刊物在困難中堅持多年，分別在 2012 及 2015 年間陸續劃下句點。此時期還爆發了震驚社會的「MSN Space 事件」，⁵ 當時 Microsoft（微軟）因涉嫌向中國政府提供用戶資料，導致著名記者被捕，甚至引發美國國會對微軟的質詢。隨著獨立空間收窄，許多作者轉向搜狐、網易等民營門戶網站發表評論。賈葭提到，由於民營網站沒有官方特許的採編與發稿權，當時盛行一種名為「洗稿」的常規做法：網站向知識分子邀稿後，先透過有發稿權的官方媒體或地方報紙網站發表，再以「轉載」名義登載，以此規避法規限制。

第三個時期是微博時代。2007 年 Twitter（現名為 X）的誕生開啟了中國互聯網的新時代。王興隨即推出仿效產品「飯否」，由於直擊 2009 年央視大火的傳播而聲名大噪，成為中國最早具備分布式、去中心化特徵的 Web 3.0 雛形，但同年就因新疆七五事件遭到官方封禁。飯否關閉兩個月後，新浪與騰訊相繼推出微博，並引入「粉絲」文化；新浪微博是至今唯一存活的此類產品。然而，隨著 2013 年官方整治薛蠻子⁶等「大 V」，公共知識分子遭到連番圍剿，微博言論空間大幅縮減，促使內容創作者意識到字數限制⁷的局限，進而催生出騰訊「大家」等長文章產品，隨後並逐步過渡到微信與今日頭條等移動端自媒體時代。

思潮澎湃的黃金期

回顧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中國互聯網曾有公共議題與思潮澎湃的黃金期。從早年天涯論壇連載「大敗局」、台灣作家痞子蔡的網絡文學，到韓寒、慕容雪村等初代網紅的崛起，都深受網民追捧。此時期的社群不僅發起如「草泥馬」⁸等對

5 〈微軟承認關閉中國記者的博客〉，自由亞洲電台，2006 年 1 月 6 日。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china_internet_microsoft-20060106.html

6 薛必群，別名薛蠻子，出生於北京，原籍重慶市梁平區，美籍華人，天使投資人。早年在美國投資房地產，為 UT 斯達康創始人之一，曾擔任中國電子商務網 8848 董事長、中華學習網董事長等。2013 年 8 月 23 日，因涉嫌聚眾淫亂，遭北京警方逮捕。〈知名投資者薛蠻子台北遇車禍送院？妻子急澄清 瘋傳擔架照真相係……〉，星島頭條，2025 年 2 月 6 日。<https://www.stheadline.com/china-taiwan/3426169/>

7 微博的字數限制為 140 字之內。

8 中國網民為規避網路審查，惡搞出「十大神獸」，其中澳洲的羊駝被戲稱為「草泥馬」，因其發音與髒話相近而迅速在華語網路世界爆紅。賈葭指出，中國公民也會在公共場合拿草泥馬玩偶，表達

官方的解構與抗議，更對諸多重大社會事件進行了深刻的集體思辨。例如：「廈門PX項目抗議」⁹展現了媒體力挺市民上街的風骨；「楊佳案」¹⁰讓青年網民將其奉為反抗體制不公的「刀客」符號；「郭美美事件」¹¹則以一己之力徹底摧毀了中國官方慈善機構的公信力。在時政層面，媒體勇於公開報導孫志剛之死¹²並成功推動廢除收容遣送條例，甚至能公開舉辦講座，邀請國外學者共同討論文革與政治體制改革。這段時期的中國互聯網也見證了因烏魯木齊「七五事件」斷網，¹³導致大批淘寶店主驅車幾千公里，在甘肅邊界催生出「柳園鎮」沙漠明珠的奇特歷史。然而，這場言論盛宴最終迎來了嚴厲的政治清算。當年積極參與社會討論的商業巨擘與知識分子都付出了巨大代價，例如：官二代出身的房地產企業家任志強因露骨批評體制，遭判刑十八年；¹⁴研究大饑荒人口損失的楊繼繩、研究新疆問題的維吾爾族教授伊力哈木等人，或遭噤聲或被判重刑。昔日那些激辯產權、反壟斷與大饑荒的公共知識分子，如今多數已銷聲匿跡或流亡海外，當年的網路啟蒙與反抗潮，在

對公共議題的不滿。

- 9 此事件發生於2007年6月，起因是民眾反對台資企業在廈門海滄區興建「對二甲苯」（PX）化工廠。由於預定廠址距離市中心太近，引發公眾對環境與健康的疑慮，最終透過萬人和平遊行與網路串聯，成功迫使項目停工並遷址。〈茂名民眾抗議PX工廠項目與警方爆發衝突〉，紐約時報中文網，王霜舟，2014年4月1日，<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401/c01protest/zh-hant/>
- 10 2007年10月，北京青年楊佳到上海旅遊時因租借自行車遭警方無理盤查並帶回審訊。楊佳獲釋後指控在拘留期間遭警察毆打羞辱，此後半年他不斷「一級級投訴都沒有結果」，上海閘北公安分局試圖以1,500元和解遭其拒絕。投訴無門下，楊佳於2008年7月1日持刀闖入閘北公安分局大樓，過程中連捅數人，最終造成民警及保安6死4傷。〈現代武松 楊佳襲警案轟動中國〉，《看雜誌》第24期，周平沙，2008年11月5日，https://www.watchinese.com/article/2008/833#google_vignette
- 11 名為郭美美的年輕女子2011年在網路上以「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身分大肆炫耀奢華生活，引發公眾對慈善捐款去向以及官員貪腐的質疑與批評。〈大家談中國：郭美美事件繼續發酵〉，BBC中文網，池墨，2011年6月28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omments_on_china/2011/06/110628_coc_china_red_cross
- 12 2003年3月，剛畢業的大學生孫志剛在廣州街頭因未攜帶身分證，被警方以無業遊民強制收容，隨後在收容遣送生命救助站內慘遭蓄意毆打致死。此事件經媒體報導後全國輿論譁然，最終迫使中國官方於同年6月宣布廢除實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
- 13 〈中國當局繼續就新疆騷亂控制網絡封鎖通信〉，自由亞洲電台，何山，2009年7月7日，https://www.rfa.org/cantonese/news/media_xinjiang-07072009113549.html
- 14 〈北京地產大亨任志強獲刑18年 貪污受賄等四罪成立〉，BBC中文網，2020年9月22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4115615>

日漸收緊的審查與圍剿下走向終結。

實現線上發言分析、線下精準抓捕

除了歷史過程，賈葭進一步分析中國政府對於互聯網的政治控制。1987年9月14日，中國發出第一封電子郵件，內容提到：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越過長城，走向世界」）。諷刺的是，在十多年後的2002年5月17日，中國建立了「防火長城（GFW）」，再到如今演算法與大數據全面監控，政治幾乎無孔不入地滲透整個中國互聯網。賈葭指出，早年的網路環境毫無遮蔽，網民能自由瀏覽境外資訊。防火長城架設初期，技術仍以文字為主、帶寬狹小，例如2004年僅僅約一萬名網民湧入觀看女作家竹影青瞳的自拍裸照，便能導致天涯論壇伺服器當機。在彼時翻牆軟體尚未普及的背景下，《大紀元》提供的「動態網」成為媒體人獲取境外資訊與突破封鎖的關鍵轉接點。隨著網路頻寬與數位科技的躍進，傳播媒介從BBS、部落格、微網誌，一路進展到自媒體及抖音、快手等影音直播時代。

賈葭進一步定義，真正的「自媒體」時代，始於微信公眾號的誕生。這是一種依賴現有流量平台、缺乏機構媒體專業審稿流程、且具備「點對點」傳播特性的個人傳播行為。從技術光譜來看，BBS時代屬於高推薦、高開放性的公共網路；而微信則走向完全相反的極端，演變成一個「基於熟人關係、不註冊便無法瀏覽任何內容」的「封閉生態系」。此外，隨著《今日頭條》等平台引進「內容演算法」，透過相關性、環境特徵與停留時間進行精準推送，在提供用戶喜好內容之際，也將用戶誘捕進「演算法陷阱」中，導致嚴重的同溫層與信息繭房效應。

這場技術進步最大的受益者並非普通民眾，而是中國官方。傳統紙媒時代仰賴繁複的「三審三校」流程進行事前審查，自媒體時代則是「一鍵全網發布」後，由官方透過技術與法律實施更為嚴密的後置管制。賈葭提到中國互聯網可能是全世界管理規範最複雜的體系，現行擁有高達54個正部級部門共同管理網路，法規條例多達300餘項。其核心管制邏輯來自2007年為了北京奧運（2008年）而全面推行的「網路實名制」，將線上言論與線下身分實名確認，再透過語音AI、人臉識別與大數據系統進行大規模交叉比對。賈葭指出，早在2018年的深圳，官方就已成功整合酒店住宿數據、微信支付紀錄與人臉辨識，實現了「線上發言分析、線下精準抓捕」，猶如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小說《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監控社會。

在官方發動一輪輪整治，透過封號、限言與逮捕，徹底粉碎民間輿論場後，原

有的自由派思潮消散，中國互聯網轉由周小平、胡錫進等官方建制派網紅主導。同時，隨著打賞、知識付費與直播帶貨等「商業流量變現模式」的崛起，網路生態徹底倒向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

區分政治認知作戰與商業流量手段

關於「認知戰」這個議題，賈葭認為，中國互聯網上的涉台言論與認知作戰（本質上即為官方的「宣傳」）存在明確的規模界線，必須將官方主導的政治行動與民間的自發行為分開來看。許多台灣人看來極端且誇張的言論（如「三天拿下台北」），本質上並非純粹的政治認知戰，而是創作者為了爭奪流量，刻意製造激進觀點以獲取點閱與商業利益的吸金手段，言論本身其實是為了背後的商業交易服務。

賈葭進一步指出，中國現行互聯網普遍存在「90比9比1」的比例，即90%的用戶是圍觀的旁觀者，9%是普通創作者，只有1%是積極創作者。在抖音、快手等主流平台中，涉台內容實際上僅占時事政務類總量不到百分之三，且高達九成的涉台言論不是共產黨官方或基於特定認知戰目的而發布，而是創作者為了爭奪注意力經濟下的「商業流量」所延伸出的誇張言論。

賈葭認為，真正意義上的認知作戰，應限縮在「具備特定政治目的、主動干擾台灣民意或選舉、試圖客觀促成台灣內部混亂」的官方行為。根據騰訊內部數據以及網信辦對大廠實施的平行政策推估，在數百萬個涉台互聯網帳號中，約有一成是由網信辦親自安插、下場操盤的「白手套」帳號。這批真正專職於認知作戰的帳號規模約在十五萬至二十萬個之間，一旦同步發動宣傳，每單次內容能集體帶動高達兩億次左右的瀏覽量。這才是屬於國家機器體制內、有編制且針對性極強的政治作戰規模。

相反地，台灣社會經常將所有刺耳的言論動輒歸咎於「中國滲透」或「認知作戰」，賈葭認為這是一種誤判，他以「質樸而蠢笨的政治正確」描述「小粉紅」的行為。比如在京都神社繪馬上塗抹「中國台灣」等行為，背後既沒有獲得官方報酬，也不是為了配合當局的戰略部署。這種現象純粹是個體在嚴格審查與洗腦教育下，為了追求社群上的「政治正確」而產生的自發性行為。他們雖然本質上被形塑成中宣部的小喇叭，但倘若台灣人將這種最廉價的愛國宣洩通通劃入認知作戰，反而無法精準識別真正的威脅。

在對抗這種體制宣傳與認知干擾時，謠言與政治正確的傳播速度在新媒體時代遠超真相，且客觀效果上難以完全將兩者切割，但反制的核心仍必須仰賴「真實資

訊的自由流動」。賈葭保持相對審慎樂觀的態度，主張不要將自發性網紅一概論罪，因為唯有維護真相流動的環境，讓人們能夠接觸外部世界，才有機會打破中學教科書與歷史教育所建構的虛假信息，進而從根本瓦解宣傳的扭曲效果。

提問與討論

在演講最後的討論環節，一位同學指出他觀察中國自媒體，發現當女性網紅遭遇男性粉絲的污辱性言論時，若影片符合政治正確或小粉紅傾向，平台與官方演算法便會主動介入刪除惡評、給予保護。賈葭同意這個觀察，推論這不僅能為創作者帶來流量與收益的「獲得感」，更賦予她們被體制特殊關照的「權力獲得感」，進而強化其繼續傳遞官方論述的動機。至於黨國是否真的有這種透過流量獎勵創作者的收買機制，仍有待更多具體案例的深層分析。

第二個提問涉及中國早期市場化媒體在黨國體制下的自由度。賈葭提到，當年的言論尺度完全是媒體人用自己的前途、命運甚至是主管的職位作為籌碼，一步步肉身實測「摸索與死撐」出來的。他舉例，在主編願意承擔被開除或罰款的風險下，2008年馬英九的就職演說全文、2005年連戰登陸時的敏感標題，甚至2013年探討香港媒體環境限縮的敏感評論，都曾成功在雜誌與騰訊頭條上刊登。在那個時代，只要上級不直接降罪撤職，民營與市場化媒體的老闆通常很樂意用「罰款」來解決政治紅線問題。

第三個提問關注當時黨報等官方媒體由於缺乏市場競爭力，往往依賴旗下賺錢的都市報或子報來供養，這是否構成了某種制約體制的財務制衡關係。賈葭否定了這種制約假設，強調子報的財務支配權完全掌控在官方集團手中，地方政府與媒體主管在關鍵時刻必然會選擇維護政治穩定，絕不可能因為市場收益而向輿論妥協。即便子報賺再多錢，官方依舊握有生殺大權，想開除人就能隨時開除。當年《南方周末》等媒體之所以能刊登震撼社會的批判性報導，從來不是因為具備制衡體制的經濟優勢，而是無數媒體人前仆後繼、甘願以「被開除」為代價，用熱血與職涯，和體制審查所撞擊出的短暫言論高光。

一位新聞媒體人提問，做為一個海外觀察者，在中國政府有如黑盒子體制與當今資訊碎片化的時代，要如何判斷消息的真實性，例如秦剛、李尚福、苗華及何衛東等高層落馬的重大軍政人事異動，最早都是從海外社群平台流傳出來，同時也有大量如「習下李上」等，事後被證實為不實的政治傳聞。

賈葭坦言自己離開中國數年，確實能深刻感受到對於中國事務的即時判斷力在逐漸衰退。中共高層資訊是絕對的黑箱，因此他主要依賴兩大方式進行遠程的社會



與會者合影。

觀察：一是「潛水」於由新聞界、學術界等私密網絡組成的上百個微信群，觀察中國菁英日常關心的核心議題；二是隱形監測微博熱搜與小紅書的熱門標籤，掌握大眾流行文化的變遷。當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時，他則會直接與仍在現場、或在場卻不敢發稿的記者朋友通電話以確認事實。至於高層政治黑箱，賈葭表示自己並沒有特殊管道，但會長期追蹤並驗證如蔡慎坤等「曾多次精準且提前數天預言高層落馬」的特定海外觀察家。

這位媒體人接著提問，新華社自 2025 年 10 月 26 日起連發三篇、署名「鍾台文」的文章，此類署名文章在中共對台決策中究竟處於何種政治位階，台灣方面是否需要採取極度嚴肅的態度來解讀。

賈葭回應指出，「鍾台文」是全新推出的政治筆名，意味著中央台辦正式成立了專職對台宣傳的「寫作班子」。在中共體制內，每一個指標性筆名（如鐘宣理、任仲平）背後都對應著一個少則七八人、多則數十人組成的核心寫作小組。「鍾台文」的出現，顯示中共將涉台話語權進行了「歸口處理」，未來中國各地方台辦與部委的涉台交流文本，預計都必須經過這個寫作小組的審定與定調，因此其政治動向極具指標意義。

然而，在解讀具體內容時，賈葭認為近期「鍾台文」所發布的文本，整體基調與過去《人民日報》或習近平本人的強硬講話相比，語氣反而弱化與放低。文章並沒有強調迫切統一或強硬對抗，而是重新將重心移回「強調發展而非強調統一」的傳統基調。賈葭據此研判，雖然該筆名位階極高、動作新穎，但釋放的實質政策訊號反而在語氣上有所收斂，仍需長期觀察後續的論述走向。

「一國兩制」的終結與中國政治變遷

講者 | 王耀宗*

主持人 | 陶逸駿**

記錄 | 羅玉芬***

清華大學中國研究學程與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邀請王耀宗教授、潘玉瓊教授夫婦來訪。¹ 王耀宗教授以「一國兩制的終結」為題發表專題演講，潘玉瓊教授參與問答。數十名社會所及人社院學士班學生出席，討論氣氛十分熱絡。

王耀宗在香港學界任教，長期研究中國政治與香港，親身經歷香港由英國殖民地轉變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歷史過程。過去數十年，持續觀察「一國兩制」制度的演變，研究與著作多聚焦於中國政治制度、香港政治發展及中港關係，2025年6月在台灣出版《華年心緒從頭理：回憶從英殖到中國特區六十年的香港》一書，從個人成長故事，寫至從香港嶺南大學退休，記錄了香港當代人文篇章。

演講回顧香港政治歷史與制度安排，也從中國政治體制的結構特性出發，分析香港制度轉變的原因，並延伸討論台灣社會與中國之間的互動。與會學生與研究者亦提出多項問題，針對中國政治未來發展、民主制度與威權政治的關係，以及青年世代的政治認知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

中國決策模式與制度特性——少數領導、高度集中

王耀宗首先說明理解中國政治的關鍵，在於認識其決策模式與制度特性。在民主制度中，政策改變通常透過選舉與政黨輪替完成，不同政黨有不同的政策方向，並且隨著社會支持程度而逐步調整。這種制度特性雖然可能效率較低，但具有一定

* 香港嶺南大學政治系教授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當代中國研究通訊》主編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¹ 演講於2025年10月23日進行。



潘玉瓊教授。



王耀宗教授。

程度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相對而言，中國政治體制是一種高度集中決策的制度，政策方向往往由少數領導核心決定，一旦方向確定，政府便會迅速動員推動。這使得政策可以在短時間內發生大幅度轉變，而社會缺乏制度化機制進行制衡。王耀宗舉例說明，當政治局勢或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中國政府可以迅速改變政策方向，無需經過長時間的民主程序。這種決策模式在某些情況下具有高度效率，卻造成政策充滿不確定性。因此，在分析中國各項發展時，不能單純將政治與經濟分開理解。即使某些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看似具有相對自由度，但政治權力始終是影響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

王耀宗指出，香港的政治發展無法單獨理解，必須放在中國政治制度與歷史脈絡之中。從十九世紀以來，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形成獨特的法律制度、行政體系與社會文化結構。1997 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時，中英雙方透過談判設計出「一國兩制」制度，希望在中國主權之下維持香港原有的制度與生活方式。

歷史的伏筆——從條約時代到 1979 年的命運轉折

香港的法律地位是由三份性質迥異的條約交織而成。1841 年的《南京條約》與 1860 年的《北京條約》在當時大英帝國架構中均屬「永久割讓」（ceded in perpetuity）。然而，占地最大的「新界」則是根據 1898 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期九十九年，即在 1997 年屆滿。

1979 年 3 月，時任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前往北京會晤鄧小平。王耀宗引述英國解密檔案指出，雖然該次會面沒有正式官方紀錄，但麥理浩回港後的報告中顯示，鄧小平雖承諾「請投資者放心」，卻對主權問題展現出不容置疑的強硬態度。1981 年是另一個隱形的轉折點，中共內部達成收回香港的最終共識。

表 1 英國政府初期方案與中共最終決策對比

比較項目	英國政府初期方案（1979-1981）	中共最終決策（1981-1982）
土地管治權理論	試圖以「治權換主權」，名義歸中，實質歸英。	否定條約合法性，堅定採取「收回主權、治權、行政權」一體化。
歷史情感與定位	基於法律實證主義與契約精神，尋求穩定商界信心。	定位於「民族統一」，內部定調「不做李鴻章」以防被視為賣國。
經濟與戰略優先	優先考慮九七危機對全球金融的衝擊，維持管理體制。	決定利用香港作為「窗戶」，但政治安全必須為經濟利益定調。
制度安排預期	希望在英國普通法體系下，維持行政與自治長期穩定。	發展出「一國兩制」作為過渡性安排，核心在於由中共定義自治。

當時外交部官員提出了具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口號：「不做李鴻章」。這一表態深刻揭示了中共的決策心理：收回主權是洗刷民族恥辱的絕對優先任務，任何「主權與治權分離」的方案皆被視為背叛。儘管英國國會評估香港不可能進行軍事防禦，但曾試圖透過法律技術尋求轉圜。然而，中共隨後展開精密統戰，王耀宗亦曾在 1984 年參與學術界代表團訪問北京，親見中共如何運用「實力地位」主導談判。上述背景最終演變為 1984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

三階段侵蝕——解構「一國兩制」的崩壞機制

「法治」曾是香港對抗威權的最強防火牆，但王耀宗觀察到，中共透過三個階段的技術干預，有效拆解了這道屏障，並以「三階段演進論」，揭示香港法治是如何被系統性瓦解的「法律戰」（lawfare）。

第一階段（1997-2003）是以「人大釋法」為核心的行政干預。1999 年「吳嘉玲案」是體制崩壞的起點，特首董建華因不滿終審法院判決，繞過憲法程序請求全國人大釋法。王耀宗指出，這在普通法邏輯下是嚴重的「類別錯誤」，意味著行政機關可動用政治權力干預司法裁決，破壞了「法律高於權力」的契約精神。

第二階段（2003-2014）是從「釋法」轉向「人大決定」。2004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政改「三步曲」修改為「五步曲」，² 形同一次重大的程序性奪權，賦

² 根據人大常委會 2004 年的《解釋》，「政改五部曲」包括：一、特首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提

予北京對香港民主進程的「實質否決權」與「決定啟動權」。自此，爭取雙普選的法律空間被壓縮至零。

第三階段（2014-2020）是人大直接立法與「一國一制」的降臨。2014年《一國兩制白皮書》提出「全面管治權」，2020年北京跳過香港立法會直接制定《國安法》。王耀宗精準指出，這體現了中共的「違約辯證法」：承諾是根據鬥爭需要而存在的，當「歷史文件」失去利用價值，違約便具備其政權邏輯下的正當性。

2020年6月30日後，香港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威權圖景。「愛國者治港」成為絕對信條，實質意義在於將一切政治反對派「病理化」為對政權安全的威脅。政治層面上，「47人案」象徵著法治精神的徹底死亡，在普通法中合法的選舉初選，在「中國邏輯」下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社會層面上，公民社會的支柱「教協」等大型工會被迫解散，教育現場淪為洗腦陣地，國安教育向下延伸至幼兒園。漫畫家尊子（Zunzi）專欄被停，說明了當權者結合法律、輿論與經濟的「混合戰」手段。乃至中共發起跨國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對流亡人士發布全球通緝令並威脅家屬，向全球展示其「國安邏輯」沒有邊界。

針對「國際金融中心遺址」³的經濟地位變化，王耀宗提供了深層視角：香港並非單純衰退，而是功能的「工具化轉向」。中共試圖將香港改造為「面向全球南方」（Global South）與特定政治目標的融資平台，然而，這種轉向導致高消費商務菁英流向新加坡，代價是「市場經濟」在中共管治下展現出顯著的「浮動性」（floating nature）。在中共政治哲學中，經濟利益不是神聖權利，而是政權賦予的「特許」，正如馬雲、李嘉誠等案例都反映出，法律已不再保護私有財產，而是服務於國家臨時需要的工具。

請人大常委會決定特首及立法會兩個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二、人大常委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確定。三、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並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四、特首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五、特首將法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予以批准或備案。資料來源：〈政改五部曲〉，文匯報，2013年3月11日，<http://paper.wenweipo.com/2013/03/11/HK1303110018.htm>

3 「國際金融中心遺址」是2023年興起的網路流行語，用以諷刺香港歷經社會運動、《香港國安法》、Covid-19疫情之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每況愈下，乃至已成為「遺址」。

台灣的鏡像——滲透、認知作戰與自我防衛策略

在探討台灣現況時，王耀宗與現場師生進行了深度的互動。王耀宗示警，台灣面臨的威脅是全方位的侵蝕，中共早已透過「財、名、色、權」四大利益誘餌，精準鎖定台灣政界、商界、學界與宗教界中，認同感薄弱或具備投機傾向的個體，台灣人對此不可不慎。

現場有同學提問，抖音、小紅書等平台透過大量展示中國發展繁榮的碎片化影像，成功建構出「威權效能優於民主失序」的虛假敘事，近年台灣年輕世代對中國的印象，與十多年前相比已有明顯變化。過去對中國政治的批判較為直接，但現在許多年輕人透過抖音、微博、小紅書等中國平台，或經由 Instagram、Facebook 等社群看到轉載內容，往往只接觸到中國城市發展、科技進步與娛樂文化的一面，於是容易形成「中國很進步」的單向印象，而較少意識到背後的政治控制與人權問題。這位同學坦言，如果沒有受過相關訓練，自己在面對這類敘事時也可能被說服，進而對美國民主或台灣政治產生更多不信任。陶逸駿老師補充，他近期在研討會曾聽到多位來自中國的學者批評「台灣的公民教育很失敗，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喜歡中國」，也讓他反思台灣在民主、公民意識與媒體素養教育上的不足。

另有同學詢問北京過去似乎多採取「循序漸進、盡量降低衝擊」的方式處理香港事務，但在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中，中央手段明顯升級，為何沒有延續較溫和的路線，而是在該時刻大幅加強控制？王耀宗回應指出，2014 年國務院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已明確提出中央對香港享有「全面管治權」，顯示北京對港政策思維在那時已出現結構性轉折。到了 2019 年，反送中運動規模擴大、示威持續且部分激進化，在中共視角中意味著香港局勢失控，加上本土派與港獨訴求的浮現，以及 1997 年後出生的年輕世代展現出較弱的中國認同，均被解讀為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挑戰。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執政敘事下，香港與台灣被視為高度象徵性的關鍵節點，使得北京更傾向以強硬手段重塑政治秩序，而不再以有限讓步與漸進調整來管理危機。

陶逸駿提到，台灣年輕世代展現了一種特殊的「嚇大」心理：在長期處於武力威脅的恐嚇下產生了心理疲勞與免疫，反而對低強度的社會滲透失去警覺。此外，系上師生前往金門與馬祖田野調查時，也觀察到「金廈一日生活圈」成為經濟整合帶動政治侵蝕的縮影。當兩岸在民生物資（如藥品、奶粉）上達成深度依賴，政治上的防線便會隨之軟化。更有甚者，中共正採取「邊緣化扶持」策略：不與具備強烈主權認同的對手對話，而是拉攏立場浮動、具備投機色彩的政治少數，試圖在台灣內部製造憲政僵局。

一位修讀教育學程、已投入中學教學現場的大學部同學分享指出，在台灣的教学現場，由於政治對立與家長投訴的壓力，老師在討論如「大罷免」或「中共黨史」等敏感議題時，往往受到「平衡報導」的教條束縛。老師若以十五分鐘講述中共的某一面，便必須花同樣時間講述另一面，否則便面臨投訴風險。這種零碎化與去價值化的教育，導致學生在面對中共系統性的宣傳攻勢時，缺乏深度的歷史批判力與防禦性價值觀。

也有同學提出不同總統主政時期的相異之處，例如馬政府時期校園裡可以討論政治，老師可以擁有並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當時的界線僅在於不能做政治宣傳，而不是完全不能談論政治。近年來隨著兩黨政治極化，校園內的氛圍比過往嚴峻很多，老師和學生討論政治議題很容易引起爭端，也會呈現假訊息造成資訊差所引起的誤解。

在提問環節時，同學詢問台灣應如何面對中共始終不放棄統一台灣，且步步進逼的局勢。王耀宗提出了以下建議：

- 一、實力導向的國防：大幅增加軍費，唯有具備不可忽視的軍事實力，才能在對話中守住底線。
- 二、國際戰略聯盟：深化與民主陣營的防衛夥伴關係，將台灣安全置於全球價值供應鏈中。
- 三、深耕「中共研究」：尤其是強化對中共黨史的研究。年輕世代若能深入理解中共從延安、井岡山到今日的「鬥爭哲學」，便不會被其表象的神話所迷惑。
- 四、堅守學術與道德底線：學者與知識分子應拒絕統戰利益的誘惑，守住基於事實與良知的獨立性。

香港的淪陷是全球性「銳實力」博弈的第一塊重要轉捩點，王耀宗引用澳洲學者 Clive Hamilton 的著作《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指出中共如何利用民主制度的開放性進行反向侵蝕。在民主國家受到中國侵蝕的例子裡，包括澳洲與加拿大，中共都展現了極高明的「菁英俘獲」手段。這種利用經濟依賴、商界捐贈以及對前政要的「上賓式」統戰，使得西方國家在「經濟互惠」與「政治主權」之間陷入兩難。

目前國際學界關注「軍事上依賴美國，經濟上高度依賴中國（如礦產貿易）」的矛盾狀態。例如，目前執政的澳洲工黨基於現實的貿易考量，加上傳統偏左的意識形態，對中國的態度相對親近，不僅公開承認「一中政策」，也試圖在美中之間

走中間路線，顯示出經濟利益在中共統戰與國際關係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上述這些例子都具有不同層面上的統戰意義，對於想要研究「中國統戰」或「中國研究」的學者與同學來說，深具田野調查的研究價值。

在歷史幽谷中尋找防線

香港「一國兩制」的終結並非偶然的政策失誤，而是中共威權本質與其全球戰略擴張的必然產物。王耀宗身為歷史的見證人，透露中共對契約的理解是動態的、辯證的，且具備高度戰略欺騙性的。當歷史文件不再符合其當下的政治利益，任何國際法上的承諾皆可被棄如敝屣。

香港的歷史悲劇為台灣及全球民主陣營提供了最慘烈的教訓：自由的底線無法建立在缺乏制衡機制的協議之上，而必須建立在實力與警覺之上。正如王耀宗所言，了解中共的歷史與其行為邏輯，是防禦的第一步。今日在香港社會正處於龍蛇混雜的過渡期，雖然政治上已陷入絕境，但那片土地上曾有過的自由靈魂與對契約的尊重，仍是歷史不容抹滅的見證。對於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們，守住法治的底線與認知的防線，不僅是為了自身的安全，更是為了在威權擴張的幽谷中，守住民主體制最後的尊嚴。



演講會場一隅。

Youth, Democratic Culture,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講者 | Anthony J. Spires *

主持人 | 沈秀華**

記錄 | 榴蓮小姐**

Anthony J. Spires 教授本次演講¹以新書 *Everyday Democracy: Civil Society, Youth,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Authoritarian Culture in China* (202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為核心，分享他在中國廣東地區橫跨近十年的田野研究成果。

在進入主題之前，Spires 先提醒聽眾留意一個近年來中國街頭隨處可見，關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海報標語。這些標語自 2012 年習近平上臺後，在城市與鄉村大量出現，內容涵蓋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公正、誠信、友善等十二個詞彙。然而，對於每天經過這些標語的中國民眾，尤其是學齡兒童而言，這些詞彙究竟意味著什麼？在學校教育中，老師通常只要求學生記住這些名詞以便應付考試，並沒有討論背後的意涵。這構成了本場演講的起點：在一個威權體制下，這些抽象的民主價值，是否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被真正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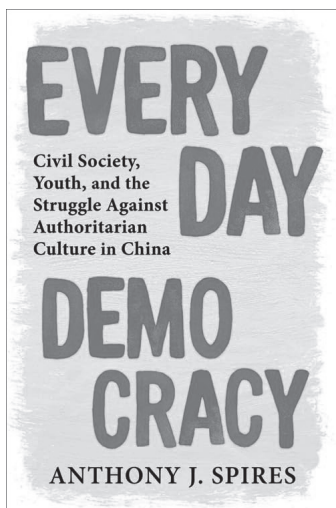
Anthony J. Spires 教授。

* 墨爾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University of Melbourne's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教授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匿名

¹ 演講於 2025 年 12 月 10 日進行。



Everyday Democracy 書封。

Spires 提出貫穿全書的核心問題：在一個幾乎所有主要的社會制度（social institutions），包括學校、職場、政府，都與威權治理邏輯緊密嵌合的社會中，公民組織是否仍能扮演托克維爾所說的「民主的大學校」？² Spires 認為可以，但極為困難。

理論基礎——托克維爾與葛蘭西

在理論層面，Spires 援引兩條主要的思想脈絡。第一條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傳統。十九世紀初，這位法國貴族在美國旅行一年後寫下《論美國的民主》（*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提出公民社會的自願性結社是學習民主的重要場域。Spires 接著引用三位當代學者的論點進一步深化此觀點：Pamela Paxton（2002）指出自願性結社是新政治領袖的訓練場，能幫助成員練習妥協、學習寬容；³Archon Fung（2003）強調這些結社培養合作、容忍、尊重他人與法治，以及參與公共生活的自信與效能感等公民德性；⁴Larry Diamond（1997）則強調，若公民社會組織自身的治理模式延續壓制異議、神化領袖、隱藏權力運作的規範，那麼它就不會建立起民主文化——換言之，若要作為「民主的大學校」，組織內部本身必須是民主的。⁵

Spires 坦言，他在前往中國做田野之前，其實並不太信服托克維爾的觀點。尤其在 911 事件後、美國執意進軍伊拉克之際，他和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議，卻仍無法阻止戰爭發生，這讓他對美國公民社會的力量相當失望。直到進入中國田野之後，他才開始重新思考托克維爾的洞見。

2 志願性社團和公民組織被認為是「民主的大型自由學校」（large free schools of democracy），這個概念最初由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第二卷（1840）中提出。

3 Paxton, P.,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democracy: An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2): 254-277.

4 Fung, A., 2003,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ories, hopes, and reali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1): 515-539.

5 Diamond, L., 1997, *Civil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Madrid: Centro de Estudios Avanzados en Ciencias Sociales.

第二條思想脈絡是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hegemony）概念。葛蘭西在 1920 年代即試圖回答：為什麼共產主義革命發生在落後的俄羅斯，而不是工業化的英、德等國？他的答案是，在工業先進國家，資本主義階級透過教會、學校、工會等公民社會組織，以一種更為隱微的方式取得人民的「同意」，使既有的支配秩序看起來自然而生。公民社會因此既是霸權的傳遞者與生產地，也是反霸權（counter-hegemony）想像得以萌芽的空間。

Spires 從葛蘭西的洞見得出一個對中國研究而言相當基進的論點，亦即當我們談論台灣、美國等民主社會時，我們也應該相對地談論威權社會，體認到中國不僅是一個威權的政治體制，更是一個威權社會，以及組織內部的階層制、獨斷與壓制異議，正是這種「霸權式威權主義」（hegemonic authoritarianism）的具體展現。

中國公民社會研究的盲點

Spires 指出，過去學界對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存在三個明顯的盲點。首先，大多數研究聚焦於專業化的 NGO 與政府組織的 GONGO。⁶ 其次，研究多半關注國家與社會關係，例如 NGO 如何在威權國家中生存、國家如何壓制或支持它們、它們如何與國家對話等等。這些議題固然重要，但終究只是公民社會研究的一個面向。最後，極少有研究探討組織內部的文化，以及人們在這些組織中究竟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Spires 在書中採取了一個略具爭議的做法，他把「自願性結社」、「專業化基層 NGO」與 GONGO 三類組織並列分析。有人可能會認為 GONGO 不該被歸入公民社會，但 Spire 感興趣的是這三類組織的共通點，亦即它們的內部組織文化都被國家以某種方式形塑。

從 2005 到 2017 年間，Spires 在中國進行了大量參與觀察，包括 NGO、GONGO、自願性社團、贊助機構的年度會議、策略討論、非正式聚會、志工活動等；甚至兩度跟隨中國政府官員參與赴美考察團，考察團中的官員後來成為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的關鍵人物。在訪談資料方面，他訪問了兩百多名公民社會行動者，其中針對組織

⁶ GONGO 為 Government-organiz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的縮寫，是由政府出資設立或主導的非政府組織。這類組織雖然是非營利與民間團體的形式，但實際上仍受政府控制、資助或影響，主要功能是協助官方推動特定政策、進行國際遊說或強化政權合法性。

文化此一主題，於 2010 至 2014 年間深度訪談了八十多人。

專業化 NGO 與 GONGO 的威權文化

透過田野觀察，Spires 發現中國的專業化 NGO 與 GONGO 內部普遍存在階層制（hierarchy）、獨斷（autocracy）以及對異議的壓制，這三個共同的文化特徵。

第一是階層制，一位來自勞工權益 NGO 的女性受訪者表示，即便在 NGO，人們也沒有真正的平等心態，上面的人覺得自己比較會分析、看得比較清楚，下面的人覺得自己應該謙卑順從。「上面的人」、「下面的人」這樣的語彙在訪談中反覆出現，並且被視為理所當然；這原本應該是 NGO 與一般企業或政府機關之間最大的差異之處，但在中國卻毫無二致。

第二是獨斷，Spires 用「老大現象」來概括。中國 NGO 的創辦人往往極具個人魅力與宏大願景，這也是能夠吸引志工加入組織的原因之一。Spires 坦言，他做田野時也曾被某些創辦人的魅力震懾，甚至腦中閃過乾脆放棄博士學位、跟著他做事的念頭。然而，這些「老大」幾乎都會讓追隨者失望。一位受訪者如此形容他的組織領導者：「他常對著人吼，吼完之後不會反省自己說了什麼，也不會意識到那樣對人說話是會傷害人的。他的長處是有能力，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他的弱點是他不會思考、太主觀，無法接受別人的意見。」

第三是對異議的壓制，這牽涉到中國 NGO 工作者經常抱怨的「溝通」問題。Spires 一開始把「溝通」理解為英文意義下的資訊交換，但訪談累積到某個程度後，他發現受訪者所說的「溝通」其實是在不同意見之間建立橋梁、達成共識的過程，也就是民主政治意義上的妥協。一位 NGO 領導者說：「中國 NGO 裡幾乎人人都是理想主義者，但民主的關鍵是妥協，當一方為了整體最佳結果而願意退一步。可是『妥協』對中國的理想主義者來說根本不是個能理解的詞，大家都只想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把別人壓下去，總是『很要強』。」有趣的是，這位領導人自己也是出了名的，不聽人話的「老大」。

Spires 接著分享一個生動的田野故事。他曾長期擔任某健康議題 NGO 的志工，在某次員工大會上，創辦人提出幾個募款新方案徵詢意見，二十位高學歷員工卻全程沉默。創辦人在會後對 Spires 抱怨：「我親自挑選這些優秀人才，每次徵詢意見他們卻不回應，我自認非常開明啊！」隔天 Spires 與員工們共進午餐，順勢問起這件事，一位員工回答：「他嘴上說想聽意見，其實根本不想聽。上次有人講了不同意見，被他罵到哭著跑出會議室，我們都學乖了。」這個事件揭示了 NGO 領

導者並不認為自己是小獨裁者，他們真心相信自己很民主，但實際運作仍然落入威權的慣性。這也導致中國 NGO 員工流動率極高，人們懷抱「不一樣的組織」的期待加入，最後卻發現一切都一樣，於是失望離開。

青年志工團體中的民主價值實踐

Spires 書中的主體部分聚焦在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青年自願性團體，分別化名為 Bridges（從事鄉村教育）與 Together（從事麻瘋病村服務）的組織。

Together 服務的對象是中國的麻瘋病康復村。1950 至 60 年代，中國曾將麻瘋病患者強制集中到隔離村莊，這類村莊在中國南方至今還有數百個，居住者大多已七八十歲。Together 的青年志工進入這些村莊，協助長輩重新與家人和社會連結，重新認知自己並非會傳染的危險人物。Bridges 則進入中國農村學校，教孩子們英語、藝術或音樂等農村學校無力提供的課程。

這兩個團體於 2001 至 2002 年間在廣東各大學分別獨立誕生，彼此並無直接聯繫，但卻擁有極為相似的內部文化，包括：強調平等、共同決策、人際信任與輪流領導。Spires 訪問這兩個組織的志工，詢問他們參與組織後是否有所改變，以及如何改變。受訪者都表示自己確實改變了，Spires 整理並規納出以下五項核心改變。

第一是主動傾聽。一位受訪者表示：「我學會了真正去聽人說話。我以前是個沒耐心、固執的人，遇到不同意見就生氣。後來我發現這不是好的溝通方式，現在我會等別人說完，真正去理解他們怎麼想。」這裡的傾聽不只是聽見的字面意思，而是試圖理解對方為什麼這樣想、為什麼這樣感受、為什麼相信這個方法可行。

第二是平等與尊重他人觀點。一位曾擔任學生會幹部的志工坦言：「我以前是金字塔式的管理風格，我說了算。剛開始我也不太尊重別人的意見。後來我發現，與其說我不尊重別人，不如說我根本不願意傾聽。」另一位志工說：「資深志工會跟你分享他們的經驗，但用的是朋友式、平等的方式聊天。原來人跟人之間真的可以被年齡和資歷限制地交流。」對階層制的明確抵抗，是這兩個團體最鮮明的共同特徵。他們刻意避免使用「老大」這類稱呼，連登記時不得不填的「會長、副會長、秘書長」職位，許多成員都記不清是誰擔任，因為「我們所有人都在領導，所有人都在做事」。

第三是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一位志工說：「是 Together 的價值觀讓我變得更積極面對問題。我現在覺得沒有什麼是克服不了的。」Spires 另舉了一個生動案例：依照規定，麻瘋村老人每月可領取一袋米，若志工發現有人這個月還

沒收到米，就會牽著老人家走到鄉鎮政府辦公室詢問「為什麼這個月的米還沒送來？」對許多志工而言，這是他們生平第一次主動走進政府機關、與官員交涉。在民主政治理論裡，與政府官員互動的能力是公民參與的關鍵技能，而這些中國年輕人透過志工經驗習得這項能力。許多志工也是在這裡第一次學會做簡報、向陌生人解釋組織理念、投書給媒體、為組織爭取校方資源等。

第四是對多元的尊重。一位來自頂尖大學的志工說：「我以前認為技職體系的學生不夠聰明。後來認識了 Bridges 裡那位來自技職院校的女生，我發現她非常有趣，觀察力細膩，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小事。認識不同的人能打破偏見，看見別人值得尊敬的特質。」

第五是公民意識。一位志工表示：「參加 Bridges 會提升你對社會的關懷。我認識的很多 Bridges 志工後來都投身公益事業。它讓你看見問題，並擴大你推動社會公正的動力。」Spires 補充，這些團體培育出的校友，後來投入性別平權、環保、動物保護、氣候變遷等各種議題的公民組織，分布的地理範圍超出廣東，遍及中國北方、西北與中部。

除此之外，志工也學到團隊合作、輪流領導、謙卑、換位思考等諸多公民素養。

Spires 總結，GONGO 與大多數專業化 NGO 雖然能夠提供利益代表的功能，但並不適合扮演「民主學校」的角色。要尋找中國民主文化的萌芽，我們應該轉向托克維爾式的理想型自願性結社，也就是像 Bridges 與 Together 這般的自發性草根青年團體。

至於為什麼這兩個團體能夠誕生並維繫，Spires 提出幾個社會學的解釋。首先是外部環境與政治機會結構，廣東地理上與香港比鄰並處於全球化前緣，長期享有相對自由的政治氛圍。其次是巨大的世代變遷，這群 20 至 30 歲的年輕志工成長於中國經濟持續繁榮向上的時期，基本的物質生活已獲得滿足，或許因此更有條件追求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t）的價值觀，另外也與近年來中國社會個人主義的崛起有關，這是當代中國年輕世代正在展現的特質。最後則是一個值得玩味的因素：中國共產黨自身推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特別是「平等」理念），為年輕人嚮往民主提供了肥沃的滋養土壤。

提問與討論

在問答環節中，Spires 補充了兩個重要觀點。第一，志工團體的學員大多來自工人階級家庭，許多人有兄弟姊妹，這在中國過往一胎化政策的社會背景下是相當

特殊的現象。第二，許多 Bridges 與 Together 的校友帶著民主文化的經驗進入專業化組織，雖然最後往往無法成功改變既有組織結構，但有些人會選擇自行創辦新組織，將這種文化擴散出去。

Spire 進一步提到民主立於民主制度與民主文化這兩條支柱之上。如果生活在其中的人們不再相信平等的尊嚴，以及妥協建構共識的文化價值，那麼孤立的制度本身將無法獨立支撐運作。現場聽眾與來自中國的研究生接續分享自己在中國 NGO 與性別運動中的親身經歷，呼應了 Spire 的觀察：在缺乏民主實踐機會的社會裡，即便懷有最好的意圖，要做到真正民主、參與、平等與尊重，仍是極為艱鉅的功課。

演講最後，Spire 強調我們應該更關注中國社會內部正在發生的變化，尤其是年輕世代，他們不只是陳腔濫調的「中國的未來」，而是真正意義上掌握中國未來的關鍵群體。在當代中國，性別議題之所以成為網路上少數還能被持續討論的社會議題，部分原因正在於它涉及了半數的人口，國家也尚未找到有效的治理方式。在中國當前日漸收緊的政治土壤上，民主文化是否仍有縫隙得以生長，仍有待長期觀察。



與會者合影。

中國對東南亞社會影響研究工作坊（上） 中國因素下的東南亞外交與台資

主持人 | 沈秀華*

講者 | 陳明祺**、王宏仁***

記錄 | 董昱輝****

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一直以來都是清大當代中國研究中心關注的議題，沈秀華主任在開場中提到，¹ 過往中心與學生致力於中國政治與社會經濟等面向的研究，然而隨著中國逐漸收緊監管，近年要進入中國進行實地研究變得相當困難。師生的研究視野因此逐步由中國本土擴展至中國以外的地區，探討中國勢力在非洲、東南亞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與影響。

本場工作坊聚焦於中國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特別是針對菲律賓與越南等國，在高鐵等基礎建設與一帶一路倡議下，如何嵌入當地的政治與社會系統之中。同時也試圖理解，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如何反過來重塑台灣在地緣政治中的處境，以及各國政府與社會如何回應。工作坊的上半場由陳明祺教授與王宏仁教授主講，分別從外交實務工作者的視角分析台灣如何因應中國對東南亞的影響，以及從越南的視角觀察台商在中美競合間的策略選擇。

印太脈絡下的台菲與台越關係

陳明祺目前是外交部政務次長，他以外交工作者的角度切入，由第一島鏈的地緣政治意義談起，並從空間維度審視印太地緣政治的戰略架構。在美國所定義的傳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外交部政務次長

***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西灣學院院長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¹ 工作坊於 2026 年 4 月 20 日，在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進行。

統印太戰略中，三大島鏈²是阻止歐亞大陸威權勢力進入太平洋的重要防線。在近代的政治語境中，中國無疑是當今對國際社會造成最大威脅的歐亞勢力，而由日本、沖繩及台灣延伸至菲律賓與南海島礁組成的第一島鏈，即是首當其衝直面中國威脅的地理屏障。中國若企圖改變既有的國際秩序，將勢力延伸至太平洋，勢必要先突破第一島鏈。第一島鏈在地理位置上有南、北兩個關鍵扼喉點，分別是北面的沖繩—宮古島間的宮古海峽，以及南面的台灣島—呂宋島間的巴士海峽。台灣的位置恰好位於這兩個關鍵戰略通道的交界中心，一旦地緣局勢生變，台灣就將扮演重要的關鍵節點。而在南海海域，中國正透過「九段線」的政治宣稱，以及在南海島嶼以人為填海造陸的方式擴張其主權與軍事干預，在仁愛暗沙與黃岩島等島礁周圍積極進行海上民兵與海警行動，試圖將台海與南海內海化，不只對台灣造成實際威脅，也和東南亞各國產生領海與主權摩擦。

在台灣戰略價值日趨重要的背景下，美國在 2025 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與 2026 年發布的《國家國防戰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NDS）中，都顯示美國官方對第一島鏈的防衛定位，強調建立並維持台灣的區域拒止防衛能力（denial defense），威懾中國以達到避免台海發生衝突的目的。台灣的角色因而發生轉變，由冷戰遺緒中待解決的「問題點」，轉變為全球安全網絡、民主價值鏈與半導體供應鏈的樞紐。台海局勢也由兩岸範疇，提升為攸關全球經濟繁榮與安全穩定的核心議題。

面對地緣政治變動，台灣的政策回應經歷了階段性的演進。政府自 2016 年啟動了「新南向政策」，核心邏輯在於「分散」。透過降低對單一非民主國家，也就是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分散投資、市場與人才布局，將以往高度集中於中國的經濟網絡轉向東南亞國家市場與社會。數據顯示，台灣對中國投資占對外總投資比例，已從 2010 年超過 80% 的高峰，大幅下降至近年的 10% 左右。³

以全球製鞋業龍頭寶成國際集團的發展策略為例，2014 年寶成東莞廠發生大規模罷工，經營團隊並未採取過往台商常用的尋租模式，求助地方官商地下秩序協商，而是選擇繳清在中國廠房的住房公積金，並將工廠產線轉移至越南與印尼，完成生產重心的南向發展。如今，寶成在越南與印尼的產量都已超越東莞。寶成的案

2 即第一、第二及第三島鏈的總稱。

3 〈對陸投資 3.8% 新低：解析臺商供應鏈的全球位移〉，兩岸經貿網，盧鈺雯，2026 年 5 月 6 日，<https://www.seftb.org/cp-4-2692-7c4be-1.html>



會場一隅。

例反映出台商供應鏈去風險的實質成效。

然而，陳明祺進一步指出，在印太競爭加劇的背景下，單純的經濟分散已不足以因應局勢。因此，外交部進一步推動「總合外交」，其核心概念在於「全社會總體動員」，將政府政策、企業產業與社會資源進行跨界整合。總合外交戰略聚焦於「三鏈整合」：一是以民主法治為基礎的「價值鏈」，二是將台海安全嵌入區域安全架構的「同盟鏈」，三是打造非紅且可信賴的產業網絡「經濟鏈」。也就是說，當今的外交不再僅是國家對國家的政府層面交往，而是「國家 x 市場 x 社會」的整合行動。

陳明祺以台灣與菲律賓、越南兩國當前的關係為例。首先以台菲關係來看，自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 2022 年就任以來，菲國積極維護其在西菲律賓海的主權，因而與中國海警在南海領土問題上多有摩擦。中菲兩國的安全議題外溢到台菲兩國的雙邊關係，使雙方在巴士海峽的共同安全利益顯著提升，台灣也積極提出合作方案。經濟上，台灣提出「台菲經濟走廊」倡議，用以對接美、日、菲倡議的「呂宋經濟走廊」，推動半導體、AI、智慧農業與冷鏈物流等領域的合作，落實供應鏈安全化，並在戰略上有助於確保台灣南方的物資補給通道。社會層面上，推動高度制度化的「一國一中心」醫療合作，採取「醫院對醫院」的對接方式，由花蓮慈濟醫院負責北呂宋、萬芳醫院負責南呂宋，輸出系統能力並深耕地方關係。

接著以台越關係來看，越南在體制上屬於共產國家，外交上奉行「竹子外

交」，⁴與美、中兩大國保持戰略距離和彈性。越共總書記蘇林在 2026 年 4 月出訪北京，雖然在訪中期間重申一個中國原則，使台越在官方政治層面往來上面臨侷限，但在經濟與社會層面，雙方早已是深度嵌入的非典型夥伴關係。首先在經濟層面，越南是台商供應鏈去中化轉移的重要目的地，產業鏈布局完整，目前約有 8 萬名台商與台幹在越南發展。此外，目前約有 4 萬名越南留學生在台，加上大量的移工、新住民，在台越之間交織出緊密的跨國社會連帶。近年來台越在醫療與科技方面的合作，也從人才培訓升級為智慧醫療及遠距醫療的制度與系統輸出，顯示兩國之間技術層面的合作可能性。

最後，陳明祺提及，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當前的轉型方向，即是將研究焦點從早期的「中國社會與在地台商」，擴大轉向「全球台商與全球華人網絡」研究。這樣的學術轉型，與台灣「總合外交」的戰略路徑是契合的。台灣正透過整合政府政策、企業產業與社會動員，從全球體系中被動嵌入的經濟體，轉型為主動形塑區域秩序的網絡節點。

移動中的全球生產鏈——越南台資與美中經濟關係

王宏仁聚焦越南，分析越南台資在美中競合間的移動與生存策略。美、中、越之間的地緣政治變化，正直接影響台資在台灣、中國與越南三地之間的流向和結構性轉變。根據 2025 年的數據，越南經濟近年展現出高度韌性，經濟成長率達到 8.02%，人均 GDP 則來到 5,026 美元。對照各國發展來看，越南目前的人均所得水準大約相當於 1987 年的台灣，有著約 40 年的差距；同時相當於 2011 年的中國，有著約 15 年的差距。相較之下，2025 年台灣人均所得已達 39,000 美元，中國則為 14,000 美元，顯示出越南當前的發展階段正處於快速擴張期。此外，越南過往存在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近年已降至溫和範圍，2025 年的整體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被控制在 3.31%。

關於越南的經濟結構，王宏仁指出，越南展現出高度仰賴外資驅動經濟成長的傾向。外資企業的出口額占越南總體出口比例高達 77.3%，其中的對外貿易主要由台灣、韓國、日本及近期加入的中資企業所拉動。在引進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中，製造業是外資最聚焦的領域，占比達到 56.5%。這種高度依賴外部資本，並

⁴ 竹子外交（bamboo diplomacy）一詞，是 2016 年時任越共總書記阮富仲提出的外交概念，借用竹子具有彈性的特性，意指越南在外交上以獨立自主與國家利益為原則，同時在大國競爭中採取靈活務實的手段，在各方勢力間取得動態平衡。



王宏仁教授。

以加工出口為主的產業結構，十分近似 2000 年代中國甫「入世」⁵時的發展路徑。越南國內的產業組成上，外資企業、民營企業與國營企業各占約三分之一，形成了三分天下的經濟結構。

在政治體制與治理層面上，越南的政治權力主要分為五大支柱，包含：越共總書記、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國會主席以及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以越南的政治慣例來看，這些關鍵職位通常以北部、中部、南部三個地域之間進行平衡分配。舉例來說，時任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蘇林為北方興安省出身，具備長期公安系統背景；負責經濟事務的政府總理黎明興來自中部河靜省，此前曾擔任越南國家銀行行長，具備深厚的金融背景；國會主席陳青敏則代表南方後江省的政治力量。在 2026 年召開的越共十四大後，越共總書記蘇林同時兼任了國家主席一職，引發外界對他身兼二職權力過於集中的疑慮，以及向中國權力「定於一尊」靠攏的顧慮。王宏仁則認為，總書記兼任國家主席的案例曾在 2018 年阮富仲時期出現過，越南政治體制邏輯存在穩定的地域與派系協調機制，且多頭共治亦是越南高層政治的運作根本，在政治結構上與中國具有本質上的差異。

面對美中地緣政治的競爭，越南的外交抉擇深受越中經貿依附關係影響。2025 年，越中雙邊貿易額達到 2,654 億美元，然而越南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高達 1,156 億美元。從數字上即能看出，越南高度依賴向中國進口工業半成品的加工結構，且中國供應了越南 50% 以上的工業原材料，橫跨紡織與電子兩大產業。而中資對越南的投資策略，也逐步從低技術水平產業投資，轉向高科技、能源與基礎建設的投入，例如已完工的昆明至海防鐵路，以及規劃中的南寧至河內高鐵。

在外交策略上，越南採取「竹子外交」的戰略，與美、中、俄保持等距關係以

⁵ 意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維護主體性，並且在中美競合間尋求越南的最大利益。例如，2023 年美越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隨即訪越，並倡議中越構建「命運共同體」架構，但越南官方刻意翻譯為「共享未來」（shared future），以示與中方論述的區隔。王宏仁強調，中越兩國的核心矛盾在於南海主權衝突與石油開採爭端，2025 年便曾發生中國執法船干擾越南在南沙群島進行石油探勘的事件。

在外資投資趨勢與關稅風險方面，目前中資在越南的投資高度集中於北越（約 68%）。若以產業投資來看，光伏與太陽能產業占比最高（36%），其次為電子與 ICT 產業（31%）。部分中資企業更試圖透過在越南設廠，調整產地以輸出歐美，也就是俗稱的「洗產地」。為了遏制此類規避性轉運行為，美國在 2025 年的「解放日關稅」中對越南商品實施了雙層關稅體系，原產於越南的貨物適用於 20% 的一般關稅，但若被判定為第三國（特別是中國）洗產地的商品，則將面臨高達 40% 的懲罰性關稅。目前受影響的行業，包含太陽能板，已被美方裁定造成實質損害；鋼鐵產品正接受反規避調查；部分家具與紡織品則已被裁定課徵反傾銷稅，面臨高度貿易合規風險。

台商投資流向在 2025 年出現了結構性變動。受到經營環境等因素影響，2025 年台灣對中國的投資金額占對外總投資比例降至 10% 到 13% 之間，相較於前一年大幅減少近 60%。撤出的台資轉而布局東南亞國家，首先在台灣、越南、美國之間形成新興投資三角。目前台灣在越南製造業投資總額中，電子產業已占 50%，包含富士康、和碩、廣達、仁寶、緯創等電子巨頭都集中於北越，使北越成為台灣電子業的第二生產中心。供應鏈移轉的主要原因，無非是為了回應全球客戶去風險化與「非紅」供應鏈的要求，但供應鏈中的中間財（半成品）仍高度仰賴中國台商端的進口。此外，台資開始在越南布局半導體產業，如日月光封測廠在越南擴張，2026 年首座晶圓廠也正式動土。然而，台商在越南也面臨工業土地租金攀升、中資搶地競爭以及勞動力成本提升的挑戰。台商的因應策略是導入自動化與智慧製造設備，轉向高附加價值、低勞動密集產線，以及透過台越間的社會交流，培養越南人才以回應台商的人力需求。

最後，王宏仁從體制本質對比中國和越南，指出兩國雖然同為共產主義國家，但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上存在根本性差異。例如，中國的戶口制度緊密連結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分配，排他效果顯著；而越南的戶口制度相對鬆散，自 2020 年起已逐步廢除戶口名簿改用身分證，非本地戶籍孩童的入學率高達 95% 以上，政府無法將戶口作為推行產業政策的籌碼。在土地產權方面，中國土地歸國家及鄉鎮集體所有，地方政府能控制土地進行資本尋租；越南土地雖名義上全民所有，但實質產權

與使用權歸私人所有，地方政府無法完全控制土地，官僚尋租主要依賴行政流程中收紅包，缺乏土地財政的槓桿效應。這種「米根民主」的體制，顯示出越南國家內部與社會力量之間並非一言堂，而是充滿多元利益團體的相互競逐。越南的社會與政體優勢，提供了足夠的拉力吸引台商向越南發展。王宏仁指出，若根據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推估台灣在國際間的實質所得優勢，未來台灣的人均 GDP 可望突破五萬美元，台灣產業對東南亞高階技術人才的合作培育與就業吸引力持續擴大，將是台商向越南發展的巨大利多。



與會者合影。

中國對東南亞社會影響研究工作坊（下） Chinese Influences in Philippine

主持人 | 陳至潔*

講者 | Ronald Aurelio Pernia **、Jalton Garces Taguibao ***、
Jan Robert R. Go ****

記錄 | 鄒凱業*****

本次工作坊下半場¹由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陳至潔教授擔任主持人，邀請三位菲律賓學者，路奈爾教授（Ronald Aurelio Pernia）、Jalton Garces Taguibao 教授，以及吳安平教授（Jan Robert R. Go），分享研究成果。

在上半場的討論中，陳明祺教授和王宏仁教授分別就台灣與越南、菲律賓的雙邊關係進行了深入闡述。下半場的討論延續前述主題，聚焦於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行為者、一個政治政權，以及一個強大的經濟體，究竟如



主持人陳至潔教授。

*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副主任

** Political Science,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講題 Networks of Influence: China's Expanding Political, Economic, and Intelligence Footprint in the Philippines

***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講題 Concession and Accommodation for Synergy in Energy (?) Lessons and Insights from President Rodrigo Duterte's "Build, Build, Build (BBB) with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for Philippine Domestic Energy Development

****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講題 Global China from the Ground: Local Politics and the Everyday Mediation of Chinese Influence in the Philippines

*****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

1 工作坊於 2026 年 4 月 20 日，在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進行。



三位菲律賓學者。

何對菲律賓社會產生影響。值得注意的是，菲律賓社會結構複雜且多元，由眾多島嶼與社群所共同構成，中國的影響力在不同地區之間亦呈現相當程度的差異，並非均質分布。

不斷擴張的政治、經濟與情報影響力網絡

路奈爾是馬尼拉雅典耀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與台灣有深厚的淵源，不久前才於台灣中山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路奈爾首先說明本次演講所引用的案例都來自媒體報導，尚無法作為決定性證據，證明由一個國家機構發動戰略性入侵這類陰謀論存在與否；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正式否認相關指控。然而，路奈爾表明這些案例之間的相似性與重複性，使其難以被視為偶然事件。透過彙整多起個案，他表示中國正採取一種網絡化的戰略佈局邏輯，藉此建立對其有利的資源與影響力管道，在菲律賓內部進行多層次的滲透。

路奈爾認為，菲律賓之所以成為中國影響力行動的重點目標，在於兼具多重戰略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在地緣位置方面，菲律賓與台灣之間僅以巴士海峽相隔，扼守南海的重要通道，在區域安全格局中位處樞紐地位。一旦台海情勢生變，菲律賓勢必成為關鍵的周邊行為者。此外，菲律賓境內有多處與美國合作的防務設施，在潛在衝突情境中具有高度戰略價值。其次，在政治制度方面，菲律賓是一個民主國家，擁有相對開放的政治體制、活躍的公民社會與自由的資訊環境。這些特質固然是民主韌性的來源，卻為外部勢力提供了滲透空間。複雜的地方分權體制、多元的島嶼社群結構，讓中國得以在不同地區，以差異化的方式滲入。

路奈爾列舉近年來幾起具體案例，揭示中國在菲律賓進行系統性情報蒐集的跡象：

鄧元慶案（2025 年 1 月）：菲律賓逮捕一名已定居逾十年、並與當地人結婚

的中國公民。據報，他所使用的設備能夠精確蒐集地理資訊，並以 GPS 座標形式即時傳輸至中國，目標涵蓋軍事設施與重要基礎設施。此案最具警示意義之處，在於它體現了「雙重用途技術」的應用，外觀上屬於民用或技術性工具，實際上卻用於情報蒐集。²

蘇比克灣案（2025 年 3 月）：多名中國人在蘇比克灣（Subic Bay）遭到逮捕，涉嫌蒐集菲律賓海軍及美國軍艦的情報。他們以漁民或普通平民身分作為掩護，使用衛星導航系統與多個觀測點進行監視，並持有船隻行動紀錄及軍事演習的監控數據。³

更令人憂慮的是，近期報告顯示，滲透行為已從「對外蒐集」演變為「對內滲透」，菲律賓防務機構內部人員的個人資料與任務詳情疑遭洩露，軍事人員甚至被利用以謀取私利。⁴這意味著滲透問題已深入機構運作核心，安全威脅的性質也從外部監控轉向內部腐蝕。

路奈爾接著分析中國透過政治與經濟管道，試圖影響菲律賓社會的多重途徑。首先是地方政治層面，例如曾有一名具有中國背景的女性地方官員，因參與經營詐騙集團與涉及人口販賣罪，引發外界高度警惕。⁵此案說明，地方政治已成為外部勢力切入的潛在入口，地方政府掌握合法的行政管道、制度資源與地方知識，卻相對缺乏嚴密的監管，因此成為滲透的薄弱環節。其次是非法經濟網絡方面，由中國、香港等地人士組成的在地社群，形成獨立的經濟網絡，涉及資本流動、房地產集聚與長期定居。然而，這些網絡容易和販毒、綁架、網路詐騙等跨國犯罪活動掛勾，構成另一層次的安全隱患。⁶再者是敘事操控層面，部分菲律賓立法者在涉及

2 Jamaine Punzalan, 2025/1/30, Alleged Chinese spies posed as tourists in Palawan: official. ABS-CBN News. <https://www.abs-cbn.com/news/nation/2025/1/30/alleged-chinese-spies-posed-as-tourists-in-palawan-official-0920>

3 Aaron-Matthew Lariosa, 2025/3/26, Chinese Nationals Arrested on Espionage Charges Tracked Philippine, U.S. Vessels at Subic Bay. USNI News, <https://news.usni.org/2025/03/26/chinese-nationals-arrested-on-espionage-charges-tracked-philippine-u-s-vessels-at-subic-bay>

4 Bea Cupin, 2026/3/21, Rappler Talk: Filipino Navy staff admits to spying for Chinese. Rappler, <https://www.rappler.com/philippines/interview-filipino-navy-staff-admits-spying-chinese/>

5 Fan Wang and Jonathan Head, 2025/11/20, Philippines sentences 'Chinese spy mayor' to life in jail. BBC News,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x2l20jzp30o>

6 Ellson Quismorio, 2025/6/9, POGO Workers now spying on the Philippines, NBI tells house quad-comm. <https://mb.com.ph/2025/06/09/pogo-workers-now-spying-on-the-philippines-nbi->



Ronald Aurelio Pernia 教授。

南海主權或對中政策的議題上，發表了有利於中國立場的言論，或者在關鍵表決中採取迴避態度。⁷ 路奈爾認為，這類行為形成了北京在菲律賓國內的「代言人效應」，有助於中國在菲律賓政治話語中將特定立場正常化。最後在援助與捐贈方面，中國對菲律賓的捐贈金額雖然不高，但其戰略意圖在於透過「關係建構」來建立長期影響力，而非追求立即效果。⁸

儘管面臨上述多重挑戰，路奈爾亦指出菲律賓社會具備相當的韌性。民調顯示，高達 85% 的菲律賓民眾對中國持懷疑態度；⁹ 獨立媒體的監督與司法調查亦持續揭露問題。菲律賓國家安全委員會近期已加強反情報工作，並計畫將相關機制推廣至各政府部門，以強化數位安全與機構透明度。此外，中央政府亦要求地方政府在建立姊妹城市合作關係前，必須事先獲得中央批准，藉此加強監管。

路奈爾總結指出，中國對菲律賓的影響力是一種多層次、多管道的系統性行動，橫跨情報、政治、經濟與資訊等領域。菲律賓的民主開放性既是最大優勢，也是最脆弱之處。面對政治菁英內部的分歧，以及地方政府的各行其是，菲律賓在形成一致對中政策上仍面臨重大挑戰，而這種內部分歧客觀上對中國有利。他認為政

tells-house-quad-comm

⁷ Jean Mangaluz, 2026/1/27, Marcoleta echoes China's lines, drawing Hontiveros' rebuttal. Philstar, <https://www.philstar.com/headlines/2026/01/27/2503655/marcoleta-echoes-chinas-lines-drawing-hontiveros-rebuttal>

⁸ 2025/3/6, Tarlac gives accounting of cash, motorcycle donations by suspected Chinese spies. ABS-CBN News, <https://www.abs-cbn.com/news/nation/2025/3/6/tarlac-gives-accounting-of-cash-motorcycle-donations-by-suspected-chinese-spies-0931>

⁹ John Eric Mendoza, 2025/8/25, 85% of Filipinos distrust China, survey says. Inquirer, <https://www.inquirer.net/453671/fwd-85-percent-of-filipinos-distrust-china-mainly-due-to-west-ph-sea-moves-octa/>



Jalton Garces Taguibao 教授。

府應盡早識別影響力行動的模式，並在不誇大結果的前提下，與各方行動者合作提出有效應對方案。考量現任總統小馬可仕任期到 2028 年屆滿，屆時菲律賓將迎來新一屆總統，當前的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十分有限，相關行動刻不容緩。

大興土木計畫結合一帶一路——能源發展的啟示與洞察

Taguibao 教授是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政治學系教授，陳至潔特別介紹他除了是學者之外，還是搖滾明星與吉他手，YouTube 上可以搜尋到很多關於他的表演影片。Taguibao 從國內政治角度切入，探討菲律賓政府如何回應外部挑戰，尤其聚焦於和中國的經濟合作對菲律賓國內政治穩定的影響。

Taguibao 以一名摩托車駕駛在排隊領取能源補助時不幸身亡的事件作為引子，¹⁰ 強調能源問題絕非單純的技術或經濟議題，而是直接影響人民生計的政治問題。菲律賓和已開發國家（如英國）在能源衡量標準上存在差異，例如英國關注碳排放，菲律賓則因長期依賴進口燃料（煤與石油），更關注電力產量與供應穩定性。這種對能源安全的渴望，使菲律賓難以抗拒中國提供的融資承諾。

舉例來說，杜特蒂總統執政期間推行的「大興土木」（Build, Build, Build）基礎建設計畫，旨在中程內投入 8 到 9 萬億比索（約 1600 億至 1800 億美元），用於改善交通基礎設施。¹¹ 此計畫成為中國介入的重要切入點，中國透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管道，支持菲律賓多項橋梁、鐵路等大型工程。Taguibao 指出，

¹⁰ Allison Co, 2026/4/19, Motorcycle taxi rider dies in QC while waiting for fuel subsidy payout. ABS-CBN News, <https://www.abs-cbn.com/news/nation/2026/4/19/motorcycle-taxi-rider-dies-in-qc-while-waiting-for-fuel-subsidy-payout-1241>

¹¹ Dave Makichuk, 2021/1/21, Beijing backs Duterte's 'Build, Build, Build' program. ASIA TIMES, <https://asiatimes.com/2021/01/china-backs-dutertes-build-build-build-program/>

這些項目集中於特定省份，又恰巧為現任總統的籍貫地，顯示出投資背後的政治盤算。然而，這場以主權讓步（如低調處理西菲律賓海問題）換取經濟利益的博弈，最終並未完全兌現。數據顯示，中國承諾的 300 億美元僅有 7 億美元確實落實，許多項目因效率低下或分配不均而停擺，迫使政府文件中的 BBB 計畫從充滿期待的「感嘆號」，變成充滿變數的「問號」。

Taguibao 剖析菲律賓政治的本質以及對中政策，進一步指出國內政治生態的三個核心特徵：政治地方化（總統的行事邏輯趨近地方首長）、家族政治網絡（人際與親屬關係凌駕政黨結構），以及政府與社會的理性落差（政治菁英或有戰略盤算，但整體社會未必如此回應）。前總統艾若育（Gloria Arroyo）曾在菲中關係與權力運作中扮演關鍵的捐客角色，連結起杜特蒂家族與小馬可仕家族。這種權力結構反映出菲律賓政治深受家族王朝與人際網絡影響，而非政黨體制。中國在這一系列互動中獲益最大，不僅在南海主權爭議上獲得喘息，更透過基礎建設計畫向菲律賓傾銷水泥與鋼材。反觀菲律賓，社會大眾對政治風險缺乏策略性思考，容易被杜特蒂的掃毒戰爭等議題轉移注意力，進而忽略了背後更具深遠影響的政治失誤、貪腐問題以及長期能源依賴的隱憂。Taguibao 總結指出，菲律賓在尋求能源與經濟發展時，被捲入大國角力與家族政治的交織影響。儘管政府試圖以經濟開發作為外交轉向的合理化藉口，但在資金跳票、主權爭議與治理效能低落的現實下，這種對中依賴模式正為菲律賓的未來埋下不穩定的種子。

菲律賓的地方政治與中國影響力的日常中介

吳安平是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政治學系副教授，目前在政治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過往研究經常從高層次的「地緣政治」理解中菲關係，將中菲關係包裝成國家級別的官方合作與融資協議，吳安平則將研究視角轉往「地方與日常政治」，主張中國的影響力並非單向地由強國（中國）投射，並由弱國（菲律賓）被動接收，而是在菲律賓地方層級被各種政治與社會力量「中介」（mediated）、轉化與重新詮釋。他進一步提出了觀察中國影響力落地的三個中介場域（sites of mediation）。

第一個中介場域是「地方政治機構」（loc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菲律賓政府不是單一的行為者，而是由國家、省、市到村等，高度破碎化的權力層級所組成。中國的基礎建設計畫（如一帶一路）進入菲律賓後，必須穿透這層層的官僚體系與地方管轄權。因此，計畫的執行往往不僅是單純的經濟或行政問題，更是「政治問題」——這牽涉到誰能授權、誰能獲益，以及地方官員如何利用這些實體建設



Jan Robert R. Go 教授。

來作為自己的政治籌碼與政績。

第二個中介場域是「地方政治菁英網絡」(elite networks)。菲律賓的地方政治深受政治家族、權力掮客與非正式政商關係所左右。中國的投資與計畫進入這個競爭激烈的場域後，往往會與地方既有的權力結構糾纏在一起，成為派系爭奪正當性的工具。與中國資本合作，可以被當權者包裝為「有能力吸引投資與帶來發展」的證明，但也可能成為政敵批評「不透明」或圖利特定利益集團的箭靶。中國的影響力在此被地方行為者「挪用」(re-purpose)到國內的政治鬥爭中。

第三個中介場域是一般民眾的「日常詮釋」(everyday interpretation)。吳安平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一環，即社會大眾怎麼看待中國和中國人。多數菲律賓人接觸中國的方式，不是透過抽象的外交政策，而是生活周遭實際發生的改變，例如正在施工的橋梁道路、新出現的中國企業與勞工，或是中國資金湧入後飆漲的馬尼拉房價。這些日常遭遇會產生多種不同的解讀，有些人視之為經濟發展的象徵，樂於擁抱，但同時也有人對勞工競爭、環境成本、社經排斥與不透明等，抱持疑慮與不安。由此可見，影響力必須獲得社會認可，才能產生實質的作用。

吳安平最後呼籲，除了看大國的「擴張」(expansion)，更要看地方社會與大國的「遭遇」(encounter)。在面對中國影響力時，不應只問「中國正在做什麼」，也應該問「菲律賓人正在如何應對與利用中國的存在」。這證明了菲律賓並非被動的接收者，而是透過地方機構、菁英網絡與民眾的日常詮釋，試圖積極形塑並改變中國影響力的實際樣貌。

問題討論

演講最後開放與會師生一同進行提問和討論。一名與會者認為吳安平提出的「中介場域」是一個非常龐大且有潛力的研究框架，提問未來該如何透過實際的調查或數據蒐集，來衡量不同層級（從中央、省、市到一般大眾）對中國一帶一路等

專案的長期感受與詮釋？此外，一名與會者詢問宗教（特別是天主教學校）與華人社群關係的問題。

吳安平回應指出，要將中介場域框架轉化為實證研究，是需要大量時間、資金與大型研究團隊（例如成立專門的中國研究小組）的龐大工程。因此，他目前主要將之視為一個「理論視角」，提供給其他學者作為研究的切入點，歡迎大家依此框架去進行各自的在地調查。至於宗教與教育的關係，菲律賓當地的華人社群確實與天主教學校密切互動，許多沒有華人血統的菲律賓人，也會為了學習語言、文化或獲取社會人脈，而將孩子送入華文學校，這形塑了基層的社會網絡。

一名與會者提問，菲律賓如何在美國與中國之間劃定界線（外交避險）？以及一帶一路在菲律賓失敗的深層原因為何？Taguibao 回應，在菲律賓政治與經濟無法脫鉤，政治人物經常在「堅守國土主權」和「獲取中國經濟與基礎建設利益」之間拉扯。菲律賓政治人物口中的「獨立外交政策」，往往只是在美、日、中之間尋求利益極大化的彈性說辭。一帶一路的失敗，一般大多歸咎於菲律賓國內政治的缺陷與地方運作的失誤，包括地方政府夾帶私利，以及地方政治的阻力。

一位與會者提問台灣與中國之間存在「兩岸一家親」等民族與文化上的論述，中國在菲律賓推動經濟與基礎建設時，是否運用類似的社會與文化基礎讓這些影響力得以生根？

Taguibao 認為，這可以追溯到菲律賓的後殖民與新殖民歷史經驗，影響了菲律賓應對超級大國的方式，此外，菲律賓社會容易「遺忘歷史教訓」（例如馬可仕家族的復辟），也讓政治人物在與中國交往時有更大的操作空間。吳安平強調地方脈絡，例如即便是不具華裔血統或不通中文的人，也會因為想建立人脈、獲取教育資源或了解文化而進入華文學校。這種「社交參與」讓中國影響力在基層生根——不一定非得是強大的意識形態，有時更像是為了「交朋友」或「求學」而形成的實務選擇。路奈爾則補充，這些社會基礎的建立，部分原因是中國試圖在菲律賓培養未來「志同道合的領導人」，透過長期的民間與教育網絡為未來的政治影響力鋪路。

總結來說，問答環節將理論進一步延伸到外交實務與社會文化的具體案例中，所有外部影響力最終都必須通過在地的「解釋」與「政治運作」才能產生實際意義。

日本東京大學、九州大學師生 來台灣進行年度例行參訪

撰稿 | 通訊編輯組

2026年3月初，東京大學阿古智子教授、九州大學前原志保教授，共同帶領東京大學、九州大學的研究生與大學生，一行數十人來到台灣進行年度例行參訪。本次主要行程在澎湖，師生充分觀摩澎湖的基層社會、文化、政治、商業和宗教習俗，接著到台北進行參訪。

本中心師生也參與了部分交流行程。3月6日上午，師生以外交、兩岸議題，分組訪問。第一組由前原志保與本中心的陶逸駿教授帶領，前往陸委會。陸委會魯仲尼參事接待、進行簡報，並主持座談。第二組由阿古智子帶領，前往外交部，清華社會所乙組中國研究學程四名碩士生一同參與。外交部次長、本中心執行委員陳明祺教授接待、進行簡報，並主持座談。



東京大學、九州大學師生在中研院社會所座談（陶逸駿攝）。

3月6日下午，阿古智子與陶逸駿帶領，前往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參訪。社會所特聘研究員吳介民教授接待、進行簡報，並主持座談。社會所林宗弘研究員，以及清華社會所一名乙組學生共同參與。討論題目包括台灣科技產業、能源轉型、地緣政治與台灣社會現況等等。

3月8日下午，東京大學、九州大學師生訪台行程臨近尾聲，於台北舉行成果發表會，同學們分組輪流展示參訪一週以來的見聞心得。發表會由阿古智子主持，陶逸駿代表本中心致詞。日本各大媒體駐台北辦公室亦委派人員到場參與。



東京大學、九州大學師生成果發表會（陶逸駿攝）。



第 40 期 2026 年 6 月 30 日發行
2003 年 10 月創刊

發行人 | 沈秀華
主編 | 陶逸駿
編輯委員 | 方怡潔、古明君、汪宏倫、林宗弘、歐子綺、陳至潔、陳志柔
陳明棋、張貴閔、黃兆年、黃克先、鄭志鵬、戴瑜慧
助理編輯 | 鄒凱業
排版印刷 |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Publisher | SHEN Hsiu-Hua
Editor | TAO Yi-chun
Editorial Committee | CHANG Kuei-min, CHEN Chih-Jou Jay, CHEN Ming-Chi,
CHEN Titus C., CHENG Chih-Peng, FANG I-Chieh,
HUANG Jaw-Nian, HUANG Ke-Hsien, KU Ming-Chun,
LIN Thung-Hong, OU Tzu-chi, TAI Yu-hui, WANG Horng-luen
Assistant Editors | CHOU Kai-yeh

國立清華大學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tel: (03)516-5982 email: cfcc@my.nthu.edu.tw
website: <https://cfcc.site.nthu.edu.tw/>

歡迎來信或上本中心網站訂閱電子報。
本刊登載之全部內容為版權所有，未經本刊同意不得作任何形式之轉載或複製。
本期內容來自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立場。

Contemporary China Newsletter
No. 40, June, 2026
Founded: October, 2003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01, Sec.2, Kuangfu Rd, Hsinchu 300, Taiwan
tel: +886-3-516-5982 email: cfcc@my.nthu.edu.tw
website: <https://cfcc.site.nthu.edu.tw/>
Online subscription availabl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ortion of the contents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represent the position of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hina.